

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12年

我看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

胡开明在安徽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

目 录

新年献辞

- 1 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本刊编辑部

一家言

- 2 我看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郭道晖
6 “失踪条款”违反基本道德原则余良明
10 党内分权制衡的来历和经验思 源

群言堂

- 14 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程 敏

访谈录

- 22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

人物志

- 28 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34 胡风案中的“一同志”沈国凡

怀人篇

- 39 怀念父亲徐雪寒徐 淮
42 胡开明在安徽张育瑄
48 汪达之:教育史上的一段实践孙肖平
54 东北抗联的一桩公案张 克 黄 强

亲历记

- 58 我成了“活人展览”的展品李果河
61 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杨德春

往事录

- 65 陈永贵与记者的恩怨金嘉声
70 红卫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记彭 古

沉思录

- 72 政体与大国的兴衰黄 钟
79 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何 伟

争鸣篇

- 84 长征路上的松潘战役夏宇立

海外事

- 89 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程映虹

编读窗

- 94 读者来信摘登刘崇文等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麟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社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编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总经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行部 孔 屏(主任)

办公室 王海印(主任)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书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荣赵阔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允许看,大胆试,可讨论

本刊编辑部

“十二五”规划提出,改革要搞“顶层设计”。那么,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可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78年,如果这样问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恐怕无人能答。直到20年前,1992年1月,改革开放13年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回顾历史,才总结出堪称“顶层设计”的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

允许看,是对怀疑或反对者的宽容。大胆试,是对改革者的鼓励。不争论,是避开“姓社姓资”的责难。三句话一出,稳住了两个不利因素,调动了一个积极因素,三五年间,局面一新。

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我们不妨接上一句:经济体制改革是如此,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如此。

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是官强民弱。经济体制改革,包产到户,民间一冲再冲,官方寸步不让20余年。但是,各地各层总有一些思想解放、尊重民意的干部,在邓小平的顶层设计之下,最后闯关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阻力远小于当年的农村改革,广大干部极少有反对民主宪政的,可是真改起来,个人或部门利益难免受损,阻力重重在所难免。但是,各地各层,条条块块,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出于权力或利益考虑,总有一些干部愿意改革。邓小平那三句话,既可稳住大局,又鼓励局部突破,碎步前进,很适合这种利害格局。

这是如水随形的顶层设计。想不想改革,能力高下,阻力大小,动力强弱,时机好坏,利害如何,第一线的当事人最清楚。于是,第一线当事人获得授权:你可

以看,也可以在适当时机大胆一试。如果成功,可望获得奖励,担负重任。至于舆论环境,现在和30年前不同,人心所向,潮流所趋,有利于调整官强民弱的格局,顺势而为地将“不争论”改为“可讨论”,改革者更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总之,授权当事人自主选择,在阻力最小、动力最强的地方突破,并为此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就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的精髓。

这种设计体现了对广大干部的信任,也包含了对人民群众信任。民众同样要看,要试,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不但该不该打压,还应支持和推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包含了“允许看”,参与权包含了“大胆试”,表达权包含了“可讨论”。

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一方面要求保障“四权”,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求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前者指向民主,后者指向宪政。这些要求,顺应潮流,合乎民心。不过,回顾以往,盘点得失,官强民弱之势未改,实现民主宪政依然任重道远。

今年下半年,中共十八大将有重大人事更替。交接之际,重视维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改革发展中的维稳——积极维稳,也有停滞甚至倒退中的维稳——消极维稳。为维稳而维稳,维稳就成了顶层设计,就有停滞倒退的可能。有了邓式顶层设计,维稳才具备改革开放的灵魂。

回想当初,本届领导班子以学习宪法亮相。离任之年,如果推出一个促进民主宪政的顶层设计,可谓善始善终,继往开来。既可防止停滞倒退,又能为心怀改革理想的干部提供一个机会:形格势禁,即使办不成大事,总可以从自身做起,在公布财产等方面有所作为。18世纪,奥地利女王泰蕾西亚搞不成土地改革,还能宣布在哈布斯堡王室领地上取消农奴制。1861年沙皇签署解放农奴宣言之前,托尔斯泰等许多俄国贵族已在自己的庄园里尝试废除农奴制。堂堂世界第一大党,8000万中共党员,难道会在封建贵族面前自惭形秽吗?

我们翘首期盼。

我看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

○ 郭道晖

一、社会管理与保障人权

近年党中央陆续提出若干以“社会”一词命题的执政理念与方略,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递进阶段或重心转换:

一是2004年2月20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所作的讲话,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正式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把它放到同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

二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重申上述三大建设的同时,还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并确认其重点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三是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又一次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提出“创新社会管理”的概念和任务。在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以大量篇幅阐述了这个概念。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现今特别关注社会问题,是审时度势,对社会民生需要与民心向背的关注;其现实政治背景则反映了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危机日益突出,亟待认真应对。

纵观这三个阶段、三个口号,是由宏大的“和谐”理念、愿景,向“社会建设”落实;现在进一步具体化、或者收缩为“社会管理”。这三个阶段或三个口号的历史逻辑,是反映了执政者落实决策的务实心态,还是面对社会危机而治国重心有所转移?这是有待专题探究的问题,本文不拟论列。我只就社会管理的方略问题略述一孔之见。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理念、目标、任务或口号的提出,从字面上看是美好的、必要的,但

在落实上却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措施跟进,特别是经常遇到某些主管部门和地方的当权者、既得利益集团的诸多阻力,导致落在枝干,而回避了根本,甚或偏离、扭曲了这些口号的本义,违反宪政精神。

按照这三个阶段、三个口号的法理逻辑,“建设和谐社会”是根本目标,加强“社会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或途径;创新社会管理则只是附属于社会建设的一项派生任务。显然,“建设”的内涵要大于“管理”;“和谐”的目标更是统摄一切,是衡量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成败得失的基本尺度。

现在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却似乎重在社会管理;而管理又重在政府对社会的单向控制;控制的目标则是“维稳”。维稳的指向又偏重于维护某地方、某部门的“政绩”,说到底还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特别是某些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人的权位,而不是重在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平正义、民生福祉。这就有违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初衷,也使社会建设走进社会管制的狭窄胡同,甚至偏离和谐社会的大目标,侵犯公民权利,加剧社会矛盾与冲突。

譬如“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只是在十七大报告“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一节中提出的,限于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这虽然很重要也很迫切,但没有触及社会结构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调整社会物质与精神资源的公平占有与分配体制;平衡社会主体的权利与国家权力互控互动的结构改革,似非治本之上策。

又如有些党政干部把“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抹去了“创新”这个前提,消极地、片面地、墨守成规地理解为:以党和政府为单一主体,去单向“加强对社会的管理”,而不是依靠社会的自治和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而所谓“管理”,则将之等同于对社会的行政管制、政治控制;对社会矛

盾冲突与社会危机不是着重疏导,而是围堵、遏制,甚至打压,以致维稳的经费高于国防预算。

对管理的对象主要落实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而何者为“特殊”,则可能给执行者作任意解释提供很大空间,存在被滥用的隐患。如一些维权律师、公益社会组织、外来流动人口(如农民工、“上访专业户”)、或被认为有“异质思维”或异见者,也被视为“特殊人群”受到“特殊”管控。把5亿网民、3亿多微博用户以及所有手机用户管起来,强化对公民及舆论的控制。据新华社和《南方日报》报道,2011年初深圳市当局为主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营造社会的和谐稳定”,“展开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将8万名被视为“治安高危人员”“清理出深圳”,而这些“特殊人群”并非现行违法或犯罪分子。至于西南某大城市竟耗资170亿在市内安装了50万个监控摄像头,监控市民的日常生活,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控城市。

这种管控的部分法律化,则体现在新公布的刑法修改草案的某些规定中。按照这个修改草案规定,警方可以在未经检察院依法批捕和法院判决有罪以前,就“有罪推定”地认定某公民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从而可以擅自“合法”地秘密拘捕他,而且无需通知其家属(须知即使是绑匪,为勒索钱财也会通知被绑者的家属)。这种可免除公安通知义务的秘密拘留、秘密逮捕,以及草案规定的可对此类犯罪嫌疑人秘密进行“特殊技术侦查”(这意味着可以“合法”窃听电话、拆阅私信、封闭网络、跟踪监视……),而且通过这种特殊手段获取的资料可以作为审判的证据。凡此种种,已严重超越了正当法律程序,又缺乏或基本没有规定相应的制约权力和权利救济的规定,给公安部门的滥权大开方便之门,公民可以轻易被秘密拘押、失踪,警察权大大扩张。难怪外电称,这个草案如获通过,将是“公安机关的重大胜利”!

再如2011年10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未经公布草案、征询公民意见的程序,就通过了《关于修改身份证法的决定》,其中两条涉及侵犯公民私人信息隐私权:一是将指纹信息增加为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二是扩大警察查验身份证范围,将“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

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纳入查证范围。这就大大扩大了查验范围,而且授权区政府就可以决定什么是“重大活动”和查验的场所。此外,公民的第二代身份证内都要安装芯片,用卫星定位来监控每一个人。这样,全体国民的私生活也都被置于公权力随时随地的广泛窥视、监管之中,13亿人可以全部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个人信息安全则受到威胁。

如果“创新社会管理”竟是在上述这类“重管理、轻保护”的立法思路下的“创新”,则社会管理的加强,必将导致侵犯人权行为的加剧。这就很可能导致中国走向“警察国家”。这是违反我国宪法确认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的。保障人权是国家的宪法义务。社会管理的合宪性事关每个公民的切身权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切和担忧。

二、社会管理创新应重在观念的转变和体制的改革

胡锦涛在上述2月19日的讲话里特别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即社会管理改革创新”。不破不立,首先要转变管理社会的旧思维,改革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要害是明确社会管理的主旨,管理的主体与客体,把握管理的限度,使社会管理与保障人权平衡,防止过度控制,侵犯人权。

(一) 明确管理的主旨、主体与客体。

前已指出,创新社会管理是“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大目标下的一个子课题,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大目标的。社会和谐是衡量管理的成败得失的尺度,而和谐不单以是否维持了某种秩序为检验标准,在强制力的高压下,也可能取得暂时的、表面的安稳秩序,但那并未化解矛盾,而可能是隐藏、积压了矛盾,甚至激化了矛盾。

既然我们认定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精义,简言之就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在宪政国家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主体的权利和社会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国家/政府的权力为本位。社会是“社会的社会”,而非“国家的社会”相反,国家倒是社会的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国家权力是社会/人民赋予的),社会要监督、管理国家,国家

权力要为社会、为人民服务。所以,社会管理的主旨就是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管制社会,压制人民。

基于此,社会管理不应当理解为主要是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管理社会,更不能是国家单向控制、统制社会。社会管理的主体首要的应当是社会自己,社会应当享有充分的社会自治权力和民主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根据宪法第二条第三款,人民(此处指公民和民众)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国家(政府)是社会管理的第二层次的主体,即经由社会(人民)授权治理社会,其职能和义务在于尊重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为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促进社会福祉提供公共服务产品。

至于社会管理的客体,应当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不是对公民的私人活动和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加以过度的控管。党和政府无权垄断经济和社会生活,更不应垄断思想文化。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职责是营造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在取得公众的认同和协助下,协调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权利与机会的平等关系,社会物质与精神资源的公平占有与分配关系,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法制,等等。

(二) 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由于权力不加制约就天生地有扩张性、专横性,特别是在社会管理领域,权力作为强势主体,面对弱势的公民就易于侵犯其人权和公民权,因而必须“控制控制者”,把这些曾经是“领导一切”即控制社会一切的党政权力本身首先控制起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以遏制其不受法治与人权约束的专横。为此,在加强社会管理的同时,还应谋求管理与保护的平衡,行政权力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和互控。不能只是无制约地单向地扩大行政权力,侵权越权。

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而且所依之法也必须是保障公民和公众权益的良法。近年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维护本地方、本部门的权益,以法谋私,制定一些违法违宪的“红头文件”,号称依法行政,实际上是以非法之法甚至以恶法行政,或者干脆违法行政,暴力执法,造成流血惨剧。这类“社会管理”不是化解而是加剧了官民矛

盾冲突,与建设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三) 社会管理的社会化

社会管理也不能只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单向行政管制、政治控制,而需要着重依靠社会组织的自治和社会主体协同党政共同治理。

目前我国提倡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是比过去有所改革和进步的模式,但不应当以之作为唯一的模式和准则。我们还应当有多元化的管理模式。譬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国家公权力与社会组织公权利的互动互控、协同管理,进而由社会组织主导、政府辅助、公众参与、社会自治的模式。后面两种优于单向的党政管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早就强调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理念和原则;要“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等等,这些都是十分明智和有远见的治国决策和社会管理的方略。如果我们同时能重视对公民权及公民社会的公权利的保障,抓紧有关这类公权利的立法,使公民社会的结社权、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得到有序的畅通行使,使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社会潜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必然大大有益于对国家治理,有利于社会管理,而且这比之基本制度的改革也较轻而易举。特别是作为省、市基层政府在依法治理中,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很难或无权措手;而依法尊重和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在“为人民执政”过程中,采取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靠人民执政”的理念与方略,就会事半功倍。

在当代世界各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家—社会二元并存,多元利益群体日益形成的局面下,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国家权力不再是控制社会生活的唯一手段与资源。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开始拥有自己的一些物质与精神资源,从而也能运用这些资源,对社会与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支配力。这就是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它同国家权力是并存和互补互动的。

由于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利益诉求

极其多样化和复杂化，政府的资源与能力有限，信息有时不免失灵，政府权力鞭长莫及，加上官僚主义和腐败，留下许多未能做或不便做的公益事项，也有必要通过公民和社会组织自动地运用他们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去弥补和救济。

非政府组织现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社会权力越来越多样化、分散化和强化。各种社会组织按其性质与分工，分别拥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有的还有宗教权力。政府已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当然仍然是治理社会的主导力量），很多社会事务已由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力来治理。有些社会事务是政府不能或不愿做、不该做的，非政府组织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并且利用其资源优势，有些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它们的崛起还可以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国家，即使是民主的法治国家，只能保障国家有序运转，并不能无遗漏地完全维护社会的公益和公正。民间社会利用其资源与社会权力，可给予补救。特别是对社会的弱者和弱势群体给以扶助，对多样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动地自愿地做出及时反应，对违反伦理道德的事以社会舆论的压力给予纠正，弘扬公共道德和服务精神，从而也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起推进作用。

德国法兰克福有一个由一位 70 岁的老太太建立的协会，由她组织和指挥一些志愿人员，每天到面包房、旅馆和市场去收集当天没有卖出去的面包、蔬菜和食品，再分给无家可归的穷人。这种“小事”“小惠”，是政府不会也不屑去做的，这位老太太行使她结社的权利和这个协会的“社会权力”，对穷人却是活命的救助。（参阅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安杰·福尔默：《法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德行政法研讨会论文，1999 年，北京。）

至于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社区服务组织等等，在协助政府承担许多社会公共事务和照顾公民生老病死、失业后的再就业、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等等日常生活问题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上世纪 50 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 44 个。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目前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有 45 万个，备案的社会组织 25 万个，实际存在 300 多万个，年均增长 8%~10%。虽然这比

之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民间组织，按人口比例计算，差距是很大的。即使如此，我国这些民间组织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们中大多数是协助国家和政府治理社会、为社会谋福利的积极力量，也是防范国家权力腐败的制约力量。它们在汶川地震以及北京奥运和其他公益救助事业和维权活动等方面已初显功力和良效。可惜这个雄厚的社会力量还处于潜在地位，一些党政干部囿于传统的思维，还不愿或不敢放手鼓励民间社团的发展，不大尊重公民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中国的民间组织的成长，还受到一些非必要的掣肘。迄今中国还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结社法》或《社团法》（法律），而只有由国务院制定的、限于行政管理的《社团管理条例》（行政法规）。迄今也没有新闻法、出版法等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法律。已有的一些民间社团还受到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歧视与打压。有的党政干部甚至声言“公民社会”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这实属过度敏感和杞人之虑，是不利于发挥民间组织的自主自治权力和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功能的。

鼓励和支持那些有益或无害的民间团体的发展，也有利于通过它们出面组织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性活动，使之转化为有序行为（如本是正当的、合法的游行示威，群众一时激于义愤，发生不法的打砸行为，则社会组织可以出面加以引导和自律，这比动用警察直接出面干预要文明而顺当得多）。政府如果善于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同邪恶组织作斗争，对遏制民间邪恶势力与非法组织的横行，也可起到政府不可代替的作用。通过吸引群众、

特别是青年参加有益于身心的社会组织，还可以防止他们被邪恶组织所诱惑进去。如果工会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上有一定的独立权力，则国企负责人侵吞股份、资产的行为、管理者腐败的行为、影响环境保护和资源浪费行为等等，都可以通过工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和遏制，而不必只靠国家的审计总署的单打。工人的利益主要应该由工会捍卫。在对外关系上，有些事务也可以不必政府直接出面，而按国际惯例，由相关的民间组织来处理，就可以回避许多在国际关系方面敏感的、碍难干预的事情。（转下页）

“失踪条款”违反基本道德原则

○ 余良明

人大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所引起的激烈议论,主要集中在其中的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所意指的如下内容:在“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下,当局可以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而不受“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规定的约束;而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是否应该通知、最迟应该在什么时间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也不做明文规定。简单说就是当局可以借上述理由对当事人实行秘密逮捕而让其无限期失踪。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失踪条款”。许多人就法律层面议其得失,本文从道德角度论其是非。

法律的基础是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与道德有区别但也有联系。二者的区别很明显:道德规范的对象法律不一定禁止,如见死不救为道德所严厉抨击,但中国法律不对之施加惩罚;婚外性行为虽然不被法律明令禁止,但为道德所强烈谴责;这说明法律所禁止的范围比道德规范的范围狭小。道德鼓励和提倡人们兼爱成仁、博施济众,但是法律并不强逼人们必须舍生取义、扶贫救困,而只是规定“不许杀人”、“不许偷抢”等。这说

明法律只是道德规范的最低下限和消极部分。但是法律所禁止的必须首先(逻辑意义上)也是为道德所禁止的(如杀人与偷抢),即法律不能与道德规范相冲突。如果法律与道德规范的最低下限或消极部分——亦即为维持人类社会存在最必需的规范要求相矛盾冲突,那么不但会造成法律在逻辑上的“概念自毁”或“理论自败”,而且会造成社会崩溃的大灾难。这是法律与道德密切联系的一个方面。法律与道德的这个具有生命般、本质性的关系属性很少被当代的中国法律人关注 and 深入探讨,以至于出现了现在这个与道德下限规范相冲突的“失踪条款”。

那么这个“失踪条款”到底与道德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呢?严格地说,它不是与道德的哪一部分具体内容相冲突,而是与道德的最基本原则、法则、方法、标准或规则(这些概念随使用者的不同侧重而选择)——即“金规则”相冲突。

—

“金规则”也称“黄金法则”,这是表示这条法则的重要性和尊贵性。“金规则”有肯定与否定两种形式之分。否定的形式:不要按照你所不希望

(接上页) 总之,公民、公民社会是政府的助手而非对手,更非敌手。像韩国民主转型以后,过去被视为“反政府组织”的民间社团,现今被当作政府的同盟者,由“敌手”成为帮手。政府应当自觉地运用公民社会中这些积极的社会力量,使之支持、协助并监督政府依法、正当、有序地进行市政管理和执法运作。尊重和善于运用公民社会和公众参与国家事务和管理社会的权利和能量,实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形式和途径。

离开公民社会及其社会权力对国家和社会

日益增长的作用,侈谈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实行民主宪政和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管理,是舍本逐末。现今执政党重新强调“联系群众”,就应当着重联系公民社会。脱离或排斥公民社会,甚至加以抵制、打压,就不可能对社会管理有创新的改革和建立真正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肯定的形式：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我们看到，“金规则”的肯定形式对应于道德所鼓励和提倡的部分；否定形式的内容正是道德规范中的消极部分——狭小和最低的要求——也正对应着法律所禁止的对象。

“金规则”的典型表述之一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条法则的最大特征是它以个人自我为参照标准并将他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一视同仁地看待。人类的感觉、想象、理性都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在如何对待别人的问题上，只要反求诸己，拿自己一比较就明白应该怎么做。因此孔子又称这条法则为“恕道”。恕字是“如心”，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自己怕疼惜命，就要知道别人也怕疼惜命；自己被伤会痛，就要知道别人被伤也会痛；看到有人被杀死去，就知道自己被杀也会死，所以就不要伤人杀人。自己不愿意劳动所得被偷、被抢，就也不要偷、去抢别人的东西。自己的房子未经同意不愿意被别人拆掉，也就不要强拆别人的房子。自己不愿意被精神病、被失踪，也就不这样对待他人……

“金规则”从形式看是理性伦理，但其内容实质却是建立在人的感性世界上的，所以这个道德主体的“自我”很大程度上是感性个体。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是“金规则”的否定表述形式，但是孔子和儒家也有肯定形式的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孟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积极精神，把这个指导个人修身齐家的道德原则加以扩大应用到政治上，形成忧乐与民同的政治道德——即“仁政”。孟子鼓励齐宣王把及于禽兽之恩的“仁术”推广到天下四海的百姓，以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类和谐社会。而两千多年前中国齐宣王的“舍牛”举动（见《孟子·梁惠王》上）与近代美国历届总统在感恩节赦免火鸡的仪式传统可谓是古今中外异曲同心（同情心）的表现。只是将“仁政”制度完全诉诸人类的正面感性能力（人性善）的引导，这是儒家的与众不同之处。

这条法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可逆性”，即它把自我作为对待别人的尺度并允许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这其实就是康德《实

践理性批判》中的“可普遍化原则”——“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意即你立的法则不但对别人有效，同时要承认对你自己也有效，即你自己也愿意别人拿这条法则来规范你。可逆性犹如数学等式的两边和天平的两端，是可互换的，其意义就是平等。平等构成了正义的核心。所有不可逆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任何例外或拥有特权的要求都必须被排除在“金规则”之外，以保证它是一条公平公正的法则。公平正义不但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法律的全部精神（法律的标志性符号天秤就象征着公平正义）。因而这条毫无例外，针对所有人包括自己在内的法则满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正义要求。立法如果违背它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就无异于法律自杀。

被儒家纳入“治国平天下”政治道德中的这条法则在具体阐述时又被称为“絜矩之道”，成为处理上下、左右、前后人际关系、衡量一切领域道德是非善恶判断的标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大学》第十章）“絜矩”是衡量事物长短方圆的标准工具，“絜矩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规则”。文中的“恶”就是“己所不欲”的“不欲”。统治者如果能按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尺度来处理与全体人民、全社会的关系，国家就能和谐；反之就有身死国亡的危险。在这个阐述的后半部分，参照中心从“君子”转移到了“民”，似乎不是以“我”的好恶而是以他人的好恶为标准作判断的依据了。其实这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金规则”的完满体现。这个转移完成了从关注自己到关注他人的“以己度人”、“将心比心”的过程，承认了自己与他人所共享的同一个道德标准，实现了这条“金规则”的目的。这条规则的目的正是要求道德主体要把他人看作是有着与自己同样的欲望与恐惧的主体而加以关注。

你愿意自己被人秘密逮捕而不通知你的家人吗？如果你自己也不愿意，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更不要立法运用于所有的人。在你考虑愿意

不愿意时,要充分运用你的感觉和想象力。试想你自己被秘密抓捕关押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黑屋子里,手机被没收,切断了与家人、亲戚、朋友的一切联系,你拍遍四壁,找不到任何逃生希望的那种恐惧(这里暂且不设想酷刑的痛苦)。然后再想象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孤苦的妻儿发现家里顶梁柱失踪时的着急和痛苦:他们日间冒着凄风苦雨奔波于街头巷尾张贴寻人启事,到路旁、河边、码头、车站打听消息,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家彻夜难眠,叹息和哭泣声时断时续,已经晾了好几天的饭菜还在餐桌上原封不动地搁着……

记住,这里面的主人公是你,一定是你,而且还可能是无辜的你,这一切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你的家里!

显然你立即就可以做出决定说:我不愿意。接下来你是否会同意立法把这个为自己的意志所否定的条款施加于与你自己有着同样感觉与意志的他人?

二

不仅孔子儒家提倡“金规则”,人类许多种族、国家、文化和宗教如印度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伦理传统都曾经提出和坚持过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着同样本质但不同表述的“金规则”。

然而,“金规则”虽然客观上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威,但由于受人性(人的本质)自身的优点和弱点——自由与自私——的巨大影响,人类又总是容易忘记这条法则,而常常选择一条与之相悖的道路行事。

农民忘记了“金规则”,所以把自己不吃的毒菜推向市场卖给别人,而另外种一片真正的绿色食品留给自己……

工厂企业忘记了“金规则”,假冒伪劣产品铺天盖地泛滥成灾、豆腐渣工程此起彼伏……

商人忘记了“金规则”,苏丹红、孔雀绿、黑心棉、吊白块、瘦肉精、减肥药、三聚氰胺、染色馒头……五光十色,五花八门,诱骗着城乡市民男女老幼……

驾驶员忘记“金规则”,撞人后见其未死不救反而来回再碾压或加刺八刀……

官员忘记“金规则”,损公肥私,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后携款出逃……

医院忘记“金规则”,治病救人的善业变成了图财坑人的屠宰场……

学院忘记“金规则”,教书育人的育才事业变成了误人子弟的创收产业……

法院忘记“金规则”,主持正义的法官变成了贪赃枉法、终结正义的刽子手……

所有罪过行为都因“金规则”的不在场而发生。

现在轮到立法者忘记“金规则”了。但它的被忘记却是以“备忘录”的形式出现的。“失踪条款”以个(国)别的特殊性(“颠覆国家安全罪”)名义挑战“金规则”的普遍性、以相对的条件(“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为由挑战“金规则”的绝对命令。他们从某些部门的工作方便出发,记住并特地突出强调了个别的特殊条件,但却忘记了这个“金规则”的“可逆性”和感性自我。由于立法者自身个体的身影被重叠在行业、政府、国家和党性等巨大的集体抽象阴影里,从而消失了个人的立场和感觉,在自我意识模糊不清甚至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完全听不到感性自我和“可逆性”提问的声音。这样,这个“失踪条款”就在“忘我”的情况下避开了“金规则”的关键检测而准备披上合法的外衣登上法律的殿堂了。然而,只要立法者从那个巨大的抽象阴影里走出来,还原到个人自我的真实感性世界里,根据可逆性原理,就可以立即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也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这个条款与“金规则”的矛盾冲突,从而判定它的非正义性:

如果这个“失踪条款”只用来对付他人不对你自己,根据“金规则”的可逆性原理,那显然是不正义的;

如果它也用来对付你自己,那么真实的你肯定不愿意。既然“己所不欲”,就要“勿施于人”,这样就暴露了这个条款在实质上处于直接与“金规则”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金规则”借立法者自己否定了该条款的正义性;

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即某个立法者竟敢公然宣称他愿意被秘密逮捕失踪而不必告诉他的家人,那么,他不是智障就是在欺骗。对于前者,表明他是个无道德意识因而也丝毫不具备法

律概念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充当立法者?对于后者,他与合同欺诈又有何区别?

“金规则”简单易行,其标准又随时带在身边,为何如此容易被我们忘记?原因除了自私和失去自我感觉之外,关键是我们面对临场问题时几乎完全忽视了这条规则中所隐含的惩罚。这个忽视与两个因素有关:一、这种惩罚是滞后的。因为“金规则”是一种与当下立即发挥惩罚作用的构成性规则(如体育、棋类比赛规则)不同的调控性规则,它所规范的行为或事件在逻辑上可以独立于本规则而发生,规则只能事后甚至是很久以后才能追罪加罚。二、这种惩罚似乎是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的。它的惩罚看起来不像交通规则(典型的调控性规则,也是在发生了违规的交通事件之后才进行事后惩罚)那样的具有确定性和显见性。这是“金规则”容易被人们忘记的内在原因,其外在原因当在于现代中国摧毁礼俗规训与宗教信仰,报应意识被认为是迷信。

但是你忘记“金规则”并不等于它的惩罚也忘记了对你。在做了违反“金规则”的事后“金规则”会启动它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形

式,按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公平原则“请君入瓮”。谓予不信,请看古有商鞅、李斯、周兴,皆作法自毙;近有反对“司法独立”的党政高级领导人乃至国家主席宣称“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等公然违背“金规则”可逆性的言行(参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于一夫“‘以党治国’面面观”),这些人最后皆自食其果,在“文革”中进了自己亲手建立的黑监狱甚至被迫害至死。这难道不足以引起当今立法者的警戒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条指导人类处理社会关系和决定社会行动的最基本道德原则。由于它是最低道德标准,遵循它不一定就等于为善,但这是避恶趋善的前提,违背它必定是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必然遭受严厉的惩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失踪条款”违反了“金规则”的道德基本原则,我“不欲”它立法通过,我也希望不将它施加于所有人包括立法者的身上。■

(作者单位 福建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监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党内分权制衡的来历和经验

○ 思 源

关于党的自身制度的改革问题,我想引用胡耀邦的一段谈话。

胡耀邦曾痛心地说:“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个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在表决前,她说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绝举手,真是难能可贵。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党本身的改革是关键,也是难于起步的难点,不能操之过急。十年、二十年后,这些问题总会提上会议桌的。”《百年潮》杂志2000年第一期《88年冬:与耀邦同志谈心》

胡耀邦讲这番话的时候是1988年,10年、20年之后的1998年、2008年,党的制度改革问题仍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今年就要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到了把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了。

一、早期国际共运的分权制衡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组织系统自下而上是: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

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同盟的领导体

制实行分权制衡:

一、各级领导自下而上选举产生,不由上级委任。

二、代表大会是全盟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关于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经总区部转中央委员会,再由中央委员会提交代表大会。

三、全盟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8月举行。

四、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审议。遇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选读》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先后建立了三个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其中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它们留下了正规的章程可供后人借鉴。

1871年马克思亲自执笔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4、5条规定:“每年召开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地。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

“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要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共产国际章程第4、5条规定:“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的世

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只有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共产国际纲领。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纲领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

“世界代表大会选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它只对代表大会负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

这些文件充分反映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立的领导体制是“代议制”。掌握决策权的是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无论叫总委员会还是叫执行委员会）则是掌握执行权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要对决策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决策机关实行年会制，即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执行机关的工作，牢牢地把握大方向。按照这种优良传统，执行机关有错必纠，很难越权脱轨、自作主张，决策权与执行权便能实现有效的分权制衡，推动国际共运蓬勃发展。

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分权制衡的领导体制，延续到列宁时代，也延续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改名为共产党）。

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4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召开，每年一次。”1917年十月革命后，虽然当时国内外环境依然十分恶劣，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在1918年到1923年间共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

党代会年会制的目的在于保证党代会是党的权力中心。不过，由于党代会一年开一次，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其权力中心的地位往往会被中央委员会或其他机构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33条特别强调：“遇紧急情况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非常代表大会”作为年会制的补充。列宁坚持了这种做法，并开创了党的“代表会议”制度的形式。党的代表会议由党中央召集各省委和各民族地区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其规模和职权比党的代表大会小一些。俄国共产党1919年12月规定，党代表会议每3个月开一次；1921年规定每年开两次；1922年规定在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一次，目的是避免党代表大

会权力流失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去，以防喧宾夺主。

在党的建设中，列宁一贯认为，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党的决策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过度集权，除了中央委员会分设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之外，还特意规定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使如此，列宁仍然很不放心。在列宁的倡议下，1920年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其中第十九条指出：“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列宁想把党的监察制度发展成为分权制衡机制。

晚年的列宁集中思考和探索了俄国共产党如何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他以口授的方式写下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著作。

显然，列宁是想将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一律置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这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制衡的思路，这种思想如果能够贯彻始终，对于保证共产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复杂的原因，列宁的这一探索随着他的逝世而中断。尔后，已经担任俄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逐步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为日后苏共和苏联的垮台留下了隐患，同时也贻害了其他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

二、集权制之害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把俄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年会制越拉越长，由每年开会改为2年一次、3年一次、4年一次，甚至十多年都不开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控制的俄共中央便长时期无须向党代会报告工作和接受审议了。另一方面在人事上架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并于1934年修改党章，把专门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改为专门监督下级地方党组织是否执行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于是，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

列宁时代所建立的党代表大会（及党代表会议）行使决策权、中央委员会行使执行权、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这样一种分权制衡制度，终于被高度集权的体制取代，走上了一条惨烈的不归路。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列宁原先的同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皮达可夫等等被作为“人民公敌”处以死刑。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据1988年4月17日苏联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被杀害或被判处劳改的共计有5000万人，约占苏联人口总数四分之一。

斯大林大规模“肃反”的程序是：不允许被告申辩和上诉，死刑判决后立即执行。

三、集权制与中国历史上的人祸

先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

“一大”——1921年	“十大”——1973年
“二大”——1922年	“十一大”——1977年
“三大”——1923年	“十二大”——1982年
“四大”——1925年	“十三大”——1987年
“五大”——1927年	“十四大”——1992年
“六大”——1928年	“十五大”——1997年
“七大”——1945年	“十六大”——2002年
“八大”——1956年	“十七大”——2007年
“九大”——1969年	

从这张时间表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六大”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按照共产国际的优良传统，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八年开了六次。而在1928年“六大”之后，直到1945年才开“七大”，中间隔了长达17年，这期间共产国际还

多次发电报催促中共中央该开党代会了。

中国共产党1945年“七大”之后，直到1956年才开“八大”，中间又隔了11年。“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和年会制，即党代会每届任期5年，每年举行一次。这个规定后来又落空了。1958年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就再也没有八大三次会议了，直到1969年才召开“九大”。此时离1956年的“八大”，已相距13年之遥了。这13年是不是没有什么党国大事需要代表大会来决策呢？

请看令人痛心的史实：

——1957年搞了一场反右派的“阴谋”。到底打了多少右派？统计口径不一。有的说是55万，有的说是300多万。《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2期《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总而言之，反右派这件事不算小吧，到底该不该搞？应当如何搞？这场运动为什么会扩大化，为何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打错了？这个错误是不是在集权体制下造成的？当然是。这件大事在事前未经党代表大会决策，事后未见党代表大会审议。

——从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开始，全国反右倾，在干部中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政策左上加左，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年内全国饿死数千万人。此事事前未经党代表大会决策，事后也未见党代表大会审议，甚至长时期向全党全国人民封锁饿死人的信息，还要人民歌颂三面红旗。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也未经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策。据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这场古今中外的空前浩劫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的1/9，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见安徽人民出版社《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1998年第1版）此外，大中小学将近10年不能正常上课，全国停止招考研究生达12年之久。

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高度集权的条件下，中共“八大”以来，党代表大会未能按规定行使决策权，未能按规定制约执行权，未能有效发挥监督权，是与反右派、大饥荒和“文

革”这三大祸联系在一起的。

四、分权制衡之必要

斯大林的集权体制建立并贻害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尤其是个人迷信盛行之后,制造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共产党的主体是党的上层领导人,全体党员都应当服从某一个领袖,一人可以凌驾于百万千万人之上。而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尊重党员主体地位”。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要求“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

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肯定,这是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正如君主国以君王为主体、民主国家以公民为主体一样,民主型的政党也必须以党员为主体。

民主型政党正是因为建立在党员为主体的基础上,所以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就是党员选举产生的全国代表大会。党代会行使全党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而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工作机构和监督机构则分别掌握执行权和监督权。于是,党内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便成了普遍规律。

实际上当今世界不仅现代政党制度、现代国家制度必须实行分权制衡,而且现代企业,以及各类官方非官方机构、盈利非盈利组织,都是如此。权力需要制约,任何权力不受制约都不得了。无论对企业领袖,还是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仅仅凭主观上相信其公心或能力,是靠不住的。办事业,还是需要制度的制约力作保障。

譬如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至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刘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文革”还会发生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如果能够实行,将是一种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在决策权与执行权合一的体制下,中共中央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策的过程中,即使已经发现饿死了许多人,也不愿及时修改自己做出的“高举三面伟大红旗”的决策,反倒要打击彭德怀等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同志,以维护“英明决策”的面子。这也是搞“议行合一”,没有分权制衡所导致的悲哀。

痛定思痛,太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动人们不得不思考分权制衡问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得很明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能休止。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是的,分权制衡,说透了就是要用权力制约权力,使两种(或多种)权力达成平衡,以利于社会发展,减少人为的体制灾难。■

(责任编辑 杨继缙)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 程 敏

2011年12月3日,在邓小平为推动陷入停滞的改革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来临之际,为探讨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经济观察报社共同主办的“2011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江平、胡德平、保育钧、郭道晖、李楯、秦晓、陈小鲁、何迪、陈全生、王公义、周为民、周天勇、王海光、蔡霞、孙立平、马立诚、雷颐、石小敏、马晓力、黄方毅、张宏遵、虞崇胜、唐欣、于建嵘、秦晖、杨继绳、吴思、张剑荆、袁绪程、盛平、新望、章立凡、陈有西、王占阳、汪玉凯、李永忠、陈行之、童之伟、王彦君、朱学勤、朱善利、米鹤都、崔武年、王至元、罗点点、胡冀燕、林京耀、李丹钢、许向阳、徐景安、丁力、王霄、鄢烈山、陈坡、彭真怀、何兵、华炳啸、傅蔚冈等国内思想界、学术界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者围绕“现状与未来——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是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摘录。

一、对改革开放的回顾与反思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一般来说,在苏共发生的事情,总是要二十年以后,才能在中国发生。但是唯独上世纪70年代的这场改革,我们提前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发生了“文革”。激发中共改革一个关键性的要素是什么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设想,自始至终是要整党内走资派。所以十年“文革”准确地说,是官不聊生的十年。正是由于“文革”极端的刺激,安子文出监狱第一句话就问,谁来监督毛泽东?如果没有“文革”,安子文这些人,不可能问出这些问题,是毛逼官反,十年官不聊生,产生了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愿望。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 肯定毛泽东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比如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是按照“文革”以来的既定方针办呢,还是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一条新路,而且对此新路也需不断严肃认真地检验呢?我的观点是选择后者。不取后者,就没有今天的成绩。即使对今天发生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改正。

唐欣(政治学家) 共产党在这三十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陈云同志先提出来,小平同志附议,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第二大成绩是“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的理论是执政党适应混合经济所有制以后,执政党格局的一个办法。第三个,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 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我们这三十年的时间,是处在一个改革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假定,有一个起点,就是计划经济,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还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还有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它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一个过渡中的形态定型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制。用另外的一个表述来表达,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了。

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学院院长) 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各个地方城市化的推动,要地不要人,造成了1.3亿的失地农民,1.3亿到2.5亿的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这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动荡不安的根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不是改革的时机和压力不足的问题,改革的时机和压力就在我们眼前。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没被城市所接纳。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有个和过去农村境遇的比较，能够安于城市的底层生活，那么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是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但是他们也不能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中去。如果处理不好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造成以后社会崩溃的社会力量。

与失地农民相对应的，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学生，大批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没有工作，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所造就的问题，恐怕会造成下一步的社会爆炸。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当前的政治危机的最大焦点实际是官民矛盾。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方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下实施高压维稳，尽管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终究会因缺乏正义性而使官民矛盾更加激化，导致更大的动荡。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目前改革的压力是维稳，背后原因是失控。失控表现在：第一，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比如中央的法令地方不执行，比如拆迁。第二是党组织对党员失控。比如出事的官员都腐化。第三，是人民对官府的失控。小事没人和你讨论，大事不让你讨论，说是政治，只有政治家讨论。第四，是道德对人心的失控。四种失控不断强化，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原因在这里。

鄢烈山（《南方周末》评论员）：当年搞改革开放，就是出于民间的压力。现在，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压力来自权利意识。这种要求民主宪政的压力，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更高层次的，是正当的、有益的。这些压力都是改革的动力。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没有压力，就没有改革。中国改革的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出现了退步，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了民众与执政的、中央与地方多层关系的利益博弈，越来越多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民众的所谓抗争越

来越强。众多的一票否决，是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采取各种方法来消减中央压力，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政治板块，中央、执政政府和民众，中间的空隙是我们要探讨的。

二、当前政治经济面临的困局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党政不分是我们政治体制里面长期的一个弊端，这是当前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党权和政权，应该说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是分不清的，党权也就是政权，政权也是党权，因为政权是党打下来的。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书面发言）：西方各国政党对官员任用权的控制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因为无论它们的控制多么紧，都始终给公众留下了选择的权利。而我们的问题在于把“党管干部”简单理解为党委、组织部门甚至书记说了算，这就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公众的选择权对立起来了。

郭道晖（《中国法学》原主编，法学家）：中央提出的理念或口号，从字面上看来是美好的、必要的，但在落实上经常遇到某些主管部门和地方当局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诸多阻力，导致落在枝干，而回避了根本，甚或偏离、扭曲了这些口号的本义。

陈小鲁（政治学家）：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怎么样？我认为应该变成上下互动，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很好，学术界、思想界都生动活泼，有左派，也有右派，这样一个矛盾交锋的结果，也可能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2001年以后，我感到改革仍在继续，但面临的问题也多了，主要是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它们取得国家或各方面资源的支配权，要固化这些利益，这样激化了多数弱势群体和少数强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突出，各种群体事件爆发性增长即为证明。

第一个十年，是上下结合搞改革，老百姓有要求，领导层也支持，当然也有矛盾，包括反精神污染等，但总的趋向还是上下结合搞改革，社会多数人认同改革，包括党内高层、中层和基层老百姓。后来十年，强势集团利用权力，攫取改革成

果,甚至以维稳为借口,封杀反对意见,把持话语权,引起社会不满,对改革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了。

孙立平: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间是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过程,总要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是指一套制度的转变,结构变迁是指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前半段是体制变革推动结构变迁,体制变革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到了后半段,实际上是在体制变革当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定型了,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个转型陷阱的逻辑就是这么发生的。谁在定型这个东西?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垄断国企集团、金融-虚拟经济集团,这是最主要的三股力量。定型下来的是什么东西?最简单地讲,就是权力加市场的体制。然后这个体制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概括成三个东西:一个叫畸形发展,第二是定型的结构,第三是溃败的社会。

周为民(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教授):本来是作为改革对象的那样一些旧体制的控制方式,现在在“中国模式”的名义之下,重新被肯定为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不少言论所宣扬的所谓“中国模式”,我认为是随着转型中的变形,依仗特权、垄断等势力而生长起来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或者特殊利益群体,企图把现有的格局,也就是权力控制市场的这样一种体制合法化的一种做法。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下端改革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端,一直没有实际的推进。我把中国政治体制分为上端下端,下端是行政体制改革,上端还有更核心的要素:第一,宪政体制;第二,政党政治;第三,社会主义民主。第四,社会主义法制。在政治体制上端的四个层面,更具有决定意义,恰恰这四方面我们提出的仍然不够。

周为民:中国这样的一种改革,它的方式是渐进的方式,渐进改革的方式,它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有这样几点:

第一,因为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所以改革当中的每一步推进,包括每一个改革措施,往往

都是与旧体制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旧体制的妥协,可能是妥协过大。第二,我们在渐进改革当中,往往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就是始终回避、绕过实质性的改革。第三,就是改革当中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第四,就是在这个渐进过程当中,旧体制的控制方式、控制因素,乃至一些控制机关,它的权力,它的控制方式迅速地进入刚刚形成的新的市场关系当中。

陈坡(政治学家):现在应该要提出非常具体的落实1982年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主张。为了落实公民权利,有三个法律急待制定和出台,这就是出版法、新闻法和结社法,如果没有这三个法律,中国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产生。我觉得这三个法律的推出和制定,可能是开启今天和明天宪政改革道路,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既正当又合法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保证。

李楯(清华大学教授):法学界在90年代初就提出,最可担心的,是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

朱善利: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而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严重滞后。前几年经济学界一直呼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到现在为止进展很缓慢。在资本、劳动力、土地三个市场中,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资本市场非常原始。土地市场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使用没有效率。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权力也在逐步扩大,其中一个表现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十年平均计算的话,是21.12%,相当于我们GDP增长的2倍。现在企业和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太重,税种很多,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费,还有财政预算之外的一些收入。而且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合理。许多支出不是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收入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比例很低,行政开支占比例太高。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10%多一些。

王海光:从2000年以后,城市化的进程骤然加快。这种激进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用行政权力,强制实现的发展。各地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谓“经营城市”的方式,是低价从农民

手里把土地套过来,高价卖给开发商,政府拿中间差价。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是盲目开发,负债经营,搞了许多华而不实的建设,政府的楼最高,广场最大。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是卖地,依靠土地财政维持政府的运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如果说过去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是剥夺他们的粮食的话,现在是借城市化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因拆迁征地激起民怨,维护土地权益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在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同时,也给干部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经济问题的病根往往在政治。政治资源由极少数人垄断,而且是按计划分配,是经济上分配贫富差距过大且趋于固定化极为重要的原因。没有政治资源的市场化及民主化分配,就必然形成新阶级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且这个新阶级它的阶层和成员会趋于固定化。新阶级之外的,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无法进入那个圈子,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运用一切手段反对改革或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样一来的话,所有的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都不大可能获得通过,通过了也难以真正实施。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从社会关系上讲,我觉得非常紧张,现在的情况是权力通吃贫富,穷人富人一块儿吃。有钱的人,有本事的人,趁着钱没有被吃完,自己还能够出逃的时候,已经走了。这两年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给我们显示的信号,是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的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不允许贫民窟存在。第二,城中村又给拆了。第三,小产权房又不允许,商品房又买不起。那么这以后城市陆续增加的几亿人住哪儿?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一个事,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政府各个部门没有用未来眼光来考虑这个事,保障房是肯定解决不了的,所有的路子堵死了最后怎么办?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居住,这两个东西你怎么办?城市化这么迅猛地推进,你让他回去种地不可能。我这几年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没给出答案。

吴思(《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 不稳定因素究竟有多大力量?2011年的公共安全预算为

6244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8%,确实超过了军费开支。这可以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度量。维持均衡状态的代价越来越大,也就是稳定性越来越差。任何社会都有公共安全问题,都要支付相应的开支。但我们知道一些现有体制特有的不稳定因素。

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这是一大类,背后牵涉到公民权利的保护,还有不健全的司法制度。土地问题牵涉到土地产权制度,还有土地财政以及财政制度这一系列的事。

另一大类,包括对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防范。还有对媒体的控制,从报刊出版到网站和微博,这方面也是耗资巨大。

这些东西的背后,又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涉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自主,涉及传媒和文化产业的控制,涉及全社会的道德重建。这是一些隐性的成本。更进一步,还涉及所谓的软实力问题。中国在这些领域里不能取得应有的成就,其实就是变相支付成本。

所以,这个体制虽然基本稳定,但前景并不那么乐观,当然也不那么悲观。继续坚持下去,集中资源,大笔投入,稳定十年八年未必办不到。有的老师说,新一代农民工,失业大学生,可能是乱源。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正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再把“非公36条”多落实几条,增加就业机会,不见得就乱得起来。政治体制依然可以不动。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江平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第一个原则就是党权和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绝对不能混淆。政权是公权力,而党权是领导权。第二个原则,就是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必须有人民授权作为基础,这个权力的合法来源来自哪里,应当明确。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地方有权力,什么地方就要有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应当一致的,应该有监督的机制和责任的机制。

郭道晖 作为执政党,最迫切的改革任务是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依宪执政。

胡德平:毛泽东谈到2001年中国将成为一

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无疑这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物的方面,但精神方面呢?我认为还应该把社会主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宪法、宪政贡献给世界,贡献给人类的进步事业。

保育钧(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说到底,中国的事,这个改革,那个改革,不解决什么叫党的领导问题,解决不了。党的领导,第一是政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人事权,第四是思想权,第五是财权。现在只能抓住具体的问题,党的五个领导权一个一个来落实。把党的领导分解一下,一个一个地来往前突破、渐进式地一步步往前推进。

我从财权入手,写了一篇《加快财政体制透明化的改革》,希望财政透明。财政问题是政府在抓的,但财政领导小组都是党而不是财政部抓的。现在是进了一步了,透明一点儿,尽管还不满意,报流水账。但是还有三个部委,外交部、侨办等,到现在不公开。财权现在还可以掀开盖头布来看一看,掀开一点点难度就相当大,公共财政全公开很难。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目前,可供选择的政改路径主要有四大类,即财政公开化路径、社会自由化路径、基层民主化路径与宪政制度化路径。财政公开化、社会自由化、基层民主化的积极推进,能够推动实现局部的“增量民主”,为宪政制度改革积累有利条件,但政改的成败最终还是要看系统性的“存量民主改革”——即国家宪政制度改革。

积极稳健的正确选择也许是,优先推行经济改革,再推行社会改革,最后水到渠成地推行政治改革,并要保证使宪政制度改革走在自发成长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高热期”前面。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上所有的财务公开,都是老百姓要他花钱,但是他又不能任意收钱,导致财政承受不了,出现很多赤字的条件下,他才会有动力,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亮账本说,你看我这个账上只有这么多钱,你们要求我承担的,我承担不了,到底是让我多收点钱,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如果到了这一步,财政公开就有了,宪政也就有了,这两者就是一回事。

王长江 :我们可以设想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套在一起开,这类似于每年二、三月间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交错进行的方式。具体的

交错形式,可以采取党代会稍先、人代会稍后的做法。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可以把党的决策和人大的决策很好地结合起来。党的纲领在讨论过程中实际上能不断从人代会那里得到反馈,便于及时调整和修正,人代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同时会成为党的代表大会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什么内容应当写在党代会的决议中,什么内容应当由人大出面决定,过去常常会发生一些混乱,要么相互打架,要么相互推诿出现空白点。现在则由于两个大会都仍在进行中,实际上为相互之间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流和协商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时间和平台,这就有效避免了党代会越俎代庖、人代会权力被架空的情况的出现。

第二,它可以把党推荐人才和人大选举很好地结合起来。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党代表的产生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可以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是把常委会的选举和政府机关领导人的选举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还有助于解决其他可能发生的问题。例如,当某个政府岗位应选人数为一人,而人民代表推举出的候选人不是中共党员时,党代表大会可随时推出一名本党候选人参与竞选。

我们党应该选派自己最有能力的骨干参与公共权力的竞争,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公共权力之外,处于一种从体系外不合理地干预公共权力运作的状态。实行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人代会套开,为此提供了可能。在党代表大会上推举出的候选人,既是党的委员会的候选人,也是人大、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均实行差额推荐和选举。

于建嵘 :县级政权改革可能才是今后中国的方向,县级政权改革要从人大制度开始,从司法相对独立开始。在今天的中国,中央要控制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司法。怎么使司法脱离地方的控制,可能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步,中央怎么使地方的司法脱离地方,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县级法院,中级法院的人财物完全脱离地方,中央对法官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法官实行高薪,法官实行流动,使司法能够去监督地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认为要做的,应该就是开放人大,真正实现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第三,在行政改革方

面,真正培养地方政治家是将来要做的工作。

陈小鲁:改革,要坚持普世价值,要坚持宪政民主的思想理念。在启蒙阶段,在民主、普世价值比较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分权阶段,党政分开,立法和行政分开,现在很多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落实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比如新闻、出版、言论、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逐渐地宽松一点,放开一点,当然是不同层级。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入宪政阶段,就是比较完善了,形成了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当然这是理想的。

马立诚(《人民日报》前评论员):村委会选举已经20多年,该往前走了。1998年以来,已经有三个省进行选举乡镇长的试验,取得了经验。其中一个四川遂宁市步云乡乡长直选,我参与了这件事,选得很成功。新的领导班子应该在全国推进乡镇长选举,取得民主建设的突破。

周为民:市场活动也好,公民社会的参与也好等等,他们共同的实质在于都是民众的自主活动。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要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为民众的自主活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来提供条件,提供制度的和法律的的条件,推进法治化的进程。

李丹钢(政治学家):需要有一个改革路线图。第一步是由以党治国向宪政治国来发展。第二步就是宪政文化环境形成后,再迈向宪政民主。

王占阳:针对不稳、对抗与动荡,真正切合实际的良方实际只能是官方通过改革实施对于全国人民的“让步政策”,从而从根本上缓解积怨已久的官民矛盾。

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什么?是建立民权中心,这个民权中心就是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要把选举搞起来,我主张在今后十年时间把县级和县区级的竞选搞起来,下一个任期再一个十年,把间接选举的竞选搞起来,然后是党政分开的问题。

何兵:很多人只看到选举制的民主,没看到陪审制民主的重要性。陪审制全世界都在搞,只有中国不搞。这是人民有秩序的民主的最好形式。西方人将陪审制比喻为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度。

唐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政府要摆正位置。把它看成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政治大问题,我们应该敬畏人民对我们的服从和尊重,要抓紧时间转换。第二,变国有制为公有制。公有制是大伙儿的,但是公有制有个问题,如何防止内部人侵害股东的利益,这可是大问题。第三,加强社会管理,由社会团体自己管理自己。

蔡霞: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而引发人口结构的转变。农民工转变的问题,又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刚好冲突叠合在一块儿,我们现在的所有代价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政府收了这么多钱,能不能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专门用于人口结构的转移,人口结构的安置,对他们实行市民保障待遇,而不要让农民自己通过所谓被迫地卖掉什么东西来获得他自己的权利保障。

王长江:党在干部的培养、使用、任免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但不能架空、取消甚至侵犯公众的选择权。这应当作为“党管干部”原则的底线。超越了这条底线,就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唐欣:未来能做的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提倡启蒙运动,要把思想启蒙运动当成一个长征来看待。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变我们党的集中民主制为民主集中制。列宁党的特点叫集中民主制,是先集中,后民主。最后就变成个人专制了。我们党五年或者十年以后,能不能考虑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局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服从全党。

米鹤都(文革史专家):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和推进,一定要符合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什么是当前社会最急需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二是什么是当前政治环境上下左右所能接受的改革?我认为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建立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除了要有压力,还必须要有取舍才行。民主制度的三个层次是价值、制度和程序。对于价值观的讨论要舍;对于宪政制度的诉求要舍。程序中又包含决策和执行两个过程,其中决策的民主程序也要舍,全部焦点集中于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体系。只取这一点,即最

大公约数,得到改革力量的最大化支持,同时也必须舍掉一些很正确的诉求,为执政者留下充分的空间,以取得对改革的支持。

一个有制度保障的监督体制的形成,既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遏制官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腐败,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长远利益。当一件事情于人民、于国家、于执政党都有利的时候,才意味着它的历史条件成熟了。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现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鄢烈山:未来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民间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施加压力,我们希望上层能够更开明。再就是各行各业界的精英要允许竞争,这个竞争现在有一点点,但是很少,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党内有竞争才有民主。

汪玉凯:最近有调研说,90%的中国老百姓都希望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下一步的关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最高权力交替机制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要启动解决最高层的权力交替,不是要靠人,要靠机制,靠制度,靠这个制度通过选举,扩大差额选举。首先通过党内扩大差额选举,包括政治局委员,扩大差额选举以后,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可以采取竞争式的产生办法,只有把最高层级制度理顺以后,才能谈其他的。

孙立平:未来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顶层设计,前提得有一个超越型政府,如果有一个超越型政府推动顶层设计,这是最好的结局。第二个,体制内改革的力量,这个力量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寄希望于社会,推动社会的发育,这又是一种可能性。第三种,就是这种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的改革。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原四局副局长):1980年8月18号,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篇讲话,太精彩了。他说之所以能导致“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十年当中陷进去出不来,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我听刘澜涛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善男信女,不停地给他烧香,把他都熏黑了,我们还要烧。”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君主。中国要进步,必须把臣民变成公民。

1987年,我曾经给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提了一个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先中央,后地方,先党内,后党外,搞一个很大的路线图。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先把自己的权力制约一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绝对是不能有升迁需求的人来担当。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现在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都在反腐败上,就必然形成对权力的分解。

上世纪末,湖南有一批学者,他们主张用廉政账户来化解腐败,主动退赃以后不影响什么东西。这个建议当时准备抛出来,结果有的民众不干了,民众不干,上面领导也不敢干了。其实这些钱一旦退出来以后,工人农民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吴思:1992年1月份,邓小平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说当年改革怎么难,我们的办法,就是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允许看,就把反对者稳住了。大胆试,可以把积极因素给调动起来。当时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一句不争论,就把这个稳住了。这三句话,在顶层设计的意义上,完成了一个授权,对于第一线的改革者的授权,当事人可见机行事,伺机突破。

现在的舆论环境跟过去大不一样,不争论应该改成可讨论。如果模仿邓小平当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建设性的改革路径是现成的。

四、改革的地区经验

徐景安(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交所副理事长):我有个口号,以幸福中国作为口号,左右派都会接受,民众也很拥护。这句话就解决了当前意识形态的大问题。

我们在广州搞了一个居民幸福感调查,两千多份问卷,调查结果,和政府职能有关的全部不及格,但是对幸福建设的口号高度拥护。这个问卷完了以后,在媒体上公布,而且每个月调查一次,大家说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党代表你的利益,但没有问过老百姓他们满不满意,我们搞的问卷,让老百姓表态,各个部门针对这个意见提出整改措施,然后到媒体开辟专栏,反映民生民意,这就使媒体成为政府和民众交流的平台,这是不是改革?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搞客观评价

体系,搞了八个指标,这八个指标和民族兴旺全部是关联的,代替 GDP 考核,这是不是进步了?第三,我们搞社会民生长远规划,规划一公布,非常有意义,我们财政支出 80% 向民生倾斜,但是它的行政整个成本占 25%,怎么办?最后把行政开支降下来,把民生问题弄上去,同时财政公开,把财政体制慢慢推进。最近又提出来,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政府有力量,民众没有组织,这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所以汪洋书记决定,2012 年 7 月开始,广东省所有社会组织全部变成备案制,所有基金会全部是地市一级批等等,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社会组织搞什么政治。

许向阳(南京林业大学教授) 在近来“国进民退”,私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的大背景下,江苏的私营经济却是逆流而上,发展得又快又好。江苏的快速发展全凭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创新。在超越了“苏南模式”,发展了“苏州模式”之后,一个新的“江苏模式”正在形成之中。

江苏改革的首要特点是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目标 就是要构建一个真正和市场相适应,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良治政府。

江苏人心目当中的良治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第一,江苏的改革要构建的是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它不是一个全能政府,江苏人非常实在,对控制思想毫无兴趣。在“十五”期间,省级的项目减少了 60%，“十一五”期间,各市的审批又减少了 70% 到 80%，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各个地方政府在为了引进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减的越少,外资来得越多,通过竞争,建立有效的法治政府。

第二,江苏改革要构建的是高效、优质的服务型政府。去年南京破除了大量的私营企业投资的条条框框,专门针对私营企业搞了个 22 条帮扶措施,所有人来投资,帮你在注册、融资、落户、孩子上学各个方面全面优惠,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服务大中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

第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江苏改革的突破口和亮点。这个是李源潮在 2003 年推动的,一句口号叫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在十年时间里,有十万干部进行重组。

在宪政民主方面,江苏改革经验有两个方面值得推广 第一个就是全委会表决制。李源潮推

出的经验,让全委会决定干部的人事决定权,昆山就有全委会对所有的市管干部进行表决。另外一方面,就是差额选举常委变成了党内民主的突破性事件。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比较现实,现在我们的民主已经扩大到常委,再推就到全委会。

丁力(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广东现在正在探索新模式,这个模式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 3.0 的宝贵实践。什么叫社会主义 3.0 呢?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 1.0,他追求公平,不惜牺牲效率。到了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主义 2.0。我个人认为,“十八大”必须要高举社会主义 3.0 的旗帜,就是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效率、公平怎么统一?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公有制只强调它的占有,不强调它的利益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了少数人垄断,自我分享利益的机构,这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利益实现共享,可以让我们做到公平和效率有机统一起来。

只要把这个主题做好,我相信我们是有出路的,广东现在已经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多自己的尝试。

陈有西(一级律师、法学教授) 未来中国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保护问题;二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落实宪政的问题。浙江省的经济模式,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法治保障的密切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民营经济,加依法治省。

2006 年 4 月,在历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基础上,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的实践。提出依法治省关键在于治官,强调依法行政,官员依法办事。习近平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随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以地方立法的方式确定了法治浙江的目标。

(责任编辑 萧 徐)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 吴忠 口述 陈楚三 李大震 整理

整理者说明：

1986年夏，已经退休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多次长谈。陶然，原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著名将领朱瑞同志的次女。因吴忠系朱瑞同志老部下，所以吴忠与老首长女儿的谈话很敞开，无拘无束。

陶然女士将谈话内容做了现场录音。

吴忠与陶然谈话时，陶然的丈夫李大震在场。

吴忠将军于1990年2月因车祸逝世。陶然也于1990年11月辞世。她临终前把吴忠将军谈话的录音带交给陈楚三、李大震两人各自保存一套，并嘱在适当时机整理公布。

我们整理录音时力求保持口述原貌。但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特别涉及具体人名、地名时，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录音整理者 陈楚三 李大震



吴忠(1921~1990)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内一个重大的事件，党内从来没有过。可以相比的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

事前我们一无所知。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

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回来的路上我和吴德一个车，请吴德到我家吃了面条当晚饭，商量如何传达的问题。我说，看李德生、纪登奎他们怎么传达，我们就怎么传达；吴德说只好这样了。

这是主席第一次找我谈话。

庐山会议（即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编者注）结束后接着是华北会议，然后紧接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黄吴李邱做检讨，主席批的话也很尖锐，还有刘子厚做检讨，河北省的。我联想到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看来要清算林彪的问题，不然他怎么当着我们讲林彪的错误呢？讲的虽然不多，但没有必要当着我们讲，这是打招

呼,林彪是什么人。

主席在丰台谈话以后,回来的晚上搞国庆节预演,三十八军等部队搞分列式,十二点吃晚餐的时候杨德中打电话给我,问预演什么时候结束?是总理问的。我说两点钟差不多可以结束。他说总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结束?我说可以,现在就可以结束。当时并没想到林彪跑了。“十一”没有搞游行,只搞了游园。

夜里三点钟左右,杨德中打电话,总理要我们到大会堂去,有吴德、我。到大会堂时,总理正向各大军区打电话讲林彪跑的事,打哑谜、暗示,说那个长期养病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人,带着他的夫人向北跑了,向苏联方向跑了。总理要海军舰队和各地区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总理讲话中没有提林彪二字。总理打完电话后返过头对我和吴德讲,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个房子里。我想总理的意思是,像林彪这样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这里,要准备打仗。我理解他是传达主席的意图。

总理说有架直升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我查了一下说,怀柔以西20公里可能是渤海所,这里是一个盆地,是一个镇,公社所在地。总理要我派民兵、派部队,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包围山区,抓到逃跑的人,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叫他毁掉,片纸都不能丢掉。总理交代任务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给警卫三师打电话,要离渤海所比较近的七团赶快向渤海所方向去,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飞机,不能让把上面的东西毁掉,马上行动。三师是机械化的,步兵都摩托化,快。接着我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延庆民兵马上出动,包围渤海所周围的山区,逐渐缩小包围圈,拉网式搜索从飞机上逃跑的几个人,不能让跑掉。接着又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赶去,但不能翻车,并要通信部门拨一条专线到渤海所公社,保持通话。要求李刚指挥民兵和三师七团找到迫降的飞机,机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能毁掉,片纸也不能丢了。李刚接受任务后走了。

打完电话后回来,总理继续谈,说我们就用打哑谜了,讲了林彪逃跑的事,要准备打仗。这

时三十八军一个师(112师)在赤峰拉练,正在行军途中,总理说这个师就不到保定附近了,归你指挥。我建议把它放在昌平,总理同意了。总理说炮六师、坦克六师都归你指挥。离开前,总理说此事只准吴德、吴忠你二人知道,其他人不能讲。我向总理建议,应告诉政委杨俊生同志,否则不好工作,总理接受了,只准我们三人知道,不准扩大。

回去后,在我的办公室,吴德和我向杨俊生同志传达了总理谈话的情况。接到李刚的第一个电话,说迫降的直升机找到了,上面有一个死人(驾驶员,被周宇驰打死了),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发现两具尸体,问李伟信,说是周宇驰和于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杀了,正在继续清查。李刚的第二个报告,说北京军区的部队和北空的部队正在向渤海所开进,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的。我一听不对,总理布置任务时没说要北京军区和北空配合啊!我立即告诉李刚,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来了,一定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很好招待,请他们吃饭。第二条,请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混战一场,或者把材料毁掉了,怎么办?要是问谁的命令,就回答是卫戍区的上级。接着,我马上向总理报告了情况和我的处置,总理说好,就这样办。我想,若先请示总理,说不定在这一刹那发生了情况,混战一场,我的部队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先讲了两条,马上发生情况你就可以执行,总理有新的指示我再修改。

黄昏时我报告总理,正在搜查材料,对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准备发还枪支,让他们回去。总理说加一条,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李刚第三次电话报告,李德生主任打电话来,让把人、枪、文件等一切东西马上送到空军司令部。我听着不对,因为信不过吴法宪才派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空司现在情况不明,除了吴法宪其他人就没有问题?罪证材料送到空军大院,靠得住吗?我告诉李刚,空军大院情况不明,不能送到那里,要他派得力干部,足够数量的武装,绝对保证安全,马上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不能送空军大院!李刚不错,向我报告情况很及时,并没有马上往空军大院送。电话一放,我马上报告总理,李德生主任未经过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李刚要把抓的两个人、武器弹药和文件一起

立即送到空军大院,因空军大院情况不明,我已告诉李刚派得力干部和足够数量武装,绝对保证安全,立即把人、枪、文件送到卫戍区交给我,总理说这样处理好,并要求人一到立即审讯李伟信,要我和杨俊生审讯,带得力秘书。后来我找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参加审讯李伟信,审讯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陈士印是一个飞行大队长,知道情况不多。

我和吴德从总理那儿回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办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门(只限于各部门),总参、总政、总后电话要详细记录,要情况一律不回答。这是我回来的第一件工作,要赶快切断这条线,不让我的部队、机关再被总参插手、指挥。

李德生同志两次电话都没有通过我和杨俊生同志,没有通过卫戍区机关,直接打到渤海所,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打这两个电话,是没经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让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是对吴法宪不信任,让你取而代之,你怎么对空军机关那么信任?派部队是不是他派的,我也没有再查,用不着我去查。但对你派的部队,我让他们缴械了。我也不怕得罪主任,你的做法不对。总理给我交代任务你知道嘛,找迫降的直升机是我的任务嘛!你要协助,应打电话通知我啊!突然派部队来,我知道来干什么?我报告总理后,总理同意我的处置。现在也不理解他那两个电话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有问他本人了。中央可能问过他本人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

李刚在渤海所和我联系很方便,有专线。他后来报告,拣到一些纸片,撕碎了,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丢了好几个地方,收集起来一对,意思可以差不多,有林彪的签字,是给周宇驰、于新野的,就是“手令”,再有是一封信,林彪写给黄永胜的。对这封信的碎片可费了劲了,碎片是分几天送来的,拣一片送一片,我让部队继续拣,庄稼搞坏了高价赔偿。杨俊生对碎片,一个礼拜没对上;总理让公安部的专家来搞,并通知李震。专家对得很快,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我了,我到大会堂送给总理,但上面抬头是“永生”,这时黄吴李邱还参加会议,总理让他们看这封信,据总理事后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后都说没有这

样的人,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就坐下去了,情绪很不好。又过两天,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总理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总理亲自保证”,很清楚是给黄永胜的信,这才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

再一个是“手令”。还有一张信纸上写的乘坐飞机的编号,红铅笔写的。这时中央才下决心,黄吴李邱“保护审查”,实际上是隔离审查。记得是9月24日抓的黄永胜,黄永胜说没看到这封信。飞机编号是准备南逃时的飞机编号。直升机降落后,于新野把飞行员打死了,一起往高粱地跑,躲在高粱地垄沟里,和李伟信等商量好,大家一起死,他喊着口号,要忠于林彪,结果李伟信朝天打了一枪,没有死。飞机编号的信纸缺两个残片。给黄永胜的信比较完整,是要他安心,不要着急。

解剖周宇驰、于新野尸体时,我给医生交代,切开胃,看看有没有吃下去的文件,医生没找出来。三个文件的残片没找全,但意思是明白的。警卫三师非常负责,像筛子一样找,还下了一场雨,好不容易找到这些残片。9月13日十天后,才对黄吴李邱隔离审查。

为准备打仗,中央决定38军归卫戍区指挥。黄吴李邱隔离前召开作战会议,黄还是总长,我们给总理的报告,总理还给黄吴看了,要稳住他们。作战会议上传达了林彪逃跑事,做出部署,准备打仗。

我推测,林彪知道主席从南方回来要召开三中全会,可能意识到是要解决、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已经牵涉到他了,叶群作检讨了;三中全会清算他的问题后,想跑也跑不掉了,他深知毛主席,所以要在三中全会前跑,这可能是他的考虑。

从北戴河跑的时候,林彪坐的是保险红旗,8341警卫部队开枪射击了,当时认为是叶群、林立果把林彪绑架跑了,推着、架着把林彪弄上车,就开枪了。我看到车子了,车门玻璃上好几个印子,没打穿。有个警卫科长从车上往下跑,还被打了一枪;车门关不死了,车上的人拽着车门开到了山海关。警卫部队开枪是为了保护林彪,以为林彪被绑架。林彪跑时找不到林豆豆了,很紧张;女儿到警卫部队了,藏起来了,向中央打电话说林彪跑了,向广州去了,没说去苏联,看样子去苏

联是临时动议,可能是因为女儿找不到了,怕泄露机密,去广州靠不住了,才往苏联跑,这是我的估计。

有一次开会,那时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江青非说林立衡是林彪的坐探,要关起来。总理听得不耐烦,说把情况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说,要不是林立衡向我们报告情况,我们都蒙在鼓里面呢!因此才在关于林彪的“一号文件”中写了“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总理说,我认为这样写是对的,主席也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把江青顶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江青说,讨论问题你不要发脾气嘛!我们都在场,总理没有发脾气呀?后来林立衡还是受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我认为林立衡应该是立功受奖的人,够大义灭亲的了,是个好同志,应该让全国都知道。江青整她,在警卫一师实际上是关起来,逼得吃药自杀一次,抢救过来了。林彪逃跑,亲生女儿揭发他,对我们党的形象有什么不好?总理写得好: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到现在我也认为应该宣传林立衡。

直升机上有很多文件,还有很多军事部署,对苏方向上的雷达部署都有;还有好多录音带,有一盘录音带装在信封里,上面写着“绝密文件”,听不清楚;后拿到公安部,技术人员把转速搞对了就听清了,是黄永胜给叶群打电话,谈私生活问题,林立果录下来了,录的质量不好,但可以听清楚。审讯黄永胜时给他放,他有意见,说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搞这个不严肃。

还查到三万外币,我看是德国马克,报告总理,总理说不对,哪来马克呢?后来知道是三万美金,又报告了总理。

那一段只有我们三人知情,整天忙乎,机关的人不知道,向总理报告情况,处理问题,机关的人判断与林彪有关,但究竟是啥问题不清楚。

飞机上文件很多,要带到苏联去作为见面礼,不重要的文件、一般的文件,带去干啥?都是些重要机密,总理判断对了,他说里面一定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能叫毁掉了,片纸都不能丢掉。果然总理说得对。

直升机是要往北飞,让飞行员往乌兰巴托飞,李伟信还活着。林彪的飞机一直向北飞,急急忙忙,机场有报告,有一次我向总理讲,不能打下来?总理说,你说的好!打下来你怎么解释?毗了

我两句。直升机从北京起飞,两架没有联络,跑的时间一致,北空的飞机起飞拦截把它搞回来了。拦截还不是主要的,特别是驾驶员,他是中队长,不明情况,大队说找他去开会,正在睡觉,半夜三更找去了,叫他向乌兰巴托飞,枪逼着的,他觉得是要投敌,把罗盘搞乱了,周宇驰也搞不清往哪个方向飞了,看到钓鱼台向后转了一圈,一看怎么又回到北京了?这时到渤海所上空,飞机迫降,刚一落地就把驾驶员打死了。驾驶员是有功的,把罗盘搞乱了,不往乌兰巴托飞。

9月13日以后,每天注意听苏联广播,林彪到苏联后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啊,发表什么文章啊,发表什么演说啊,但一直听不到。过了三天,蒙古方面提出抗议,说我们有一架飞机进入他的领空,落在他的领土上了。我们的大使去看,是一架民航飞机,死的人甩出来,没有烧毁,送回来的照片上,林彪、叶群都认得出来,它是没油了,迫降的,领航员也没有,油也没加足,非常仓促,可见是临时动议往苏联跑,不是周密计划往苏联跑。传说很多,黑匣子是烧不坏的,可能被搞到苏联去了,据说里面的录音还有开枪的声音,争吵,因为里面并不都是他的死党。这是传说,没准儿。但是照片上认得很清楚,林彪的膝盖骨露出来,搞断了,女尸(叶群)看得很清楚,肿胀起来了,并没有人员烧死,是迫降时飞机把草地划了很大一条沟,机翼在山冈上刮断了,翻下来造成的,看样子是迫降造成的,不是打下来的。

9月13日上午总理布置任务后,同时做了决定:保密。知密范围很小。为了首都和全国的稳定、平静,广播还像过去一样,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知道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以后还这样讲,维持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这时外国政府向他的使馆、武官要情报,说北京出了事情,这些大使、武官回答说北京非常平静,什么大事都没出。发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之一以后才公开。

抓黄吴李邱,毛主席、周总理很慎重,隔了十天。十天当中,中央的文件还要让他们看。找到林彪手令、飞机编号、给黄永胜的信以后才做出决定,隔离审查。9月24号晚上就准备了,总理找我们谈,抓起来放到哪里?我和吴德参加,杨俊生没参加。我考虑不能放在城里,警卫三师是新四军的,和黄吴李邱瓜葛少,吴法宪是新四军三师

的,不是江南的,警卫三师是江南黄克诚的部队,总理同意了。商量结果,黄永胜由我押送到七团,怀柔;吴法宪放到三师九团,八里桥;邱会作放到牛栏山,炮团;李作鹏放在三师师部。这时天还没亮,预定抓他们是八点召开会议,战士还在车上睡觉。曾绍东押李作鹏。

开会时,邱会作晚到十五分钟,去机场送行回来晚了。总理很敏感,是不是他发觉了?既然黄永胜烧文件,他也可能发觉不来了?总理说,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问我:你有机动部队没有,我说有,有多少?我说城外两个师,城里一个团刚拉练回来在半壁店,总理说好,由这个团执行,到西山100号,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这时邱会作来了。

总理在新疆厅找黄吴李邱谈话,指出林彪准备南逃广州,你们了解不少情况,要老实交代。黄永胜表态,保证;总理叫我去,告诉黄永胜你到吴忠那里去,好好交代。黄永胜表示,拥护中央保护审查的决定。

我押送黄永胜到三师七团,安排好后我离开时,黄永胜把我叫回去,要我向总理报告:“只要我知道的情况,我一定交代清楚。我拥护中央决定对我隔离审查”。

林彪专案小组十个人,里面还有黄吴李邱;后来中央让我和李震审讯黄吴李邱,我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是公安部长,但不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很客气,我还是让李震同志出头办这件事。

审讯时,黄永胜不交代什么问题,给他放那盘录音,他说这是政治问题,不严肃。拿出林彪给他的信,他说没收到。王飞给他送的信,他说不是这封信。既然是写给黄永胜的信,为什么在周宇驰手里?是不是周宇驰让黄永胜看信后把信收回了?都是推测,不能认定。王飞送的是否是这封信也无法断定。黄永胜一直说没看到过这封信,我们也不能认定他看过这封信,理由就是这封信在周宇驰手里。但公审“四人帮”时,法庭上向黄永胜出示这封信时,黄永胜说看到了。我心里想,黄永胜可能紧张,一是他确实看到过这封信,另一种可能是,总理给他看过这封信,他没说明清楚,是于新野、周宇驰给你看到过,还是总理给你看到过?没交代清楚,我也没法断定。我们搞了那么久他都不承认。

那时认为吴法宪态度最好,林彪给他交了底啊,飞广州啊,等等,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决定要宽大吴法宪,给他找房子。我找了,马寅初的房子准备给他,老婆孩子可以住在一起。最后还有个问题让他交代,他说的含含糊糊。后来就没有给他那个房子。毛主席说吴法宪可以突破,一问他就哭,交代很清楚。法庭上已经问完了,要走的时候他说:还有个问题要交代!李作鹏,总理问他,山海关机场已经通知了,不准起飞,你为什么要他起飞?为什么修改了总理指示?邱会作也没交代什么问题。

审讯黄吴李邱时,南逃问题没搞清楚,黄吴李邱是否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我那时没搞清楚,审讯“四人帮”时也没搞清楚。

“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内容是: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应为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

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林彪的“四不一要”虽然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是授意、起草、修改、抄清,据了解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总理说,林彪和他说过此事,总理说有这个必要吗?林彪是想把这个送到主席那儿,取得主席批准后,他那个班底就保留下来了,黄吴李邱啊。他不是说有些人忧虑吗?安全没保证吗?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政治局的这些人。这样就把他的班底保下来了。这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已经查到黄吴李邱、叶群头上,实际上也查到林彪头上了,他想用这个办法制止,不

要再查了,不要搞下去了,这是我的理解,把班底保住,这是一;第二,卫戍区这一条,我看了有后怕的感觉,也不用给你施加影响,也不拉你,拉你会报告,传达到每个士兵,每隔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野心家一旦可以给你出情况,他说毛主席生死不明,或者他把毛主席搞起来了,打电话也打不出去了,那么要毛主席面授机宜才执行,现在毛主席不能面授机宜了,我是第一副主席呀,我给你卫戍区面授机宜你得执行呀,不执行马上把你抓起来干掉,换一个人,叫你抓谁你抓谁,这样一来,卫戍区部队在他手里紧紧掌握着,毛主席要是通过了他就掌握了卫戍区,说是“防止野心家捣鬼”,这样一个文件毛主席批准了,给士兵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一旦出了情况他是第一副主席,党章上写的接班人,他要面授机宜你不接受?不接受马上把你干掉,这就不乱令了。用这个办法掌握卫戍区,倒真是高明的办法,比请吃饭、照相、封官、拉你更安全,你要报告了他就暴露了,还真没有好办法对付他。但他没有送到毛主席那儿,他知道毛主席是个敏感的人,送给毛主席谁知道会怎么看,同意了好,不同意呢?会不会露马脚呢?他感到没把握,才没有上送,都已经抄清了呀!看来林彪这时候想的点子很多,想把他的班底保留,把卫戍区控制起来,必要时他来“面授机宜”,让抓谁就得抓谁,这不能说不厉害。

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林彪在逃跑之前的心理状态,他是在想什么。他想着的问题很大,把他的政治局保留下来,不捉、不捕、不关、不杀,十年不变,除了病故、退休的,十年不动,他对能否骗得过主席没把握才没送。

这个材料很重要,庐山会议后林彪看到已经搞到黄吴李邱头上、搞到叶群头上,已经搞到他头上了,他要想什么办法解救危局,这个办法不成才外逃,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不是一天想出来的,是深思熟虑,反反复复,抄清了以后还搁三天,考虑送还是不送,最后决定不送,因为没把握,一送就可能露馅儿了。这个材料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责任编辑 杨继纲)

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好好的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变得那个样子,什么原因?

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顺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陈的垮台,全国人民至今恐怕还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

陈伯达说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书生,但他读书却不太用功,就是文笔好。佩服而又知道他一点年轻人,无顾忌地说他“懒”,即不用功,不苦读,靠聪明。陈伯达不是个政客,他并不想当政客,当政客就要活动,要到处跑,要讲话,他不会这些。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困难。在延安,我觉得他只想当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全党注意,全国注意,他就十分满意了。问题是,不可能允许你这样一个专门写文章的名流存在,不与政治结合起来,你的文章就发不出去。因此,陈伯达在延安必须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离开了这一条,他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因为他讲的福建话,很难懂,跟人家谈不起来。1940年,南洋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开欢迎大会,陈老先生讲话,陈伯达翻译,从头到尾不知说什么。他们是同乡,别人翻译不够格。我在场,大家唯有鼓掌而已。陈伯达唯一的任务就是奉命撰写当时最重要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时尚论著。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是受命要写的。他写这种时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他到《人民日报》,可以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

章,在我看来不是陈的风格,甚至不是他的思想,这样的文章不经过别人看就发表出来,我有点怀疑。想想看,如果错了,他陈伯达有几个脑袋?陈伯达晚年说这篇社论是《解放军报》两位编辑写的,陈伯达审定并改了标题,当时在京几位政治局常委看过——本刊编者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谁不吃惊?历史证明,这个文章一出来,实际上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其实包括了他在内。他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打倒完了嘛。就是说,今后就不用委托你陈伯达再写加码的专文去扫荡什么了。以后打倒刘少奇也好,打倒其他人也好,都是等而下之的新人物写的,不需要你陈伯达写了。

他成了中央文革的组长不久,江青就代替他当代组长了。用中国话来说,狡兔死,走狗烹。他这篇文章一来,把已经打倒的,正在打倒的,准备打倒的,都扫光了,因此陈伯达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要专挑小刺,陈伯达可不行,比江青手下的姚文元等差远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以后实际上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也根本不会做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右一声老夫子。其实是挖苦他,轻视他,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无用了。你叫他做行政指挥,他做不了,他至多只能指挥他的秘书,替他收集资料,他来写书。陈伯达要是离开了柴沫(行政秘

书)、田家英、史敬棠、何均、陈真这五个人,他就什么官也不会当,什么书也写不出来了。

1970年中央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毛主席下山后到处讲,准备打倒林彪。在这个会上,争论的东西叫滑天下之大稽,今天提到还叫人笑。这个会上,林彪、陈伯达反复称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林彪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设主席,毛主席说不要设。这就发生了“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个象征性的元首,你中共中央的主席,人家总统来,你怎么办,以什么身份去接待人家元首?所以这个元首,堂堂一个大国,不管有没有实权,总是要有的。毛主席主张不要,而且还写进宪法里。别人也跟着叫不要吗?你不要脑袋呀,谁也不敢。所以陈伯达等非要设不可。

陈伯达照例讲伟大,毛一下不知怎么的,对伟大厌烦了,一下忽然不要了。是不是真的不要呢,一直到他去世,四个伟大没有取消半个。陈伯达为了坚持“伟大”、“天才”等犯了罪,吓得要死,到处找证据,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也讲了“伟大”、“天才”等,印成书。这可证明陈伯达最终还是有些书呆子,他以为找到马、恩、列、斯他就可以平安了。

陈伯达为了设国家主席这一条,把在北京的史敬棠叫去了。史敬棠坐专机飞到庐山,干什么呢,代陈草拟在宪法中起草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就几个字,滑不滑稽?

后来反林彪,反陈伯达,出了几本材料,把史敬棠的手迹也弄上去了。史敬棠比我大几岁,1941年我同他住一间小窑洞。十几年前我问史,陈伯达为什么要叫你去?那几个字他不会写?他说,你还不知道吗,陈伯达就是这样,懒得很。我说,再懒,就写几个字,这么一条一款都写不出来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硬是要我代他草拟。我说,不可理解。难道陈伯达老早就知道,写这一条要犯死罪吗?犯了法,拿你去充罪也不够分量呀。后来史敬棠在林彪、陈伯达事件中,进没有进监狱,我没有问他,但是他被隔离审查了多少年。

从此,陈伯达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不过大家不大懂,也没有怎么批陈伯达,因为一批就要走火,说伟大、天才等等都不对,哪个敢说?

陈伯达的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进城后不久,一下子就成为被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什么原因?我一点也不知道。1951年5月初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我的座位在前面,但我跑到最后一排空位去跟宣传部几个我认识的人闲扯。这几个人进进出出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天,陈伯达在上面讲话,这几个人就说开了。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不会讲普通话,他讲话,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普通话。他有个口头禅:我是一个“小小小学生”。但用他的普通话讲出来就是:我是一个小猢猻。“小猢猻”就是小猴子的意思。后面几个人,有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王惠德,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他说,呵,呵,你看这家伙,又来了,又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就挖苦。我觉得奇怪,暗想,哎呀,我才离开北京不到两年,过去陈老夫子的威信那么高,怎么一下子把他作为讪笑的对象了,一下子变成“家伙”了呢?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个别人对他,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什么原因呢?我不敢问,现在也不知道。如果没有突出的表现,我想这些人不会这样干的,特别是田家英,跟他关系非常好,长期做他的写作的助手。于光远更是个道德人,决不会随便笑人的。

我想,陈伯达这个人的虚伪,到了被人家发现的时候,他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了。这些人一下子看不起他,说明他的威信已经完全没有。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为什么上面和下面对一个人的看法会完全不同?这个时候,陈伯达的地位是在不断上升中。但是,跟他接触多一点的人,却这样看不起他,这些人里边,据我所知,除了于光远,过去对他都是非常尊敬的。于光远为什么不那么尊敬他呢?陈伯达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地租概说》,我没有读过。于光远看过后发现陈伯达没有读过《资本论》一卷。《资本论》很多人没有读过,这不算稀奇,因为1938年才算正式翻译过来。但是于光远发现,陈伯达连第一卷都没有读过,因为第一卷早就有中译本。于光远应陈伯达之邀,跑到杨家岭去找他,陈伯达很客气,表示感谢。结果,于光远发现

他印书时，一个字不改。

除了于光远，在延安时，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却都挖苦他，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现在于光远还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延安1941年夏天，也就是开始整风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就是以一個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话，也是挂名，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都是个甩手掌柜。那时，他跟一些人长期住在延安马列学院山下面简陋的几间小平房里，他们既不上课，也不学习，也不开会，就是住招待所。有徐海东、谭余保、陈伯达、丁玲、高士奇。估计他们的生活由马列学院照顾，大概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一般的学员高得多。我们看见他们，恭恭敬敬点点头，其他没有什么。当时看不出陈伯达在干什么，可能在写书吧。或者就是《三民主义概论》。1938年10月，日本飞机第一次炸延安，我进城买书，当时延安有几个窑洞卖书的，我们一个月领两块钱，买书的话，薄薄的可以买四五本，陈伯达也跟普通人一样进城买书。我没有看见他。人很多，日本飞机第一次狂轰滥炸，我往东跑，跑到城门洞里堵住了，回头看，炸弹炸的火焰一两丈高。陈伯达受了轻伤，马列学院几个同学把他抬回去。抬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余宗彦。我讲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呢，说明陈伯达1938年在延安还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普通文化人。

陈伯达在1941年四五月前，主要是写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研究的文章，当时不大具备条件。他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听说好像有些文章的原稿是毛主席看过交给张闻天发表的。这些文章在战争时期没有起什么作用，延安看的人不多。我都看过，但等于没看，因为我的基础太差了。我记得他有篇小文章叫《论杨朱哲学》，杨朱的哲学在先秦留下来的材料不多，孟子曾经骂过杨朱：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般学马克思主义的人，简单认为杨朱哲学是个人自私哲学。但陈伯达和孟子的提法

不一样，孟子认为，为我，而不为他人利益是不对的。陈伯达讲，杨朱哲学在当时有他的进步性，他代表的是新兴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不讲利讲什么呢，发展工商业对社会是好事。所以他讲，杨朱哲学中的“为我”，不要简单地看，要看他的时代，他这种哲学，不是守旧的哲学，而是比较先进的思想。他的这个解释，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这究竟是他的解释，还是引用别人的解释，我不清楚。因此，当时我们十几岁二十岁的青年对陈伯达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对先秦诸子百家也研究过，是一个比较懂得中国古代的人，跟左翼一般文化人很不相同，认为他既是一个高级文化人，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文化人。对陈伯达有这样看法的，不是我一个人，在延安是较普遍的，不能因为以后判了他十几年徒刑，就不尊重史实。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是上面发起的，什么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一大堆。我由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我们懂什么？就听他讲。他说，我1927年在莫斯科留学，他们都在研究斯大林、托洛茨基，斗得个要命，我就研究三民主义。我为什么要研究三民主义？我觉得蒋介石是利用三民主义，而我们对三民主义一点也不懂。我们研究一下吧，你不研究如何批评它，简单的骂不行呀！我们觉得他的思想比别人高得多，就听他讲。他说，三民主义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无条件反对，反对哪一个都不对。我们过去不懂，在上海的时候，对三民主义通通骂，实际上我们自己毫无研究。我们小青年一听，又觉得他的见解比别人高明。他问我们，现在的三民主义，哪个重要？有人说，民族主义重要，因为抗战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要。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强调民权主义。为什么呢，民族主义，现在战争已经打起来了，全民抗战了，也算在做了。民生主义，现在抗战大家都苦得很，强调改善民生办不到。过于强调这个东西，国民党、蒋介石会说你是在挑起阶级斗争。我们现在就要强调民权主义，就要民主，把蒋介石的独裁削弱一些。这样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然，强调民权主义不是他一

个人的主张,是中央的决定,当时中央说我们讲三民主义,但强调民权主义。经过陈伯达这样一分析,觉得他的思想比较高,对他是相当崇拜,所以,对他不是一般的尊重,而是非常尊重。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中央政治研究室是怎么来的呢,后来不大讲了。1941年5月间,毛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反对主观主义,说我们今后的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调查研究上。毛一下成立了一个很大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他当局长,任弼时当副局长,下设三个机构: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敌伪研究室。政治研究室毛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毛兼主任是听陈说的。陈素不管事。这件事没有开过成立大会,也没有什么文件,具体的内容是陈伯达告诉我们的。政研室的人,现在还在北京的,据我所知至少还有七个人,包括邓力群等。陈伯达这个副主任,是挂个名,什么事都不管,埋头写自己的文章。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

陈伯达住一个窑洞,里边有一个小坑,他躺在坑上。我们20来岁,他已经40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最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毛主席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这些青年,那些40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对我

来讲,能接受,到现在也接受,觉得毛讲得对,应该坚持。“自然而然革命化”,毛大概在延安没有多讲,所以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共产党在上世纪30年代,在王明等人领导下,一天到晚反对“尾巴主义”。陈伯达跟我们讲,我们听是听,但不敢宣传,因为不是直接听来的,如果说毛主席没有讲过,怎么得了!但我对此印象是很深的,因为这跟我们过去学来的、听来的不一样。毛在这些问题上,有过非常正确的思想,但他后来不是这样做。强迫农业高级合作化,强迫建立人民公社,每年跳升,有什么自然而然呢。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我在政治研究室待了大半年,1942年初叫我参加张闻天的农村调查团。这事是怎么来的,我全不知道。

陈在延安整风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风应该从1941年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算起。大概在1942年前后,陈伯达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建立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是把党史翻了个过。现在不提它们了,不符史实。实际上,延安时我们多次读过这两篇文章。一篇叫《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一篇叫《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此书在解放后出单行本时可能更名为《关于十年内战》)。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毛主席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上半期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中国革命就是要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陈伯达讲,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因此,只有毛泽东历来都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

《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反革命是说蒋介石怎么统治,革命是说我们这一面。我们这一面,革命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罢工、罢课、贴标语、游行示威,都在里边。陈伯达说,唯一正确的就是毛泽东在农村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用这个办

法,才能把蒋介石推翻。而且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领袖。

两篇文章,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上从来就是正确的,是唯一正确的领袖。这两篇文章,对建立这种观点,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些年轻人,包括那些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同志全同意陈伯达。有些监狱出来的同志说,我们贴标语、喊口号,被蒋介石捉起来了好几年,蒋介石怕你“示威”?通通抓起来就解决了,还是毛的办法对。所以,陈伯达

在延安整风,在拥护毛,说毛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最高的领袖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这两篇文章当时大家拥护,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坚决拥护毛起了极大的作用。

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当然是别人替他写的,讲将来要统一,要建国,要强国,一切归国民党领导,中国的命运,一切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掌握在蒋介石手里,离开蒋介石,什么都不行。陈伯达奉命写一篇文章,评蒋介石这本书,名《评中国之命运》。毛主席也改过很多次。这篇文章很好,延安发表了,占两三版。陈伯达给我们讲过,写文章要学习梁启超。他很喜欢梁启超的文章。他讲,梁启超说过,写文章笔尖要常带感情,这样的文章才能引起人家的共鸣。他写文章就很注意这个问题。他的《评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全文充满了革命的感情。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反蒋,拥护共产党。这篇文章我只看过一遍,现在还记得一点。陈伯达讲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讲到蒋介石屠杀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话,好几十年了,仍然记得。他说“蒋介石杀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连用了三次,一般用二次,他用了三次,让人无比沉痛。我现在说起来还要流泪,这叫言有尽而悲无穷。陈伯达文章感动人的力量,在共产党成立以来,恐怕也是难得的。用在好的方面,就是《评中国之命运》,用在极坏的方面,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刑满释放以后的陈伯达

笔尖也带感情,就是:杀,杀,杀。所以他说他的文章带感情,从正面的例子看,是这样,从反面的例子看,也确实发挥到了极点。

中共在延安开了七大之后不久,大概1945年六七月间,陈伯达来到了中央宣传部,这时我已经调到中央宣传部两三年了。陆定一、陈伯达来任中宣部正副部长,这两个位置好几年都是空的。宣传部就是散兵游勇,加上一些家属住在那里,跟一个招待所差不多。他们两个来,带了个秘书

长丁华。这个秘书长也是个老前辈,同他们二人并不熟,同大家关系很好,成了我们的大家长。但是,他们来后宣传部也没有变化,仍没有工作。陈伯达住在顶层的窑洞,只管写他的书。他最著名的书,一本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延安出的,这个书是借袁世凯的名骂蒋介石,主要是说蒋介石是个窃国大盗。这个书后来的作用不大。第二本书叫《中国四大家族》,第三本叫《人民公敌蒋介石》。后两本书是奉命写的。他写书有四个助手,没有这四个助手,他恐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中国四大家族》可能是在日本投降前后毛叫他写的,名字也是毛取的,助手是何均、陈真,这两个人替他收集经济方面的资料。陈伯达很聪明,归纳能力很强,编排资料、写说明文字的能力比别人强。所以,他弄一弄,写出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现在来看完全站不住脚,即所谓“主题先行”。这个书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两局等的财产全算成了蒋、孔、宋、陈的私人财产。除了这四行两局外,国民党当时还搞了许多国营企业,都算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以,“中国四大家族”就来了,说中国的财富就是他们四大家族的。

现在解放60多年了,证明这个论断无法成立。陈立夫在政治上是最彻底反共,“政治挂帅”得很,并不怎么弄钱。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他怕别人在蒋面前要求惩罚他,因为他的极端反共政策

失败了，离开了台湾。他后来到了美国，连吃饭都困难。靠办鸡场生活。前不久，电视里说陈立夫的孙子捐了一样三星堆的文物给国家。陈立夫的孙子讲，陈立夫嘱咐，再怎么穷，也不能卖，要拿回去捐赠。陈立夫是政治动物，是彻头彻尾搞政治的，是拿官薪吃饭的人，他好像没有多少钱。蒋介石的财力也清楚，他没有什么钱。蒋介石是军事政治动物，并不搞私产，宋美龄长期住在美国，大多是孔家援助的。陈伯达这本书，是先有结论，后找一些材料来拼凑，方法就错误。所以，费了那么大的劲写出来的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孔、宋不太清楚，蒋、陈有几个钱呢？

《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帮助收集材料的人有两个，一个田家英，一个史敬棠，他们多年替陈伯达收集各种材料，偏于收集政治材料。田家英的文笔好，实际上许多东西是弄好了，交给陈，陈编辑编辑弄出来。《人民公敌蒋介石》，说蒋介石独裁，反动是对的，卖国来讲，现在要更实事求是了一些了。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也是要抗日的。

这两本书，当时是起了大作用，我们反正相信。但是，《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篇文章，才是奠定陈在党内权力的基础，才是奠定陈在领导人面前的政治地位的基础。我们在整风中也确实认真地学习了这两本册子，而个人崇拜的基础也被这两本小册子打实在了。

一个很有才情的人，最后成为一个反革命的头子，确实是一场大喜剧

陈伯达还喜欢写毛笔字，他写毛笔字也是个天才。他不多练字，但写得非常之好，又豪放，又潇洒。他的几本小册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写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很佩服。

在他下面的青年，经常看见他的，都说他懒，陈并不刻苦用功，同其他人不大相同，但他确实有天赋。1960年我调到上海辞海编辑所几年后，晚上有些专家闲扯，我坐在旁边听。他们扯到中国的书法。有人讲日本有人评论，中国现当代的书法家有三个半人，第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康生，第三个是陈伯达，还有半个，是多年鼎鼎大名的书法家沈尹默。他们说，毛泽东、康生、陈伯

达的字，都有特点，个人创造性都很强。沈尹默虽是书法大家，但个性特点不够突出，所以只能算半个。这种说法可能是胡扯，可能也不是毫无道理。我是外行，不敢胡说。

陈伯达这个人，留下的教训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没有去做学问，他完全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的需要服务，只要是这个需要，他个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书籍来响应，改造历史事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上。所以陈伯达的一生，虽然写了那么多东西，今天看来，在学术上有根据，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陈伯达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值得一切弄理论史学的人引以为鉴。陈伯达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人聪明，但没有很切实的真才实学。如果他要像党内的其他学者，像范文澜一样，一辈子研究学问，他的成就可能会比范文澜这些前辈高得多（范有大实学，但后来被简单的“阶级斗争”教义化了）。陈伯达的这一生，其实也不过像苏联的米丁、尤金、维辛斯基、李森科这一类的所谓学者一样（不过，我认为陈比他们究竟高明得多，因为那些不过是几把刀枪而已），事情一过，东西全部无用，甚至是胡说八道。在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今天不管陈判没判刑，陈的书的参考价值都还有，但不大。陈是一个喜剧人物，不是悲剧人物。以陈伯达为鉴，可观得失。

不过，在一切判刑的人当中，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他不是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东西。他是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加入共产党的。这一点，他自己是引以为骄傲的，他常给我们讲，虽然话说得平淡。可惜，一个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只是为自己的名、自己的位，而不去坚持事实，写多少书都没有用。在当时就有人看穿你这个东西不行，以后更会成为废品。我作为晚辈也算观察了这一类人70多年，我现在觉得任何东西，凡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随便你怎么讲，有些当时就被人耻笑，有些最后要破产。我觉得，陈伯达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光赶时髦没有用，最后还要考虑到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符不符合史实，对不对得起中国人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胡风案中的“一同志”

。 沈国凡

有这样一个人，他与其他“胡风分子”不同，既未与胡风有任何的来往，也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胡风集团”，更不知道这个集团里的任何事情，只是因为查获的欧阳庄给胡风的信件里提到了他——“苏州有一同志”，也就无辜地受到了牵连和迫害，成为整个案件受到牵连的2000多人中唯一的一个“无名者”。

不知“一同志”的大名

1955年6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第二十六节中，有一封欧阳庄给胡风的信，这信中有这么一句：“苏州有一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击（‘自由主义’），可能斗志较差，但可一试。……”这是公安机关查获的欧阳庄在1951年6月24日写给胡风的一封信，报上公布的内容只是摘抄了信中的一句话，却引发出了《人民日报》很长的按语，其用词之激烈也是少有的：

按 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么，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人民日报》的按语异常严厉，非一般的编辑所能写出。既然这个人被指名是胡风等人的“同志”，自然也就逃不脱被架上胡风的这辆囚车。

据相关资料记载，“一同志”是在1947年5月加入中共地下党，曾在1949年前苏州的白色恐怖下，从事过两年多的地下斗争，立场坚定，工作热情，表现不错。建国后被安排在中共苏州市委纪律检查部门工作，担任科长职务。事后听说在全国开展对于胡风的批判时，苏州上下都为这个“苏州有一同志”弄得沸沸扬扬，深恐这个人就在自己身边，或者与自己沾亲带故，特别是当时的市委机关里，人们更是生怕因这“一同志”而牵涉到自己。

这个人姓什名谁呢？

平反名单不见其名

事情过去快整整的一代人了，那时办理此案的人员能够活到今天的已不太多，其他与此有关的“胡风分子”，无论活着的或者是死去的，都已获得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历史终于给他们以公正的评价。但这个“苏州一同志”呢，在有关“胡风分子”的平反中没有见到他的名字，平反后的“胡风分子”相聚时也没有他，他在哪里呢？历史给他的仍然是那个奇怪的代号“苏州一同志”。

其实，“苏州一同志”有着非常光辉的历史。1945年他17岁，由于爱好文学，便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苏州组织的文心图书馆的进步活动，担任干事。两年后的1947年，在白色恐怖下他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年轻的他此时明白，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捕，为自己的信仰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与审讯，甚至献出生命，为了锻炼意志，他用火烧炙手掌，直到滋滋冒油都不哼一声。经过这种自我测试后，他自认为自己能经得起革命中生死考验了。

这种预感有一天竟变成了现实，而对他进行“考验”的人却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没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老实地作了交代：“1947年暑期，经由原来文心图书馆的干事欧阳庄认识了路翎、阿垅、方然、化铁，和路翎、阿

垅见过两次面。1949年前和路翎通过一次信,路翎送给我他的黑小说《财主的儿女们》。解放后又和路翎通过一次信,他送给我一本黑剧本,名字已忘了。我和欧阳庄自1947年至1955年保持通信关系。”

纵然欧阳庄是中共地下党员,尽管文心图书馆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但此时此刻这些曾经耀眼的光环对他已毫无用处,那一页他自认为的光荣已被翻了过去。

从“苏州一同志”到“胡风一分子”

对于报上所说的“苏州一同志”,当时负责清查胡风分子的江苏省“十人小组”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结果没有查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1956年,有关组织向他宣布,由于他在“考验”中表现较好,有光荣的过去,被定为“胡风一般分子”,但已不适合在党的核心机关工作,调离市委,保留公职,保留党籍,到教师进修学校报到上班。

他感到了寒意,但还是庆幸自己保留了党籍与公职,被留在了“革命队伍”里,憧憬着有一天会让他重新归队。

1958年,他原在的苏州纪委对此案进行了复查。当时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一同志”的案件也因此跃进了一步,不但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还给戴上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

他终于成了“人民的敌人”。他不服,别人就拿出那份报纸来扔到他面前说,你自己看看,给你这顶帽子算轻的,要不,将你送上去,跟胡风分子们一起发落。

他不敢再说,只得打起被盖,被送往苏北黄海边上的农场。

为活命鼠蛇充饥

一天,“一同志”等人被叫着站在海滩边排队,负责对其进行改造的领导宣布,为了便于对他们进行领导,让他们重新做人,要给大伙换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远在天边的青海。

“一同志”卷起被盖,被押上汽车,踏上背井离乡的万里之途,在滚滚黄尘中来到青藏高原。

劳改农场位于雪山脚下,由于三年灾害,这里

牧民早已搬走,只留下空空的几座房子,就成了这些“坏分子”们栖身之处。

更加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因为灾害,农场不能保证这些犯人的口粮,经常是每天只能喝两碗粥,他正从青年走向壮年,经常是饿得心里发慌,头晕眼花。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高原上的这些房子由于成年无人,老鼠成灾。“一同志”灵机一动,便每天挖洞捕捉鼠。那些被他捉住的老鼠,一只只被撕去皮后,便放入铁锅,加上一些食盐,还未等煮熟,便将木棍伸进去捞起来送进嘴里。有时饿极了,捉住老鼠,就将一根木棍削尖,直接从老鼠的心脏插到头部,放于牛粪火上烤个半熟便入口,以解活命之急。

一日,“一同志”将一碗滚热的稀饭盛入碗中,突见一条一尺多长的蛇从脚下窜过,急伏下身去,伸手一把将蛇的尾巴捉住,用力一甩,蛇使没了动静。他急将蛇皮剥了,将雪白的蛇肉拉成几节,放于滚烫的稀饭碗中,等蛇肉温热后便大口啖之。

由于粮食不足,农场开始死人,“一同志”的任务就是跟活着的“坏分子”们每天往外运同伴的尸体。山上的狼嗅到了“肉”味,经常下来紧追不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一同志”,几次都差一点成了恶狼口中的美食。

窘迫的故乡岁月

江南的春天又绿了,“一同志”回到了故乡苏州。

此时的青藏高原仍然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一同志”所在的农场虽然死了不少囚徒,但一些戴罪人幸存下来,上级决定对这些人施行仁政,宣布农场撤销,来自“五湖四海”的囚徒一个个被遣送回原籍。

“一同志”成了苏州城里的无业游民。

一日,偶遇当年地下党共同奋斗之同志,见他如此窘迫,顿生怜惜,利用手中权力,将其安排于姑苏城外的果园农场。“一同志”深感战友情深,匆匆前往,做了一名猪倌。每日与猪同居一室,尽职尽责。长此下来,人猪之间顿生情感,每到养肥的猪被拉出去屠宰之时,便不忍目睹。

农场里的人大都不知其真实姓名,直叫他“一

同志”。偶尔有人前来找他,说起其大名,农场无人知晓,但一提“苏州一同志”,人们便笑着将人引到面前,手指其说,这就是“一同志”。

偶尔回城,破衣一件,旧裤一条,脚上拖一双又破又烂的布鞋,两只脚趾头探在外面,因为衣服上没有扣子,腰上便要系一条稻草绳子。

“一同志”进城仅两个目的,一买烧饼,以备饥时填肚。据有关人员回忆,由于当年地下党同志的关心帮助,他当时在农场每月可以开 19 元的工资,但这个钱他却不能同别人一样领到手,而是要先扣下 9 元伙食费交到食堂,余下的 10 元他大部分都用来买一样东西,那就是烧饼。他每月有半天休息时间,就会向果园派出所请假,并由派出所派人陪同进城。到了城里他就会直奔烧饼店,将大部分余钱都买了烧饼。每当他出现之时,那条街上所有烧饼店的老板如同见到财神,都亲热地叫他“一同志”,招手叫他快来自己的店里买饼。那时烧饼五分一只,近 200 只烧饼就用一只麻袋装着扛回猪厩,然后全部储存在一只坟地里挖出来的骨灰缸里,作为他的“战备粮”。每天除食堂的三餐外,因体力劳动太重,消耗太大,肌体所需的养分还要用这些烧饼补充。节假日果园食堂不开伙,别人都可以回家,他就只能用这些烧饼来充饥。

第二个目的就是借、买佛教方面的图书,得到后揣于怀中,工余之时,常伴着那些猪猡接触了佛教的教义。他读过《坛经校释》《禅宗大意》等佛教书典,且在书上作了批注。批注是这样写的:“小乘佛教较朴素,龙树以后就约许从生成佛,比西方宗教大胆多了。这样膜拜的性质,最后转化为自我膜拜。而行善者即佛,何待来生!”

眼镜事件

“一同志”到了此时此地,嗜书如命。农场有一阅览室,他便是这里的常客。工友们见他破衣烂裳,独坐于靠窗的木椅上看书阅报,都觉得十分滑稽可笑。不知其经历曲折的小青年更是问他,可识得上面文字?

“一同志”苦笑点头,只顾埋头在报上寻其爱读之新闻——此时已是 1976 年岁末,“四人帮”倒台,旋即小平同志复出,阅览室便成了他日日必去的圣殿。

谁知在此乍暖还寒之时,农场举行了一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誓师大会,“一同志”便与一大帮地富反坏分子被拉到台上进行批斗。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贯低头认罪的“一同志”却不肯低头,于是便有人上前来按他的头,可按下去后他又抬起来,会议主持人大惊,已被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调教成绵羊一般听话的人,何来如此大胆的举动?

一位副主任走到台前,对着那头使劲下按,谁知用力过猛,竟将眼镜打落在地,只听“吧”的一声,镜片摔碎。

“一同志”冲着副主任大叫:“你赔我的眼镜!”

此声如霹雳经天,会场上下顿时哗然,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整天与猪为伴的猪倌,一个坏分子,竟为一副眼镜,敢在这样的场合向一位农场当家的副主任发出如此之声。

会场下来,“一同志”找到副主任,仍然要赔眼镜。副主任对其大吼,你个坏分子要翻天啦!“一同志”只有一句话,你赔我的眼镜!

“革命”的副主任与坏分子“一同志”,就这样为一副眼镜相持不下,双方怒目,农场上下许多人出面也无法调解,最后只得由党委来解决这件事情,专门召开了一个相关的会议。会议决定,由农场特别补助一笔钱给“一同志”,由保卫科的人陪着他去苏州城里配一副中等水平的眼镜,开回发票,实报实销。

党委一班人认为此事就可这样解决,谁知找“一同志”谈话时却得到了相反的回答,他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一副眼镜十多元钱,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没有了眼镜,看报读书都有困难,如何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改造自己。这是副主任给打坏的,党委出钱不合理,因为这个钱是公家的,应由这位副主任自己出钱来陪。

党委只好再开会议,再作决定。让党委一班人不理解的是,一个坏分子过去别说是一副眼镜,就是牙齿被打落了也是独自吞进肚子里去的,今天为着这副眼镜,竟有如此胆量,党委出面都不依不饶,并且给予顶回,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平反后的凄凉生活

1980 年 9 月,“一同志”走出猪厩,便有农场

的通信员来叫他,说是让他到场部去一趟。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场里的领导见到他立刻站起来,走上前来与他握手,其中也包括那个曾经打坏他眼镜的副主任。

受尽了冷眼与不公正虐待的“一同志”感到吃惊,不知道眼前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场部领导对他说:“上级给我们来通知了,让你马上回市里报到。”说着,领导走过去打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封信来交到他手里。

原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件件历史冤案得到了公正的解决,胡风集团案也获得了平反,因此受到牵连的“一同志”也获得了新生。问他有何要求,他仅提了两条,一是恢复党籍,二是恢复公职。于是他被安排在苏州市博物馆馆藏部当了个副主任,他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豪爽地将第一个月发的工资交了40元党费,这笔党费占他月薪的三分之二。到了馆里之后,给他临时安排在一间靠楼梯的小屋里,馆里说以后要给他重新分房,他说不用了,自己独身一人,有这间斗室足矣。

与许多受难平反的“胡风分子”不同,“一同志”复出后的生活是凄凉的。

博物馆是个小单位,自己没有食堂,“一同志”每天工作之外还得生火做饭,一位同事在闲聊时会这样说起他的生活,一只锅今天用明天用,从来不洗,他很少洗澡,衣服也很少洗,屋子也很少收拾,桌子上总是灰蒙蒙的,梅雨季节,那就黄一块,绿一块,霉斑点点。

周围的同事与昔日地下党的同志们见他如此窘困,便帮助他物色女性,以尽快找回失去的岁月,回到人生的正常轨道。那位被引见的张女士丈夫去世,容貌端庄,勤劳朴实,仰慕其人品与才华,愿与之重组家庭,白发相守,共享人间天伦。可是二个相谈之时,他顿生怜惜之心,说自己这样不配为人之夫,此女士已为前夫去世而悲痛,自己不能再给对方以伤痛了。

写诗惹得一身祸

如果“一同志”不被无辜牵入胡风案件的话,应该有更光辉的前程,因为当时他已在新中国的官场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只要顺着潮流走,就可能像有的人一样平步青云。可是他却为自己选

错了方向,认为过去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写作没有自由——那时他常到苏州地下党办的“文心图书馆”去,在那里与进步青年一同朗诵自己创作的诗作。他现在在灿烂的阳光下可以放开手来写作了。

他是一位热情奔放的小诗人,名气不大,但却激情如火,心中总是憧憬着一种美好的社会,他在对于社会的观察和分析方面,明显不如建国后不再写小说的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这位“苏州一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满怀豪情写了一首长诗《祖国颂》,并寄给南京的欧阳庄,后来欧阳庄将这首长诗转给了胡风,请胡风帮助看一看。

复出后的“一同志”仍不吸取教训,工余之时埋头写诗,岁月早已将他的诗搓去了灵气,只能在地方性报刊发表。一日突然读到“胡风分子”曾卓写的诗《悬崖边的树》,不由拍案叫绝: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坚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既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要展翅飞翔……

他自叹不如,没有那些知名的“胡风分子”的诗才,确认自己已成“衰然一老翁”,诗途无望,决定搁笔,于是便给编辑去信一封:“弟经年痼疾,饮食俱废,头脑常如箍附,搞出来的东西就散了光华……”。

虽然自己不再写诗,但他注目中国文坛,离休后偶赴南京会见欧阳庄,长谈之事仍是文学。当谈到“胡风分子”路翎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时,他大加赞赏,夸其是迄今唯一的一部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角度出发,成功的写了当时环境下的中国人的鸿篇巨制。并说,要过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能理解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与胡风为该书所写的序言。

许多同事都说,这个人读过佛经,有慧眼,能识别出人世间的最好的东西。

“一同志”的话果然有灵性,200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财主的儿女们》名列其中。然而,“一同志”此时已无法知晓了。

一日,他在《文汇月刊》上看到胡风的文章

《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读后百感交集，挥笔给曾给他带来厄运的老友欧阳庄去信，信中称“记得上次读到胡风告读者的话（题目记不真切了），里面说起对受到牵连的人们感到抱歉之类的话，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能在一生中牵攀进一件公案里，如果不说是充实了的话，至少也是点缀了自己的生活吧！一笑。”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么一个洒脱之人，在苦尽甘来之时，竟然在毫无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于1988年5月10日，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在他悬挂于空中的脚下，几本杂志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留给人间的一段文字：“今年逾花甲，日难自理，活着徒然是社会和亲属的累赘，平添麻烦，还是先走一步吧。”边上一行附言：“下面四本期刊是资料室借的，请予归还。”

到死都没忘记公私分明，“一同志”的共产党员称号当之无愧！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他的名字叫许君鲸。请记住“苏州一同志”。

（责任编辑 杨继缙）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 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 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 测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信心与希望 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四套）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114.00	12.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缙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60.00	8.00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	58.00	8.00
文人陈独秀	石钟扬	39.00	7.00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	金 雁	48.00	8.00
普列汉诺夫·陈独秀·顾准	靳树鹏	30.00	6.00
1943 一盆红火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聆听历史细节	王 凡	36.00	7.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译	58.00	8.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路向 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 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 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追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大国悲剧 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 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将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那一场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沉重的灾难。从“开国领袖”到“个人崇拜”，从“集体迷狂”到“天下大乱”，本书将带你回到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去探寻那许许多多令你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一批批党政要员的荣辱沉浮，一位位风云人物的人生百态，一个个知识人群的命运磨难……读这段历史，能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文革”前十年曲折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清“文革”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这是一段中国社会主义走向的探索史，更是一段民族的历史。

《血色黄昏》：本书全面展示了知青在兵团的政治生活，从兵团总部到连队组织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的场面，出于良心和历史责任，作者真实的记录下知青一代的悲惨遭遇，以及那段疯狂岁月造就的畸形人格……是最具有价值的一部知青题材作品。

《我的母亲杨沫》：一位母亲的真实一生；一个女作家的里里外外；一段知识分子的曲折历程；一组巨变时代的百态写真……本书直击人性，讲述一个真实的母亲，写出了造成亲情湮灭、母性淡薄的原因，极左政治渗透于家庭后的影响。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

《天安门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作者以极为新颖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历史，——通过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参加者——那些动荡事件和受其影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叛逆者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本书选取了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沈从文、梁漱溟、徐志摩、丁玲、老舍等，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富强中国的不懈追求，揭示了他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本书被费正清教授誉为“西方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怀念父亲徐雪寒

。 徐 淮

徐雪寒,1911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1928年被捕入狱,1933年被保释出狱,后参加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研究会。1935年承办新知书店,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出版了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1943年受命进入中共隐蔽战线,任潘汉年的助手。抗战胜利后,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华中运输公司总经理。1946年受命于华中局(根据中央命令)携带上万两黄金拓展上海、台湾、香港等地的商贸活动,为解放战争筹措物资和经费。1949年随军参加上海接管。担任财贸、海关、运输等方面的领导工作。1952年调京,任外贸部副部长。1955年受潘汉年案件牵连蒙受10年冤狱,“文革”10年又备受摧残。1981年平反后投身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逝世。临终前对官场腐败深表愤慨和忧虑。

我叫徐淮,淮阴的淮,抗战后期,我的爸爸徐雪寒在苏北根据地,妈妈带着奶奶和哥哥、姐姐在大后方。抗战胜利了,妈妈通过组织,带着还没有见过爸爸的姐姐,到淮阴找到了爸爸,这就是阿姨们说的“朱光熙千里寻夫”,那年姐姐4岁,而不久,爸爸受命携巨款到上海、香港为党组建对外贸易公司、钱庄、银行、花纱布公司等,为掩护爸爸的身份,已在根据地参加教育工作的妈妈又带着姐姐来到上海,所以我是1947年1月出生在上海,之后妈妈又抱着4个月的我,到达香港。在这些公司、银行中有一批共产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经济战线的领导骨干。当年他们组建的公司香港宝生银号(行)在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曾在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上,发挥过很大作用。

我记事是在上海。就像以往一样,一声令下,爸爸就先行从香港回内地,先是随军接管济南,

后是接管上海,他负责对内对外贸易,在华东局领导下,打击银元贩子,解决人民币流通问题,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后当上海铁路局局长,奉命确保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他不住在家,对于我,爸爸是遥远和陌生的,妈妈也忙,很少见。朦胧的记忆中,有灯火管制,晚上不能开灯,玻璃窗上贴着纸条,而家里只有祖母、哥哥、姐姐和我。

能够经常见到爸爸,是到了北京,他在外贸部当副部长,看见过晚上他背着手,一边踱步一边讲,秘书叔叔在旁边记。那时他有时间关心我了,会过问我的学习。只要我还没睡,一听到汽车声响,就从二楼冲到院里,把自己挂在爸爸的脖子上。但是快乐的时间不长,有一天,我冲下楼,接到的只有警卫员叔叔一人。应该是1955年4月,那一年,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

再次见到爸爸,是10年后,1965年的秋天,我已经18岁了,刚进大学。这十年他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是秦城监狱建好后的首批政治犯。盼了10年多的爸爸,以被假释的反革命分子的身份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妈妈拿给我一份高等法院判决书的手抄件,写的内容,是说他20年代被捕的事,和国民党军统特务王新衡(爸爸姑妈的女婿)的事,还有从香港带回特务交给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等,意思是叛徒、特务吧,最后结论是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不得上诉。妈妈还告诉我,他被安排在国家外文出版局图书馆监督劳动。

是为了保护我吧,爸爸、妈妈未对我做任何解释,只说让我向校党委组织部长汇报,因为审判不是公开的,让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好好读书。不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要说思想一点准备没有,也不对,我在高中毕业时是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成绩也很好。那一年,在高考前,先招女飞



徐雪寒（摄于2001年）

行员,要让我带头报名,而政审又不通过,高考时许多院校不能报名,甚至包括广播学院,最后被录取在纯民用的二类院校。我已预感有问题,那也想不到会是这样。要知道我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育中长大的,那年月只讲阶级感情,爱情和亲情都是会混淆阶级感情的东西,“叛徒、特务”,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罪名吗?我的心被揪成一团,脑袋里轰轰地响。也许是家教的结果,也许与儿时的记忆和一直以来看到、听到的那些仍为共产党干部的叔叔伯伯们对爸爸的态度,让我心中有所疑惑,我流泪了,但没有做出什么激烈反应。有一段时间(一年?),我不叫他爸爸,什么也不叫,不和他说话,甚至不正眼看他。用现在的话说是冷暴力!我冷眼观察着他。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无情地把我们卷入其中。妈妈以反革命家属,我们以反革命子女、狗崽子,后称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走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出身论盛行的年代。什么感觉、什么心态?简单讲,我明白了,我与同学们不同了,已被列入另册,内心痛苦彷徨,消极等待运动赶快结束,等待赶快毕业离开学校。可我发现,实际比我处境更糟,糟千百倍的他,很镇定,他从不“乱说乱动”,但却关心时局,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对运动中的问题、对一个个事件,他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往往很快证明他是对的。在陈毅外长被批斗时,他痛惜,嘟囔着“陈老总,雄才大略啊”;大串联开始,他说,不行啊,铁路运输承受不了,会

影响经济的……慢慢我也从不同渠道听到对判决书内容的不同说法。其实要判断一个人的态度和立场,并不困难。我开始意识到,很多方面我无法与他相比。我不正眼看他是不对的,他不是反革命,他是好人。妈妈悄悄告诉我,说爸爸说她(指妈妈)是“假革命”,说我是“不革命”。因为妈妈面对群众运动,不得不说违心的话,而我,为了自我保护,哪派也不参加,是个小心翼翼的“逍遥派”,我承认他比我革命。

随着运动的推进,刘少奇都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我想通了爸爸怎么会是反革命,林彪事件出来后,在我的内心里就已经给他平反了。

“文革”中伤痛,不堪回忆,太沉重,不说了罢。

“文革”结束后,1977年爸爸才被批准从干校回到北京,1978年许涤新伯伯把他安排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杂志担任编辑。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像很多那个年代的编辑一样,天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戴着副套袖,早来晚走,认真改稿子,有时还把稿件带回家加班。他真的是能上能下,我想,其实要胜任专业性很强的杂志编辑,不光是态度,还要有能力。

爸爸的平反,分外艰难,他的冤案与“文革”中的冤案不同,“文革”前的案子涉及的人相对很少,潘案又是钦定的,还要走司法程序,而且爸爸的平反又在潘汉年的平反之前,阻力很大。记得是1979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医生说是病毒性脑炎,下了病危通知,已说不出话,生死之间,有一强烈的意念就是,我不能死,我要看到爸爸平反。还要说爸爸是幸运的,有不少老同志为他说话,其中五位伯伯: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石西民联名给中央写信,表达他们的看法。终于在1981年,高法宣布撤销原判,中央组织部恢复了他的党籍。在薛暮桥伯伯的建议下,他到新组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以70岁的年龄,开始了一段新的生命。

在这一段的工作,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努力追赶被剥夺了20多年的政治生命。

很惭愧,我们对爸爸工作的了解,远远不及他的各位同事。我和哥哥是学工科的,姐姐是学理科的,在他专注的领域,我们都达不到与他深入交流的水平。他平反后,在老同志们的帮助下,作为解决身边无子女,我的小家从内蒙古搬回北京。新的岗位要熟悉,两边的老人都要关心,又不住在一起。休息日他也在忙,我每周回家大多是与妈妈谈心。他则经常向我们表达的是,希望我们多读书,把工作做好。他不要我们为了他,影响自己的工作。待他老了,有时间了,我们又担心他身体不好,怕过度思考会影响健康,我们常常有意转移他的注意力。我们劝他,一代人有代人的责任,你已尽力了,你要相信年青一代会干得更好。我们希望他能轻松愉快地生活。我们看着他,逐步失去工作能力,以致失去自理能力,这让他痛苦不已。他以极大的意志力,与病痛斗争,走完最后的岁月。我们送走了瘦弱衰老的爸爸,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闪光的形象。

爸爸的一生跌宕起伏。他幼年丧母,童年丧父,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关了5年多,奋斗,迎来了胜利,却又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10年多,外加10年“文革”浩劫。而他居然干了那么多,干成了那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敬佩他:有信仰,有理想,并为之追求一生。他没有文凭,没有学历,连初中都没毕业,但他有知识、有见地、有鉴别力和判断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叔叔、伯伯,都说他能力很强。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甚至是屈辱,但我从没听到过他抱怨,他心中没有怨恨。一次,不知为什么说起了情报工作,我大声表达,我说“地下工作可以做,情报工作,要是我,绝不干,不然,出了事,谁能为我证明?”我为爸爸的这段经历给他本人,给家里每个人带来的灾难,仍然不能释怀。他没有反驳和批评我,而是静静地看着我,直到我声音变小,不再坚持。我明白,他不同意我的态度,如果让他重回当年,他还会选择同样的路。

爸爸他衷心拥护改革开放,支持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他不支持会导致严重通胀的经济政策,担心会伤害百姓;他支持打破一统格局,支持成立新的书店、银行;他关心、支持上海的振兴,我感觉他为上海的发展出过比较大的力,因为那些年,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三位领导来京开

会,必来看他;他给上海和江苏省委的人写信,请他们支持潘汉年的电视剧;他佩服顾准同志的思想,推动对顾准同志思想的肯定和宣传;他对三峡的建设有疑虑,认为论证不够充分。他的观点不管正确与否,他没有私心,他讲真话。

我敬佩他: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求索不止的精神。只要有时间,无论顺境、逆境,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书、报、材料,在看,在思考。他博览群书,他留下的很多书,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大学毕业的我们,都看不懂。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晚年,我动员他听音乐,他说,听不懂。在他看来,听听不懂的音乐是浪费时间。90岁了,只要还能爬起来,他一定会坐在书桌前阅读,实在爬不起来了,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司机小施给他读。他关心国内外的时政、经济,关心社会反映。每次我从外地出差回来,他要我告诉他实际情况。有人来看他,他都会认真交谈,表达他的关切,特别是像吴敬琏、李慎之叔叔等来,深入的讨论,会让他很欢畅。

我佩服他:他主张的,他就会付诸实践。他发表过几篇人口问题的文章,他主张控制人口,为了节育,1948年在香港他就自己跑去做了绝育手术。就像鲁志强同志说的,他支持“安乐死”。他和妈妈感情很好,他对妈妈很尊重。1998年,85岁的妈妈腹膜穿孔,医院又不肯手术,意识渐失,病情已无法逆转。爸爸带着我们子女,4人签名,要求医院的治疗,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为原则,不要用营养药来无谓地延长生命。他和我多次谈“安乐死”的话题,直到我非常认真的表明,我支持“安乐死”,也相信迟早有一天会通过相关法律,但在没有法律规定之前,不可以违法。之后,他才不再提。在他病危后,我和侄女徐倩代表全家向医生转达了他对生命的态度,和我们对他观点的支持。

我敬佩他:有很多朋友。一起工作、战斗过的战友、同事成了好朋友,很多他领导过的叔叔阿姨,称他为徐大哥。就在他被隔离审查的10年中,年年春节也有很多人来看望祖母和妈妈。在他成了反革命,搬家到小破平房后,甚至在“文革”中,都有朋友来家探望。他的朋友老中青都有,不同职业,不同级别都有。他待人很真,很诚。记得还在纳福胡同同住时,有一个青年来看他,谈

胡开明在安徽

○ 张育瑄

1980年3月我离开安徽日报社记者岗位，调到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开明的秘书。

在整整四个年头的秘书工作中，我几乎每天都在开明同志身边。他的音容笑貌，处世为人，他的无私情怀，献身精神，今天历历在目，不由让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毛主席说 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胡开明一生中受到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出现了饥饿，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由开明同志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张家口市，因地处高寒地区，饥荒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大饥荒，他冒着丢官和被批判的风险，力主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和家禽，试行牲畜“分户喂养”，允许荒山林地承包给个人，主张进行生产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他的这些救命的措施，使许多农村恢复了生产，重现了生机。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胡开明经深入调查研究，又大胆推出了一种新的“包产到组”

方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良好的效果。1962年8月8日，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胡开明直接向毛主席写信，建议在全国推行“三包”到组。在这之前，毛主席曾批示、肯定了胡开明的郭磊庄生产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试点经验，胡开明才直接上书。想不到的是，情况发生了巨变，毛主席突然在北戴河大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在8月9日的会议上，即胡开明上书的第二天，公开批判了“包产到户”和胡开明。毛主席说：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是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家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了挺长时间，走时一再对他表示感谢。原来是外文局批斗过他的人，运动之初是造反派，后来成“五一六”嫌疑，被审查，在干校一同被监督改造。年轻人无法承受这天上地下的变化，痛苦、消沉。他感谢爸爸，在那时关心劝导他，让他振作起来，在劳动之余，看书学习，为自己争取来好的发展。

我敬佩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他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忧心忡忡。直到暮年，他都在思考怎么能从机制上对权

力实施有效约束和监督，他非常关注政治体制的改革。

记得爸爸曾经和我说过，“如果说我一生还干了一些事，有三点：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实在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做到却不容易，但他做到了。他从不对我们说教，他对我说的这句话，应该也是对我们的希望吧，我会记住，在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做到“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万里点将,胡开明奔赴安徽

1977年“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撤职罢官的铁道部长万里,正下放在辽宁营口一个农场果园里“劳动改造”。1977年6月被邓小平点将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万里刚刚主政安徽时,安徽农村绝大部分地方受极“左”路线影响,尚未摆脱“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农民虽然辛苦一年,还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许多人家全家合盖一床破被。沿淮、淮北的凤阳、泗县、怀远等一些地方,冬、春季节,大批人外出讨饭,乞讨人往往把一些火车站候车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农村的状况,使万里为首的省委一班人十分焦虑,如何改变这种农民吃不饱、田地不出粮食的状况,他们在思考1960年代“包产到户”曾使一些地方出现过“粮食丰产”、“农民吃饱”的现象。

万里这时想到了那位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而历史证明批判错了,至今被贬在河北省一个小县级市当最后一位(第8位)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开明。1978年7月份,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安排胡开明到安徽工作。

胡开明在电话里对万里说,调转手续还没办,党员组织关系也没转,怎么动身?万里干脆地说,不用了,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谁不知道?先来吧,手续以后办也不迟。

1978年7月12日,胡开明偕夫人、延安时代的女干部李克林来到安徽。当时还没恢复省政府,胡开明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同时兼任省农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开始由万里兼任,后由省委书记王光宇兼任)。可能因为胡开明解放前曾搞过学运,当过学生领袖,分工时还分给他共青团、学联等群团工作。虽然他的分工很多,而实际上万里是把他推到农村改革的第一线,“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他不辞辛劳奔跑在肥西与凤阳之间

1978年,安徽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八百里

皖江和淮河的水位大幅度下降,许多支流干涸,江淮大地河流沟渠不是断流,就是见底,许多地方连人畜饮水都发生困难。预计这样下去,全省将减产几十亿斤粮食,又要出现饥荒年景。

1978年9月1日,省委常委会在稻香楼西苑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专题研究如何战胜旱灾,度过灾荒的问题。万里为全省的灾情和民众的生计深深的忧虑。农村改革步履维艰之时,由省委直接提出“包产到户”的时机尚不成熟。正在会议沉闷之时,胡开明站起来大胆发表意见:“大面积的秋种看起来已难实施,土地干得冒烟,种子种不下去。这样下去,土地将大面积抛荒,明年农民吃啥?一家人生活指望啥?农民穷得叮当响,别说没有那么多救济粮,就是有,哪里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也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摆在那里,何不借给他们去种?”万里和其他常委立刻眼睛一亮,好!一个“借”字,打开了一班人的思路。赞成的,感到顺理成章;即使不赞成的,也不便反对。这个“借”,实际上就是“包”,让农民先“包”几亩干干看。

省委常委根据胡开明的提议,立即形成决议,制定了六条。其中核心内容是:为保命,“借”给每个农民3分地种,开荒、垫洼、边边角角的零散土地,则允许谁种谁收。

“省委六条”,震动了农民的心,人们感到有了活路。几千万被“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欢快。一个“借”字,土地终于回到农民自己手中,有了自主权了!

胡开明对万里十分佩服,关键时刻敢于拍板。

胡开明深知,“省委六条”等于开了个闸门,省委说3分,下边就敢借3亩,人少地多的地方又能更多,农民就有用武之地了。当时中央只是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办法,但仍严令不准“包产到户”。许多中层和基层干部被“单干”、“复辟”的罪名吓怕了,都严守这个“底线”,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当时胡开明和袁振却有着不同的观念,他们常常交流、悬谈,认为“包产到户”没什么可怕,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应该算作农业生产的一种责任制形式。

胡开明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只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只要按劳分配,就没有离开社会主义。来自于群众的农业上的种种责任制形式,只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就是标准,就是目的。他用最浅显的道理来证明他的观点,说,各单位的车队,司机就负责开一台车,这也是责任制。如果几十人轮番开一台车,不讲责任,很快就会把车开散架了。又如工厂车间里,每个车床总明确一个熟练工人掌握使用,决不会大家混起来随便



胡开明(1913-1997)

用。农业也是这个道理,你把这块地包给一户或一位农民,他就有了责任,他就会好好侍弄,精心耕种。反正土地是集体的,这一点改变不了,何不包给他,给他自主权。为什么汽车、车床可以包给工人,土地为什么就不可以包给农民,真奇怪!

那一段时间,胡开明一有时间就往肥西的山南跑,往凤阳的小岗村和一些萌芽搞包产的地方跑。他去的最多的山南,有个黄花大队借“省委六条”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支持下,大胆实行包产定土地:决定每个劳动力承包一亩麦田,半亩油菜地,定产量:小麦每亩200斤,油菜籽每亩100斤,定奖罚:超产时,每100斤麦子可提成60斤,若减产,则百分之百赔偿。这叫“三定一包”。不到两天,全队1700多亩地被承包了1400亩。紧接着“三定一包”呼啦啦推广到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6万亩地全部承包到人。庄稼全部点播完毕,国家指令性任务完成外,还比历年多播种了8万多亩。

这时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赶赴山南来,给干部和农民吃定心丸:“不要怕。主要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大旱之年,把粮食拿到手,即使包产到户,也没什么可怕。”

紧接着,身兼省农委第二书记的胡开明也赶到山南来,为农民撑腰打气。他安慰大家:“不要担心。要看实际效果,要看收成,别光把眼盯在‘红头文件’上。到秋后看看亩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就没错!”

原来,王光宇、袁振等一批领导都明确表态

支持山南的试验。山南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包产到户”,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典型。

胡开明另一个爱去的地方就是凤阳,跑了许多大队,许多生产队,走进许多农户。他到的第一个点是梨园公社。映入眼帘的是衣服破烂的人群,低矮破烂的茅棚,几乎家家没有一床不打补丁的被子,几口人换穿一条破棉裤,多数人外出讨饭。不能外出的老弱残疾和儿童每天用稀汤野菜、山芋梗充饥。胡开明眼睛泪花在闪。他

没想到,解放快30年了,广大农村仍处在这样赤贫状态。

在他经常去的小岗村,他每去一次都鼓励农民探索点办法,如何把生产搞上去。其实在他走后不久,几十户农民就开始酝酿着一个大的举动:全村(也是生产队)20户人家中,除了两户人外出不在本地外,其余18户都聚集在农民严立华家里合计一条生路。他们按下血手印以表盟誓、立约:

一、全队实行“大包干”,瞒上不瞒下,任何人不准走漏风声,向外透露;

二、交纳征购粮油给国家和集体时,任何人不准装蒜,拖欠或耍赖;

三、村干部若因包产到户倒了霉或坐大牢,全村人要负责把他的子女抚养到18岁。

后来这种“大包干”责任制被简化为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既简明,又扼要,责、权、利分明。

一夜间,517亩地包到115人名下。这种“大包干”不久就显示出神奇。当年,全队粮食总产达到132370斤,相当于前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过去25年间,没有一年能交公粮,年年吃返销粮。然而这一年光交公粮就2500斤。县委书记陈庭元了解他们的“机密”,也是来个“瞒上不瞒下”,默认他们的办法,一直在保密。

1979年初,胡开明再一次来到凤阳时,陈庭元了解胡开明的“心思”,对他放心,于是就把小岗村的“机密”透给了胡开明。胡开明心领神会,

会心地笑了,并且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在给陈庭元吃“定心丸”。胡开明过了一会儿才说:“大呼隆”那一套,农民早就厌倦了,不灵了。大家“大呼隆”捆在一起,美其名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地里不长苗,庄稼不打粮食,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工厂里的机器,一人开一台,那能叫资本主义?农民一人扶一犁,就叫“单干”吗?一人负责种一块地就叫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打下的粮食按任务上交,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不允许买卖,农民只有使用权、承包权,那就不是资本主义!那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制!

万里在凤阳表态,“大家大胆干,有我呢!”胡开明先后三次赴凤阳,一次比一次明确:“你们干得对!放开胆子干,实践是最好的证明!有了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支持你们的,反正我已经打倒一次了,再打倒一次也不怕!”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

正当肥西、凤阳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进行成功试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时候,1980年1月,万里调离安徽、回京另有任用。干部的变动,带来了情况的变化。1980年2月份国家农委办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续发表文章否定安徽的责任制,特别有一篇发自安徽宣城地区署名“印存栋”的文章,攻击安徽全省刮起了“单干风”。

在京的万里震怒。要求安徽省委派人调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到底效果如何,用事实来做回答。省委决定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由袁振负责,调查组人员由卢家丰(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和一位姓金的干事。另一个调查组由胡开明负责,调查组人员由胡瑞镜和我。

由胡瑞镜和我组成的调查组,在油菜花盛开的阳春三月,走遍了长江南岸的繁昌县和芜湖县。我们邀请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交谈,并同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同志、县农委的同志,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同志,同一层层的领导交谈,大家都非常坦诚的介绍情况,汇报责任制后的变化,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了解,走访,核算,经过

梳理,我们写成了关于繁昌、芜湖两县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根据全面情况,实事求是地做出了结论:(一)繁昌、芜湖两县农民所探索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管是包产到组也好,包产到户也好,“大包干”也好,都坚持了土地公有,土地和水利设施仍为集体财产,农民只拥有承包权、使用权,而且都是按照责任制的形成作出规定,签订包产协议。上交国家的公粮一粒也不含糊,留给集体的一分一毫也不拖欠,农民的责任、权利明明白白。这绝不是什么“分田单干”,也不是什么“单干风”!(二)所谓“刮起单干风”后农村经济遭到破坏、集体财物遭到毁坏,也是一种不顾事实的瞎说。大多数生产队在实行责任制后,过去集体的农具、牲畜、房屋、机械,都采取了租借、转卖或有偿转让,或联户有偿使用,除极少数地方有些损失外,绝大部分地方解决得比较好,农民满意,干部们满意。过去集体所有的财产都得到了有效使用和保护。(三)实行责任制后,粮食、油料等农作物没有减产,而是大幅度增产,有的甚至成倍增产。两个县粮食、油料成倍增长的生产队是大多数,增长少的其幅度也在三到四成之间。面对丰产丰收,农民喜笑颜开,只愁没那么多仓库,纷纷要求粮站多收一点。过去是口中没饭吃,家无隔夜粮。现在愁的粮食没处放。因为粮食收购站也没有精神准备,粮站也无法放开收购。胡开明听到这一情况后,幽默地说,粮多发愁总比没粮挨饿发愁好啊!两个互不见面的调查组完成了调查任务后,先后向省委办公厅交了调查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两个调查报告所反映的事实完全一致,观点也完全一致。两个报告都很快通过省委上报万里,让中央放心,同时也给那些向责任制发难、泼冷水的人一个有力的回答。

如果说,《农村工作通讯》的发难是第一股“寒流”,不久,另一股更大的“寒流”也涌过来了。

1980年1月,万里离皖赴京后,有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开始对责任制进行责难和质疑,提出“包产到户虽能增产,但干部要头脑清醒,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农民的一些不正当要求,如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的,我们在迁就。毛主席早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我们是怎么教育

的,教育他们去搞资本主义了……”这些言论识传下去后,使许多中层和基层干部改变态度,对责任制产生了怀疑,形势急转直下。

当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对责任制的责难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不但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搞包产到户是怂恿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一些地方领导甚至闻风就是雨,提出“紧急刹车”。

在与安徽交界的邻省的一侧,则出现了“顶住安徽的单干风”、“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标语。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王光宇、胡开明、袁振等同志没有动摇,没有低头,而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民的试验,支持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胡开明同志,在担任省委常委的同时,还兼任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辅佐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顾卓新,主持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在日理万机、格外繁忙的情况下,他挤出时间,多次深入到肥西、凤阳的基层社队,甚至深入到生产队和农民家中,调研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调研,在开明同志主持下,高思明同志参加,由我执笔,写出了《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八个大方面回答了一些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怀疑和责难。这八个方面是:(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不是“分田单干”? (二)包产或包干到户后,集体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削弱了? (三)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 (四)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社队企业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 (五)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机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碍了? (六)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科学种田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 (七)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是否会造成军烈属、五保户没人管,甚至出现“两极分化”? (八)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多种经营是否没有办法搞? 这个报告经开明同志审定后,很快送达省委办公厅。

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对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出批示,加以赞扬和肯定。批示中提到,“安徽的肥西、凤阳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责

任制,方向是正确的,是应当给予支持的……”这个关键时刻,对小平对责任制作出明确表态,彻底扭转了一部分高、中级干部对责任制的怀疑、责难和打击。

大声疾呼振聋发聩

1978年7月胡开明应万里之邀来安徽上任后,就遇上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5日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上,继于光远发表了指导性意见,冯定、祝明夫、邢贲思等理论大家发表意见之后,胡开明发表了《坚持实践标准,敢为真理而献身》的讲话。他针对一些人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的名义反对农村改革的情况,胡开明说:“我们要真高举,不要假高举,有的人似乎对毛主席很有感情,要句句照办,其实是借高举以营私,举得只是旗杆,连个旗帜都没有,只举旗杆不举旗帜,他要干吗呢?要用旗杆打人,伤害同志,伤害农民,伤害百姓。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啦,什么‘复辟’啦,什么方向不对了,什么‘砍毛主席的旗帜’啦,什么‘破坏集体经济’啦,什么‘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一夜回到解放前’啦,这些都是用旗杆来打人的!各类承包制已证明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符合现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什么错?有人谈‘包’色变,我看实际上是头脑僵化,作茧自缚!”这位当年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省级干部,沉寂多年,一旦走上政治舞台,仍然锋芒毕露,认准了真理,一步也不退让!

当时的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先是在凤阳,后来在来安、天长,继而又扩展到全滁州地区,搞起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民喜笑颜开,大丰收在望。但反对的浪潮也很凶,王郁昭、陈庭元这些人政治压力非常大。在这关键时刻,万里派胡开明出席在滁州召开的一次全省宣传部长会议。胡开明在最后代表省委作总结讲话时说:“什么事都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大家可以到大田里看看庄稼,到农民家访农户,一看便知,一问便知,让实践来回答。许多地方,农田包下去,粮食就翻番,粮囤都撑开了,收购站前卖粮车排起长队,农民开始吃得饱,

穿得暖,家里有了陈粮,油都吃不了啦。这不叫分田单干,是一种责任制形式!土地还是国家的,农民承包这块地,就像司机承包了一部汽车,车还是国家的。不能说一承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王郁昭同志推行的责任制我看是正确的,是非常适合农村现状的一种责任制形式,省委支持他!”

有人说,中央文件上也没允许搞“包产到户”。

胡开明说:“一切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它正确,迟早,中央也会支持,也会写入文件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总要有一些先行的人,把路踏出来!凤阳,滁州,就是先行试验,先行开路的拓荒者。”

王郁昭说,胡开明一席话,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最宝贵、最有力的支持。

1979年8月28日,胡开明受省委委托,出席安徽省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烈呼吁:“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来。只要有利于发展现代化的事,我们就要支持就要做,再不能畏缩不前,前怕狼后怕虎,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了。”

胡开明反对一事当前,先问姓“社”还是姓“资”。他认为姓“社”姓“资”要让实践来检验。同时胡开明还认为,精神与思想政治工作都不是万能的。比如“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天天讲基本路线,四清,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右倾,拔黑旗,学大寨,争上游,运动一个接一个,口号一串连一串,可农民的积极性就是调动不起来,地里就是不出粮食,大呼隆,磨洋工,到处都是消极怠工、衣服褴褛的人群,其根本原因是多劳不多得,劳动付出与每人的收入不挂钩。

胡耀邦称赞他是“先知先觉者”

1982年10月份,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安徽视察。

10月下旬的一天,胡开明同志来到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育瑄,耀邦同志给我平反了!党

中央给我平反了!”可以说,这一天是我当秘书以来看到开明最高兴的一天。听办公厅的同志说,近日耀邦同志一直在安徽视察。当时他在稻香楼宾馆的西苑居住。省委常委会也安排在西苑小楼的一个会议室,以便由省委汇报工作,耀邦同志作指示。

耀邦同志的记忆力让人称奇,他还记得这位当年在河北张家口主张搞“包产到户”而遭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胡开明。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

耀邦在省委常委汇报完了工作后,话题转到农村改革工作时,深情地说:“你们安徽最早开始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时候,我当时还不理解,不支持,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经过实践检验是对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因此现在我是支持的。”他转过脸面对着胡开明、袁振等同志说:“1960年以后,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醒悟早,可以说他们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较早地主张要改革1956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办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曾希圣也好。”说到这里,他高兴地朝开明同志点一点头,接着说:“还有今天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他当年在河北省就主张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当然,还有陶铸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啊!”

耀邦同志的公正评价,不仅给胡开明同志彻底平反,而且彻底掀掉了压在胡开明及其家属身上二十多年的大石头。1982年10月29日,这是胡开明和夫人李克林以及全家人最幸福的一天。我这个当秘书的,也打心里高兴。■

(责任编辑 杨继缙)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汪达之 教育史上的一段实践

○ 孙肖平

之终生奋斗的目标。

汪达之一生，最主要的职务是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简称“新小”）校长，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却拥有一席之地，因他在80年前忠实地、创造性地实践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公民教育思想。

达之先生祖籍安徽黟县，1903年出生在安庆市贫困家庭。父亲去世后，母亲膝下三男一女，因生活贫穷，两男一女先后去世。母亲身边只有遗腹子汪达之。母亲靠替人洗衣、织补，总算把达之供养到中学毕业。1928年，达之报考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未能考中。经达之苦苦请求宽容。行知先生看在达之立志一生要做农村小学教师，却因家贫体弱力薄，破例录取。在“晓庄师范”，达之得知行知先生公费留美时，与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同学。学成回国后，孙科高官厚禄，愿与陶兄共享，均被行知先生婉言谢绝。行知先生宁愿脚穿草鞋，粗茶淡饭，兴办公民教育。达之看到行知先生给学生上课时是任何人不能打扰的。一次，门岗对行知先生说，“蒋委员长与夫人来看您了！”行知先生说“请他在会客室坐坐，我上完课就去。”达之入“晓庄师范”的第二年，读到行知先生的《我的理想》一文：“余今生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种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的公民教育，其民之民国即不存在……再经两年之培训，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个高效率公众教育体系，使他们能步美国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因此乃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而自由的理想之国。”行知先生的崇高理想，成为汪达

1929年春，达之以优秀的学业，自告奋勇去贫穷落后、生活困难的“新小”接替陶行知先生任校长。达之与所有“晓庄师范”的同学一样，不论任教员或校长都不拿工资。达之到任后与李友梅、九盛、和中三位同学同舟共济。因师生断炊，他们拿了一件大衣跑了三十里路，当不得两元钱，又饿着肚子跑回学校。行知先生得知后，写信说，“这种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悲壮的一页。我们是何等的安慰而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于是挥笔写下这著名的赞颂。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后来因蒋介石通缉行知先生，“晓庄师范”被封，身为共产党员的李友梅离校躲避，另外两位老师也因家庭生活所迫，先后离校。只有达之一人坚守岗位，奋斗不已。

“新小”校址原是一座破庙，属徽商会址，其财产还有部分地租补贴学校，但因灾荒或逃租，租金不能落实，主要靠行知先生每月寄数十元来接济，还有社会人士一点捐助，再就是达之先生带领学生开荒、种菜。其间，最让达之为难的是，安庆老母生活无着，又是行知先生从自己每月的生活费中扣下几元寄去。为此，达之深感内疚而痛苦万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这里的小孩子，都是很苦的，他们多半都是衣不全，饭不饱的。我们本来有一种计划，叫他们可以做工，管自己吃饭穿衣，但被政局和天灾收去了，至今没有办法，不能救出他们的痛苦。学校简直就是我的了。母亲，我每思到，不能常常在您面前，又不能多寄一点钱给您用，心里立刻不安

三

起来。但是,立即又叫我转过一个念头来,光是不安是不中用的,还是打起精神做我的事要紧。我发愿要将这些可怜穷苦无告的孩子们扶植起来,让他们能得到自己的幸福。还要叫他们能认清谁给了穷苦的罪恶给他们受的。”

为了这些苦孩子,达之先生竟然和热恋中的情人分手,姑娘唯一要求,就是与达之一起去生活较好的城市教书。让达之抛弃比他的命还重要的一群穷苦孩子,是万万做不到的,虽然他此时已近30岁。

生活的艰难,感情的痛苦,磨炼了的意志,一群小学生在他的怀抱里茁壮成长。为了这些孩子能有:

“健康的体魄,生产的技能,艺术的兴趣,征服自然的能力,改造社会的精神。实现这些、还要具备民主和独立思考的头脑。”

达之先生为落实孩子们的健康,要求他们:

“每天早晚运动各一次,每天刷牙漱口洗脸及衣被整洁各二次,每天喝白开水最少三次,每天大便一次。”

学校靠近运河,为了确保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达之请渔民教每个孩子学会了游泳。

为让学生掌握求生的技能,达之先生还请附近的老农做先生,教学生砌墙、修桥、筑路、种地。达之和当地农民关系很好。2011年春,作者前去“新小”所在地淮安县城西河下镇莲花街采访,85岁的姚崇、83岁的张寿喜、82岁的宋文明三位老人还记得“汪先生”(即达之先生)是怎样教他们念书、劳动的。第一课,“起得早、睡得早,省油省灯草”;第二课,“多谢你家茶,多谢你家烟,多谢你家板凳坐半天”。达之先生看到乡亲们没有饭吃,就写信给报社,请教编织蒲草器具的方法。因为运河岸边、校舍一旁的萧湖里蒲草连片,达之先生学会后再教给乡亲们,待编好各种蒲草器具后,又四处奔走联系销路。此外,达之先生还把各家的地契收去,带乡亲们一起去有关部门抵押换钱。老乡的庄稼被驻军的马啃吃,达之先生去驻军团部交涉,保护了庄稼丰收。达之先生和工厂的工人关系也很融洽,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新小”还办了一个小型粉笔厂。文娱生活均由达之先生亲自教孩子们唱歌、演戏。

达之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和遇事独立思考的能力。如学校搞什么活动,不是要孩子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是让孩子们集体讨论,最后由他做总结。一天,校外一个小朋友把校内一棵紫荆花树偷去了,达之先生让大家讨论怎么办?有的说把他狠狠打一顿,看他以后还敢再偷?有的说,让他赔钱;有的说,让他重新种一棵……最后达之先生说,我认为“重新种一棵”的意见较好,你们大家同意吗?全体同学举手通过。

“新小”有两部分学生。一部分年岁大些,家庭较贫苦;再就是如革命家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和革命后代左义华这部分学生,他们吃饭穿衣等一切全由学校供给。另一部分年岁小些,家住附近,一切由家庭负担。在学习方面,年岁大的除上课外还要辅导年岁小的;年岁小的回家后还要教父母识字。

达之先生创建“新安儿童旅行团”时,也是先和孩子们一起讨论再作决定,然后给陶行知先生写信,请他多多帮助。1933年,由7个小学生组成的“新安儿童旅行团”出发了,而达之先生则留在学校。7个孩子选出保卫员(负责安全),卫生员(负责看病)、伙食员(负责吃饭、喝水),对外联络员(负责参观事项)。达之先生除给陶行知先生写信外,还给在上海的朋友写“求助信”。小朋友出发前,达之先生还在每个孩子口袋里放一元钱,以备急用。

小朋友们一下火车就投入了紧张的活动。在沪50天,参观了纱厂、上海味精厂、黄浦江码头、“一·二八”淞沪战场、教堂、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大厦大学、暨南大学以及十多所中学、小学等地。

小朋友们遵照行知先生的教导,在参观工厂时,问“工厂有多少工人,资本家赚多少钱,工人一个月拿多少钱,一天干多长时间的活?”在参观“家庭工业社”时,他们寻根问底,最后得知这家工业社生产的“无敌牙粉”和“无敌牙膏”是在抵制外国货中产生的,还得知“一瓶牙膏提一分钱,支援国家买飞机!”时,个个感触很深。

孩子们每到一处,首先把他们的《宣言》和左

义华九岁时出版的《义华日记》送给接待单位，然后开始演讲。那时上海有日本的租界，政府不准在报纸上出现“抗日”，只能写成“抗X”。但是这群小朋友，到大学演讲，就站在讲桌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小孩子也决不当小亡国奴！”时，教授和学生在台下一面鼓掌，一面流泪。

过去，有些上海人是看不起江北（指长江以北人）的。现在，这些穷苦孩子的言行，在上海引起轰动。他们刚到时，靠行知先生为他们联系。可几天后，打电话要求行知先生安排孩子们前去参观、演讲的单位就应接不暇了。意想不到的《申报》主笔陈彬和与夫人，还把7个孩子接到家中，一住就是50天。市民出于感动，自动给孩子们送钱。

孩子们在沪的50天，达之先生给他们写了8封信，叮嘱他们注意安全，并盼他们胜利而归。在1933年11月6日早晨的信中说：“昨夜忽起北风，清晨很寒，小河已有薄冰，我想到你们的衣服，你们赶紧和陶（行知）先生、孙先生（陶先生助手）商量，每人做一件粗布大衣，要紧，要紧。”有的信则是表扬他们当中回信写得清晰工整，同时批评某某小朋友字迹模糊不清，还批评一位小朋友叫家中寄一元钱来买零食。……

小朋友们快要返校时，达之先生写信给行知先生，请他对孩子们作一个评价。行知先生在1933年11月8日回达之先生的信中说：

这是新时代无价之宝，姑且定他万万万万的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谁也没有，却为新安所得，使福特摩尔根辈见着，未免要生小巫见大巫之感受。而新安不敢私为己有，愿公天下后世。这又是富翁们舍不得的了。好，如果讨厌黄金，就让我唱吧：

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没结婚。

没有父母带，老师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这群孩子中的张俊卿分管财务，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笔笔有据可查，总结账面时记着“收支两抵尚存34元9分4厘”。

小朋友出发时草鞋破衣，两手空空；返回时，新衣新鞋，赠品成捆成包，赠送书数千册。回到学校后，一位母亲对达之先生说：“喂，早晓得这样，我家的小四子就不

让他去学生意了。”

四

自从“新安儿童旅行团”出发的那一天起，达之先生就考虑下一个更大的行动。“创建年岁大些，人数多些的‘新安旅行团’。”当“新安儿童旅行团”凯旋后，达之先生对下一步创建“新安旅行团”更充满了信心。果然，经过两年的紧张准备，在行知先生为首的各界鼎力帮助下，有14个学生成为“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团员。为培养学生自主处理事务的能力，达之先生坚持不做团长，只当顾问，以宣传国父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共赴国难”，实践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修学旅行”为由。1935年10月，“新旅”从江苏淮安出发了。

第一站，是江苏省省会镇江。他们就带着两本由7个小光棍所写的《我们的旅行记》，前去拜访教育厅长和省长。他们不肯接见，但看到“新旅”小孩子出版的书后，教育厅长陈果夫毅然在孩子们送去的特制大本子上写了“幼学壮行”；省长周佛海写了“鹏程万里”。这个政要人物的《签到本》，遇到拦路的国军，就成了可靠的《通行证》。第二站，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因有了前两年“新安少年儿童团”的广泛影响，吃住、开展活动都不成问题，但受到市长马超俊的阻拦。他说小孩子抗什么日，快回去读书。“新旅”小朋友们和市长争辩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汪达之墓

了我们的东三省，‘一·二八’进攻上海，现在又进攻华北和内蒙古了，东三省的大人当了亡国奴，小孩子不也当了小亡国奴吗？”竟把市长说得哑口无言。

1935年11月间，“新旅”在南京遇到了一位自称淮安的同乡——中央党部宣传科高科长。“新旅”一位老团员是这样描述的：这位高科长说：“听说家乡小朋友如此壮举，非常钦佩，云云。他说和中央电影厂很熟，可以引我们去参观。我们领了他的‘乡情’。可是到了电影厂，只让我们看了一个摄影棚内的布景棚，而厂方在茶话会上却十分大方地搬出十几本影片来……原来其中除了三本叫《农人之春》的所谓故事片外，其余都是些‘剿匪纪实’。我们这时才明白了这个‘同乡’的真意。”

同样还是这位高科长，在达之先生的笔下，却有着不同的描述：“有位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高科长来安徽中学看我们，自称淮安人，说是今天看到报上的报道，感到你们为淮安人争光，我特先来看过你们再去上班……他已准备星期天招待我们在他家吃顿饭……星期天我们到了高家，他自己忙着安排饭菜和座位……午饭吃完，他亲自和我们一边吃茶、一边说话，首先说南京淮安人不多，接着谈到我们这样出来锻炼一下很好，又谈到社会上很复杂，连他们机关内部都是很复杂的，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受到坏人欺骗。接着谈到要他帮助什么，能办到的，一定帮忙。我们提出两件事，一是中央党部出的一部影片《农人之春》能不能借给我们带到各地去放映？二是能不能为我们发一张护照？他想了一下说，只要你们写一个报告经批一下，是可以办到的。”达之先生还写了高科长不但为“新旅”办了护照，而且看文艺节目、借用影片的手续都为我们办到了，还为我们送了一面锦旗。现在回忆起来，“与这位高科长的见面，是想不到的事。”达之先生对高科长的批评仅仅是“也反映了他是当时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的人，而封建意识的乡情是那样浓厚”而已。

上面这段文字，是达之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关在牛棚中交代“反革命罪行”时所写。如果他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高科长臭骂一通，造反派肯定少抽他几皮带，但达之先生宁死不说一句假话。

也有人说，“新旅”是由中共上海左翼教联党支部决定成立的。我们至今在达之先生的所有文字中查不到这一重要决定的片言只语。如果真的有这个决定，达之先生为何不在“文革”受迫害时，把这无价的“光环”罩在自己头上？

我们从达之先生1933年写给旅行上海的孩子们的信中看到，那时他就产生了创建“新安旅行团”的想法，而且行知先生已答应给他们买一部电影放映机。这就是说，“新旅”的创建主要是靠陶行知先生和汪达之先生的操劳。当然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还有各界的支持。行知先生是敬仰共产党的。他的学生、朋友很多是共产党员。但是行知先生本人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加入共产党。他在1924年创办平民学校时，就提出：“不要带色彩。读书本是一件好事，如若带一点色彩就不好了。”达之先生也是如此，他三十年代不是党员，但热爱共产党。不过，“文革”期间，达之先生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1937年，团员徐志贯，去龙东边区找冯文彬，为的是瞒着他在‘新旅’建立中共党支部。那时，达之先生是不愿意在“新旅”建立中共党支部的。

老团员张牧在一篇文章中说：“达之先生为何听到‘新旅’建党心情沉重？”达之先生说：“党可有铁的纪律的呀，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了，我入党以后，党如果要决定取消‘新旅’，那我怎么办呢？”

五

达之先生在带领“新旅”进行长期抗日救国宣传教育的同时，十分重视提高团员政治思想水平。“新旅”从淮安出发不久，达之先生就带领大家拜访抗日将领冯玉祥，冯将军虽以粗茶淡饭待客，但却激昂慷慨地给团员们讲了“为什么一定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

为加强孩子们的文化艺术基础学习，1936年4月，“新旅”参加了由田汉同志在南京主持的话剧会演。团员们在表演、收票和服装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田汉同志和音乐家张曙为“新旅”创作了团歌：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拼命地工作拼命地跳，一边儿学习一边儿教。

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来改造！……

“新旅”从南京赴上海后，立即汇入了上海抗日救国的洪流。同时，挤出时间学习，达之先生请艾思奇先生给团员讲解《大众哲学》，音乐家冼星海、吕骥、盛家伦、麦新、孟波都不取分文报酬自动前来教“新旅”唱歌。期间，吸入了骨干团员童常、张平、黄中一。张平已考上复旦大学，但他被“新旅”青少年的革命热情所吸引，也加入了“新旅”，并把读大学的学费捐给了“新旅”。在上海，由蔡楚生导演的《小武义》故事片，请“新旅”小团员曹维东演主角。鲁迅先生逝世后，“新旅”承担了葬礼挽歌队任务。

1936年11月23日，傅作义部队向盘踞在百灵庙的日军发起了攻击，收复了百灵庙及其附近地区。为庆祝这一胜利，“新旅”在上海“生活教育社”的安排下，参加了由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为团长、达之先生为副团长的“上海文化界赴绥慰劳团”。“新旅”团员除了为抗日将士送慰问品外，还演出了文艺节目。期间，傅作义和阎锡山在举行宴会时，也邀请“新旅”团员参加。

达之先生正在考虑“新旅”下一步去哪里之时，恰遇著名记者范长江先生，他劝“新旅”到大西北去看看。于是，达之先生向傅作义提出要求，傅将军当即答应，并向他的所属部队打电话，还派车送行。“新旅”在内蒙古草原，为牧民和农民唱歌、跳舞。为了团员的生活费，“新旅”在放映电影时要收一点费的，但实在没钱的小朋友，只要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可入场。或者当场教几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只要能写出来，也是可以入场的。这些乡亲们祖祖辈辈没看过电影，于是，骑马、赶车，从几十里路远的地方涌来。“新旅”团员借机向乡亲们学习当地民歌。

在包头，“新旅”受到段绳武先生的热情招待，达之先生向团员介绍段先生原是国民革命军一位师长。在山东驻军时，被武训为穷苦孩子“乞讨办学”所感动，将家产变卖后，到包头建新村、办学校。团员们知道行知先生非常敬重武训，听了达之先生的介绍，也对段先生十分敬佩。

1937年12月，“新旅”经绥远、宁夏来到甘

肃省时，达之先生到八路军办事处和谢觉哉同志取得了联系。也找了省主席朱绍良，请他帮助调车去西安，因车辆较少给“新旅”雇了两辆车，送了300块钱，给每位团员做了一套新衣服，并欢迎“新旅”长期在甘肃工作。

1938年5月，“新旅”到达西安。张牧在《新安旅行团——我的一些回忆》一文中说：“我们支部讨论时，一致意见是不如从西安去延安，那样全团同志可分别到抗大、陕公（陕北公学院）、鲁艺去学习，然后由组织分配到八路军前线工作。徐志贯同志将这个想法提出来，汪先生就问，那我们这个团体就解散了？！他赞成去边区，但反对团体就此结束。当时我们三个党员都觉得汪达之先生把团体看成个人所有，太个人主义了。”当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向“新旅”三个党员和派来建党的牟永春同志说明“新旅”不能解散的理由后，张牧同志说：“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1938年6月底，“新旅”到达武汉。在这里又看到田汉同志。这时，日寇步步逼近武汉，连田汉同志都有些忧心如焚。这时，13岁参加“新旅”的范政，写了一个抗日话剧请田汉同志指教。田汉同志看后精神为之一振，那天他为保卫大武汉作动员报告时，提到范政的名字，说着就从讲台上下来走进人群中，一面激动地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一面说“一个具有这样杰出后代的民族，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倒的！”在武汉，达之先生和他的孩子们深入工厂、学校、部队，演讲、唱歌、写标语，鼓舞士气，直至军民大撤退时，还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这时，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先生给了“新旅”高度评价。从国外宣传抗日回国的行知先生，则颂扬“新旅”：

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

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六

1938年8月底，达之先生率“新旅”到达长沙。9月底，中共湖南省委青委李锐同志（即曾任毛主席秘书的李锐）通知“新旅”，派人随湖南省委“第十战时儿童保育院”开展青少年工作。党支部决定成立“西南第二工作队”。李锐同志并把8

岁表弟方南君、10岁的表妹方晓,及别的小朋友送到“新旅”参加革命。这时,周恩来与“三厅”的同志也到长沙。周恩来同志决定“新旅”直属“三厅”编制,仍回到西北地区工作。但在路经桂林时,因交通不便,滞留桂林。

当时敌机天天轰炸桂林,“新旅”在七星岩举办了“岩洞教育”活动。在市民躲飞机时,宣传抗日,教孩子唱歌、识字。因“新旅”在桂林各项工作出色,受到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同志的表扬,苏联塔斯社记者卡尔曼还为“新旅”拍了纪录片。

1939年春,政治形势日益恶化,达之先生为求三厅解决去西北的问题,到重庆交涉。1939年秋,听到三厅要停发“新旅”的工作费用后,他又去重庆。这时,正值周恩来同志出国回来,“新旅”的工作费用没有停发。于是,在桂林恢复了“新安学校”,当时,桂林聚集了许多文艺界名人,他们对“新旅”帮助很大,舞蹈家吴晓邦步行往返十几里路,分文不取为“新旅”排演《虎爷》。

1940年春,驻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通知“新旅”到柳州听候整编。当第三次通知时,达之先生亲自前去交涉,回来后即与刘季平同志一起研究,给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写了《报告》,还给冯玉祥、陶行知先生写了信,才暂时保住了“新旅”。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旅”的生活又遇到了困难。团员们把父母给的零用钱交到团部。范政、大朋、张拓把刚出书的稿费全部交公。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下,1941年2月,“新旅”卖掉电影放映机等家当做路费,经香港、上海,秘密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受到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新旅”组织了18万少年儿童,为宣传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达之先生则先后任盐埠区行署文教处等职……1944年,达之先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达之先生开始了新的生活——43岁的他与杨楠琛同志结为夫妻,行知先生赠诗祝贺。达之先生和杨楠琛同志婚后生二子,汪如一和汪心一。改革开放后,如——一家四口移居美国;心——一家在国内。

1952年,经全国21个省市和香港、行程五万里,曾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关注,从14个团员发展到500多团员的“新旅”,完成了神圣的历史任务,与几个文艺团体合并为“上海歌剧院”。达之先生离南京“晓庄师范”校长一职,赴北

京“人民大学”学习,后调教育部工作。当时,全国大批武训。1946年,行知先生逝世时,毛泽东同志把行知先生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仅仅五年之后,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受到批判。自此,达之先生心情十分痛苦。这时,达之先生的学生常去看望他,达之先生感到无限欣慰。然而,不幸的是,1953年,他“就我国综合技术教育问题”向教育部党组“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建议”,多方面提出了精辟论述和独到见解,在“文革”中,被广东民族学院专案组诬为“三反”言论印发和批判。此时,任职广东民族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的达之先生惨遭迫害,更令人痛心的是,他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新旅”团员,有的成为“胡风分子”(杜高)、有的成为“右派分子”(郝杰、严忠、马戈),而11岁参加“新旅”、13岁加入共产党、被郭沫若先生视为多才多艺的作家范政,先被打成右派,后在“文革”中卧轨自杀。从小参加“新旅”的著名油画家、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的肖峰,在“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文革”中,“新旅”团员半数以上遭到冲击。

被党和人民誉为“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教育家”的达之先生,1980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根据达之先生的遗愿葬于淮安莲花街。

如今,已遇耄耋之年的“新旅”团员,回忆起达之先生时,个个犹如孩童一样,都不叫“达之先生”而叫“汪爸爸!”。

(作者系“新旅”团员、著名作家,著有《孙肖平文集》四卷)

(责任编辑 杨继缙)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过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 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 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

102488 信箱 3 分箱

收款人 崔秀岭 邮编:102488

东北抗联的一桩公案

○ 张克黄强

《世纪桥》杂志 2010 年 20 期《赵尚志李延禄：冰释前嫌携手抗日》一文，应是报刊上首次披露东北抗日斗争时期两支同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缴械、枪杀事件——即 1935 年夏，赵尚志带领三军（即后来的抗联三军）一部突然包围李延禄领导的四军三团团部驻地，缴了三团 300 人的武器，开枪打死团长苏衍仁。该文所说的起因仅是赵尚志“听说三团要投降日本人”，未作任何分析地端给读者。假如真的是苏衍仁要领着三团投敌，被赵尚志给解决了，那岂不是他为抗日、也为李延禄除了一大隐患？是他立的大功一件啊！但李延禄并未领赵尚志这份情，并不认同赵尚志所谓的理由。既然此事已公之于众，就该说清楚是非曲直，不再蒙蔽今人与后人。

（一）

我第一次听说“小白龙”（即苏衍仁）及其传闻是 48 年前——1963 年，记得那是在黑龙江省东部的林口县奎山公社中山阳村采访。这个山村地处张广才岭支脉那丹哈达岭南麓，林口县的中部，东临穆稜县，北距勃利县也不远，是老区。上了点年纪的乡亲们说：从张作霖时代到伪满到东北光复——赶走日寇后的三年大剿匪——我党为建立与巩固东北根据地而进行的大规模剿匪斗争胜利，这一带一直闹“胡子”——土匪。他们有的能说出几股土匪“绺子”的名号，讲土匪们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有好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却对我讲了一位“好胡子”——绿林好汉“小白龙”的传闻。这“小白龙”据说是民国年间到日寇侵占东北后几年间的人，在牡丹江地区很有名。“小白龙”不是匪号，而是山区民众与大小“绺子”给他起的绰号。一则因为他年轻长得英俊，夏天

一身白绸缎衣裤，爱骑白马，更成百姓口碑的是行侠仗义，劫富济贫，从不欺凌百姓，还常周济穷苦人粮食衣物；再有就是武艺高强，枪法好，百发百中等等。据老人们说，“胡子”——连大“绺子”都惧他三分，小“绺子”都听他的“招呼”。每当“胡子”抢劫，只要有人敢喊一句“‘小白龙’来了！”“胡子”赶紧住手、开溜。问到这“小白龙”的归宿，一位曾当过私塾先生的高姓老人一再感叹：“这么好的绿林好汉少有啊！可惜从民国廿五年就再也没听人说他了！有人说他跟抗联走了，有人说他让日本鬼子打死了。……”总之是不知其所终。

当年我已真的相信“小白龙”确有其人了，不要说中山阳村的老乡，就是在林口、勃利、穆稜三县，上了年岁的有知道“小白龙”的，却打听不出他的真名实姓，更说不清他的所终。1984 年在北京，著名东北籍老作家骆宾基先生给我一本《过去的年代》，这是由他执笔的李延禄东北抗日斗争回忆录。李延禄在东北解放前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军长，“文革”前是黑龙江省副省长。读过回忆录，对东北抗日斗争——特别对东北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和我在 1963 年听说过的“小白龙”对上了号——“小白龙”就是曾经在吉东—牡丹江地区很有名气的绿林好汉、抗日英雄苏衍仁。而且也知道他的所终，尽管当时难以相信，但却是事实：他被赫赫有名的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枪杀。记得当时心情沉重，既为“小白龙”苏衍仁的下场感到悲伤，又为赵尚志这位民族英雄惋惜。……不久，又读到了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的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李范五是穆稜人，东北抗日斗争前期一直在吉东—牡丹江地区的穆稜、宁安做地下党领导工作。1935 年春任中共吉东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领导吉东地区地下党与四军、五军等抗日



地区当时称为吉东（吉林省东南部）。从1931年冬天开始，这一地区广大人民不愿做亡国奴，奋起反抗。东北军旧部、民众义勇军、绿林武装山林队等，纷纷举旗抗日。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就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随后指示东北党组织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在党组织处

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他在回忆录里用了较长篇幅讲述“小白龙”苏衍仁，并且是赵部对四军三团缴械、杀害苏衍仁事件的处理者。可见，这一发生在同是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间的血腥事件，尽管骇人听闻，难以置信，却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对于苏衍仁的绿林生涯，李范五在回忆录中写道：“1933年8月他从穆棱调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住在宁安孙八爷的大车店里等待接头人，晚上听车夫们闲聊：什么神出鬼没的‘小白龙’呀，刀枪不入的红枪会呀”，“苏衍仁这支山林队在勃利一带（伪满前期无林口县，今林口北部中部属勃利县——笔者注）是兵强马壮的一支劲旅，山头牌子很亮，其他几小股山林队都把他当盟主。最初活动在勃利青山一带（今林口北部青山乡仍有一片原始森林），专门打日本林业资本家，抓住日本人做人质”。东北解放后的1946年，李范五任合江省委书记时，勃利县土改工作组团长对他说：“‘小白龙’在勃利县广大群众心目中留下很深印象。当时勃利县有会局，讨会的人把‘小白龙’写在牌位上，每天烧香磕头向‘小白龙’讨会。据说有几个赌徒赢了大钱，都是‘小白龙’显灵给的。”可见与我在林口中心山阳村听到的一致，“小白龙”名气很大，在民众中影响很大。

两位在吉东—延边、牡丹江、合江地区领导抗日斗争的先辈回忆录，都记述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前期的一些重大史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辽宁，魔爪伸向吉林、黑龙江，两省省会相继沦陷。今天的黑龙江省松花江以东广大

于地下、影响尚不大，自己又没有或武装力量很小的情况下，大敌当前，贯彻执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十分迫切、十分重要，是各地党组织与共产党人的生命线。杨靖宇、周保中、杨松、李延禄、李兆麟、童长荣、魏拯民、冯仲云、李范五等一批共产党人，都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一切抗日人士、抗日力量，使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壮大。中后期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的东北抗联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消灭大量日伪军，直到取得最后抗战胜利。而李延禄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吉东特委书记吴平（杨松），团结教育吉东地区著名山林队头领苏衍仁，引导他加入党领导的部队英勇抗日，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生动成功范例。

（二）

1933年秋，李延禄奉中共吉东局之命，率领反日游击军（即抗联四军前身）从宁安南部开赴密山开辟新游击区。当时“小白龙”苏衍仁的山林队正活动在密山与勃利交界的山林里。李延禄的部队英勇善战、群众纪律好，又很快团结、吸收了赵挑水等的山林队民众武装，对苏衍仁产生很大影响。李延禄在了解了“小白龙”苏衍仁和他的队伍情况后，认为苏衍仁虽为绿林道上的人，他们却不骚扰、不伤害百姓，并且打过日本人和伪军，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他们是股大“络子”，兵强马

壮、很能打仗，当地一些小“绺子”奉他为盟主。如果能把苏衍仁争取过来，使他们走上抗日道路，还能带动其他的山林队，壮大抗日队伍。于是，李延禄和一团团长杨太和、二团团长史忠恒不带一兵一卒进山拜访“小白龙”苏衍仁。苏衍仁虽然是草莽英雄，但从反日游击军一进密山，就派人访探这支部队和李延禄的来历。他对这支曾在镜泊湖南湖头伏击日寇天野旅团，重创日寇，取得大胜的部队，对李延禄、史忠恒、杨太和等抗日英雄十分钦佩。如今他们主动上山来见自己，可见是对自己很敬重，惊喜非常。双方畅谈很久，对李延禄关于时局的分析和团结抗战的道理很受启发。但由于当时中共密山县委主要负责人“左”倾关门思想严重，团结争取苏衍仁的工作受到影响。1934年7月，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之命巡视吉东的吴平（杨松）来到密山，在反日游击军哈达河密营见到李延禄。他根据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再重申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精神，不仅充分肯定了李延禄自1932年初进入王德林抗日救国军与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等共事，给救国军当参谋长，出谋划策、领兵作战，攻克敦化、额穆、蛟河三县城，在南湖头“大河口”伏击日寇天野旅团，并为相互配合对日伪作战，与吉东地区的东北军旧部将领、山林队等民众武装头领交往，充分肯定，赞扬他的这些作法完全是在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对他要团结“小白龙”苏衍仁携手抗日，更是十分高兴，坚决支持。他对李延禄与密山县委的负责人讲：“小白龙”苏衍仁、赵挑水这样的绿林好汉，本来就是关内贫苦人，求活路闯关东，被逼上梁山落草的。他们不骚扰百姓劫富济贫，是有良心，是爱国的。结交他们，引导他们抗日，正是贯彻执行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大事。他身体力行，在“密山会议”结束后，立即与李延禄赶赴“小白龙”山林队的山寨“登门拜访”。一见苏衍仁，他就喜欢这位一身正气、英姿勃勃的好汉。他听了苏衍仁自述身世，对自己“落草为寇”而羞愧，吴平深表同情，说自己和“李司令”也都是穷苦人出身，为了打走日本侵略者救人民，才远离家乡亲人，跟定共产党，哪怕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他对苏衍仁和头领们讲全国、东北、吉东地区的抗日形势，指出只有各个抗日武装联合起来，

团结作战，不断壮大队伍，才有力量打败日军和伪军。共产党是决心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抗日到底的。吴平的一席话，把团结抗日的道理讲得明白，也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对他们和所有民众武装的一片真诚。对草莽英雄“小白龙”苏衍仁来说，真是醍醐灌顶，拨开云雾见青天。而见到吴平这样从国外来的共产党大官、大能人，又和李延禄一样堂堂正正，一心杀敌救国，并且十分看重自己，真是前所未遇，三生有幸。他非常感动，纳头便拜，要与吴平、李延禄结拜，跟吴先生走、跟李司令走。吴平和李延禄见他如此爽快如此真诚，也连连叫好，当场与苏衍仁及主要头领磕头结盟。不久，“小白龙”苏衍仁果然带领他的300名弟兄加入李延禄的反日同盟军，编为第三团，苏衍仁为团长，党组织派共产党员邓化南为三团政治部主任。有在吉东地区山林队“盟主”之誉的“小白龙”与共产党人吴先生、李司令磕头结盟，全队加入反日同盟军，一时成为到处流传的佳话，产生很大影响，不少民众武装找门路接近四军、五军。尤其是宁安的“占中华”付显明、红枪会王汝起，镜泊湖的神炮手张祥、西北山八大队之一的“青山大队”于载江、“同好队”的胡佳泉等，不久后加入周保中的五军，这与苏衍仁的带头有很大关系。李延禄回忆录《过去的年代》与今人的《杨松传》都记述了这些事实。李范五在《燕山黑水风云录》也写了吴平、李延禄“与‘小白龙’苏衍仁磕头结盟”。

苏衍仁不仅为人仗义、豪爽、枪法好，作战时总是冲锋在前，弟兄们十分佩服，舍命追随，而且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率全队加入四军，有李延禄、史忠恒等抗日名将的指点、帮助，如虎添翼，与日伪军作战总能出奇制胜。而这样一支武器精良、作战勇敢的武装，在东北抗日武装中也是少有的。四军的力量也大为增强，按照吴平的指示，1934年秋后开始向西挺进，一路上不断取得对日伪作战的胜利。而有关苏衍仁三团进行的抗日战斗，不仅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里作了记述，李范五的《燕山黑水风云录》中也说“如攻打日本人经营的东稻公司、草帽顶子战斗、击溃龙爪沟伪自卫团、破坏牡佳铁路修筑”等战斗，都十分勇敢，每战必胜，消灭许多日伪军，震动日伪统治。特别是1935年2月初，苏衍仁率三团袭击守

卫日本清水组合大木场森林警卫队，当场击毙十多名伪警察，其余的投降逃跑，自己无一伤亡。此战不仅缴获许多粮食、衣鞋，解救了上百名劳工，而且得到 300 匹马，战士们全成了骑兵，使三团变成了东北抗日武装中最大最强的一支骑兵部队，行动迅速，常出奇制胜。尤其后来四军攻打下江重镇阁凤楼时，增援的近千名日伪军被骑兵团冲击得溃不成军，死伤无数，保证了攻城战斗的胜利。这支骑兵在下江地区使敌人闻风丧胆，谈虎色变。在李延禄、邓化南的帮助下，苏衍仁成长很快，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抗日英雄。

吉东地区、特别是下江一带张广才岭北段山区，森林茂密，一些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在这一带开木材公司。贫苦百姓每到冬季便进山伐木或“拉套子”往山下运木材，这是他们一大生活出路。在勃利时苏衍仁山林队抓住日本木业商人就做人质（绑票），限期用钱物赎回，称作赎命钱，否则“撕票”（杀掉）。加入四军后，在邓化南帮助下，改为“救国捐”，放宽期限和物品种类、数量，商人可用布匹、药品、盐、枪子弹药赎回，给伐木工人多开工钱，很少“撕票”，对日商和中国商人要求也有轻重之分。成批的伐木工人自愿加入部队，三团由原来的 300 人增加到 500 人，编成三个营。

李延禄率领四军在下江地区（今牡丹江与松花江汇合的勃利、依兰、方正三县交界地区——今天的林口县西部地区在内）很快打开了局面。发动群众组织反日救国会等民众抗日团体，安排一批爱国抗日的骨干人员进入日伪机构，“外白内红”，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到 1935 年夏，下江地区已成为吉东地区主要的抗日游击区，甚至创建了陈家亮子、大小罗勒密等几处根据地，有了民政税收等简易的管理机构。日伪在报纸上多次惊呼下江已成为“红地盘”。李延禄与四军的这一重大成就，英勇善战，又能做群众工作，受百姓拥护的苏衍仁及三团是立了大功的。也正因四军创建了下江抗日游击区，赵尚志的三军在屡遭日伪军围剿，不得不撤出哈东宾县、珠河（今尚志市），才来到距离最近的去处与落脚之地——方正东北部——四军三团扼守的下江抗日游击区“西大门”。

赵尚志率三军部队是在白天来到苏衍仁三团驻地的，苏衍仁显然事先接到李延禄的命令，欢迎赵司令与三军到来，安排他们住在与三团团

部驻地较近的村庄，全无戒备。夜间，赵率部突然包围三团团部所在地九龙沟，缴了与三团团部同在一村的两个营的武器，开枪把苏衍仁打成重伤，很快死去。三团政治部主任邓化南显然也被缴枪，命在旦夕。他对赵尚志据理申辩，最后找出了党内文件，证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三团是党领导的部队。此事不仅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里讲了，当时的吉东特委负责人李范五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里也有记载。李延禄的四军军部驻地陈家亮子距三团驻地不远，接到惊变消息，李延禄很可能立即出发赶赴三团驻地。他见到赵尚志，也会见到已死的苏衍仁，见到赵尚志因一念之差留下的见证人邓化南。邓化南当然会向李延禄报告一切的，因他负有党代表的职责，他讲的事情经过无疑是准确的。而李延禄亲临现场，所见所闻很清楚地说明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总而言之，他是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而在他写回忆录时，已故的赵尚志已是名满天下的民族英雄，所以他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在《过去的年代》里实话实说。而李范五作为领导四军的中共吉东特委负责人，同年 7 月得到四军的报告信件，并给李延禄与赵尚志去信提出处理此事的要求，显然对这一重大事件不会记错，他说：“得知三军把四军三团缴了械，杀了团长苏衍仁（小白龙），事情发生后，吉东特委为了维护党的政策和反对“左”倾行为，一面报告省委，一面写信给赵尚志，要求他把枪还给四军并赔礼道歉。”中共吉东特委领导今天黑龙江省松花江以东地区的各县地下党和四军、五军、七军等抗日武装，而赵尚志部原来的哈尔滨以东五常、宾县、阿城、珠河（今尚志）不在其内。如此严重的事情必须处理，但只能报告满洲省委与写信对赵尚志提出退枪要求。李范五接着说：“至于三军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行动，当时我不清楚。有人说，因为他（指赵尚志——笔者注）看中了三团有几挺好机枪，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按理说，即使第一次见面就发现三团有什么严重问题，也应该交给四军军部去处理，不该发生缴枪，甚至杀人事件”。赵尚志看中了三团有几挺好机枪，看三团武器好，这和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得一致，李延禄认为这是事情的起因。李范五不同意此说，因为他不相信赵尚志这样一位抗日将领会因此而采取如此下策。但对另（下转第 83 页）

我成了“活人展览”的展品

○ 李果河

“文革”时，广西红卫兵和各地群众因为“支持韦国清”还是“打倒韦国清”，出现分歧，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叫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另一派叫“广西革命造反派4·22指挥部”（简称广西“4·22”）。

韦国清是广西区党委书记，“文革”初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

分裂成两大派的群众各执一端，从事“支左”工作的解放军也不一致。野战部队普遍支持“4·22”一派，而广西军区及所属军分区、县人武部则一律支持“联指”；“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开始时也倾向于支持“4·22”一派。这样，两派都各有所恃。开始时，大辩论、大字报，公说公有理，婆有婆有理。后来由大辩论转入互相谩骂、动拳头、打群架，再后来是各占山头，建立据点，采用大刀、长矛、石块、砖头互相攻击，出现了大规模武斗和伤亡现象。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在北京多次接见两派赴京“告状”和谈判的代表，开展批评和调解，要求两派停止武斗。但是都没有用。后来，在江青“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各派都“抢夺”了（有人说是军队暗送）支持本派的解放军的武装，于是真枪实弹的内战开始了。“联指”一派凭借各地军分区、武装部的支持，调动了农村中的民兵武装，围剿和攻打各地区、县“4·22”一派。不久，南宁、柳州、梧州、桂林几个大城市的两派战争也跟着开展，铁路公路交通被迫中断。这场内战，从1967年7月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8月。最后，韦国清得到中央的支持，广西军区便调动部队配合“联指”武装攻打“4·22”，孤立无援的“4·22”一派全军覆没。于是全广西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杀人运动。

据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发行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记载，广西“联指”和解

放军一次在南宁解放路一带，就枪杀1300多名“4·22”俘虏，烧毁了33条大街，财产损失几千万元计。

其实，广西“文革”杀人运动，要从1967年7、8、9月算起，那时，广西各地、县的“联指”武装在围攻“4·22”一派的过程中，就已开始杀人。被杀者多是战俘，也有普通平民。杀人运动的高潮是从1968年3、4月开始的。那年的3、4月间，广西区革筹、韦国清命令各地、县在消灭“4·22”一派之后立即成立“联指”一派掌权的地方“革委会”。然后，在“革委会”的部署下，各地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刮起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十二级台风（有人称其为“杀人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从此各单位、各部门的“联指”一派开始了大规模的抓人、捕人和游斗运动。游斗的过程中，一些暴徒用木棒、扁担、石头、步枪将被游斗的人在会场、在街道上活活打死。一时间，街道上、公路旁和批斗会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一书记载，仅广西宾阳县11天时间就杀死、打死3681人。平均一天屠杀300多人，其中176户全家杀绝。笔者所在的宜山县，有文字记载的，1968年7月14日至16日两三天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就屠杀了300多人。该县一个小小的祥贝乡，一天就杀死35人之多，至于被揪斗的人则更难以计数。

那时我在广西宜山县（今宜州市）一所高级中学任教。我参加了该校“4·22”一派组织。我不是头头，只写过一些批评“联指”一派的文章、作过一两个“形势报告”。但是，大规模抓人、揪人、斗人、杀人高潮到来时，我也难逃劫难。

1968年7月5日，我遭到该校“联指”一派的“东方红兵团”的揪斗。他们把我打趴在地上，逼迫我认罪。而有些罪名让我莫名其妙。我家世代赤贫，他们却逼迫我承认我家是“破落地主”；

强迫我承认回乡期间(我家在农村)煽动农民抗粮抗税,还说我是刘少奇的忠实走狗,向农民鼓吹“三自一包”,更荒唐的是说我在农村组织暗杀队,要暗杀广西著名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冉大姑……”。

我一概否认。不承认就打。一阵折磨之后,宜山县武装部来了两名解放军,要求他们放人,于是当天把我放回。

不久,我被送进本校私设的“劳改队”(有的地方叫“牛棚”)劳动改造。从此被剥夺一切权利和人身自由。

“劳改队”就像地狱。随时都可能被批斗、毒打,甚至被揪到街上游斗,用木棒打死,抛尸街头。那个时节,广西各地到处杀人成风。我所在的宜山县城,几乎每一天都在杀人。一天少则杀几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马路边,经常看见无人收拾的尸体。至于乡下农村,则是“无村不戴孝,处处见血斑”。

我们每天顶着烈日劳动,夜间在“牛棚”里跪着向伟大领袖“请罪”,然后接受红卫兵(“联指”一派)批斗。有些人夜间被红卫兵打得断筋折骨,第二天不能劳动。

九月份的一天早晨,天刚刚蒙蒙亮,传来嘭嘭敲门声,我心中一阵惊慌,立即起床开门。

来者是我们宜山高中“劳改队”队长老金。

老金神秘兮兮地说:“老李,东方红兵团司令部通知,今天不用劳动了。七点钟,准时到学校广场集中,每个人都要把牌子挂上,凡是迟到的,都要砸烂狗头!”

我一阵惶悚,全身酥麻。问:“是去游斗吗?”

老金说:“谁懂?!”临走时悄悄对我说:“老李,要小心呵!”

怎么“小心”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杀要剐,由他!

我挂了牌子,抱定必死之心,按时来到广场。有好几个“牛鬼蛇神”已先来到了。他们通通跪着,都被五花大绑了。一位暴徒在我的腿弯处踢了一脚:“跪下!”

我立即跪下,两名暴徒便冲上来,很快将我也五花大绑了。

我想到今天可能要暴尸街头,便暗暗潸然泪下……

不久,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到齐了。黑压压一大排。

“起立!”一声暴喝。我们便都索索地站立起来。

由两名红卫兵带路,我们跟着徐徐而行。

不是上街,不是去游斗,而是带着我们朝着学校的实验大楼走去。

将近实验大楼时,抬头一看,墙上挂着一条硕大的横幅,上书:“宜山高中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周围尽是花花绿绿的大标语……气势十分的热烈。

我们被带进一间宽阔的实验室。室内贴满了大字报。我们一行18人各人按指定位置跪在用木板搭成的木架上。

半个小时过后,几个手臂上套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也走上木架。他们每人手持一块一米长、五厘米宽、约一厘米厚的楠竹板,凶神恶煞般地站到我们身后。

此时,学校广播喇叭开始播放《东方红》等革命歌曲,不久传来了男广播员的广播声: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也教导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收获很大很大……’,今天,为了展示我们广西,我们宜山高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两年来浴血奋战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特举行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将一批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向广大革命派师生展出,下面……”

接下来是连篇的口号声。

我立即产生一个判断:今天是搞“活人展览”。我们将作为广西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品向群众展出。

在此之前,我曾听人说过,广西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的“联指”一派都搞过大规模的“活人展览”。“联指”一派称其为“禽兽展览”。就是将失败了的“4·22”一派的一些头头、活跃分子以及支持“4·22”一派的“走资派”(领导干部)一个个装进铁笼,向外展出,让广大的革命群众前来参观。据说这种“活人展览”既能展示广西“联指”一派的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又能大长他们革命派的士气。被当作展品展出的,听说还有省一

级的领导干部。继南宁、柳州之后,一些地区、县也依样画葫芦,搞起“活人展览”来。今天,我所在的宜山高级中学“联指”红卫兵也把我们当作“展品”展出了。

“活人展览”古代叫“示众”。但那时针对的只是“个别”囚犯。像当今这样大规模的“活人展览”,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发明?

参观人群陆续到来,“展览”开始了。

展出的“展品”一共是 18 人。有“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4·22”一派成员,另外还有四名“4·22”一派的学生(但其中有一人关在监牢、一名外逃未抓获,此二人暂时缺席),后来我才知道,另外还有两名重病教师虽也列入“展品”,只是因病缺席。“展品”是依“罪行”的大小、原来在校内的职务高低排列的。我被排在第十六位。我的后面是两个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学生。

一阵震天口号过后,“解说员”开始“解说”。程序是:解说员先用竹板朝“展品”的头部猛力一板打下去,发出“叭”的一声脆响。解说员一声暴吼:“×××,抬起你的狗头!”让观众看清“展品”的“反动面目”之后,又是“叭”的一声脆响,“解说员”又吼道:“×××,低下你的狗头!”第二道程序是“解说员”先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才开始解说“展品”所犯的“罪行”。第三道程序是解说员重复开头时的形式,一竹板打下去,叫“展品”抬起“狗头”,然后又一板打去,叫“展品”低下“狗头”,群众中有人带头喊口号。此“展品”的展出告一段落。

我的“解说员”是一位“联指”红卫兵。“解说员”介绍道:“广西‘4·22’黑干将’李果河,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乘文化大革命之机,上蹿下跳,恶毒攻击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联指’一派)……回乡鼓吹刘少奇‘三自一包’,煽动农民抗粮抗税,组织暗杀队,密谋暗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冉大姑……真是罪该万死!……”。

“叭”的一板打来:“李果河,抬起你的狗头!”

我又被迫抬起“狗头”。接着又一个竹板打下来……我的“展览”程序算是圆满结束。

冉大姑是当时全广西最著名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和冉大姑是同乡。这位老人家“文革”之初带人来报名参加当地“4·22”一

派群众组织。宜山县人民武装部知道这件事后,把她找去,有人说是把她软禁在武装部里,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退出“4·22”一派,加入广西“联指”一派。广西两派武斗后她就一直未露面,这么一个 80 多岁的老奶奶,谁个要去暗杀她呢?后来,在 1969 年解放干部时,我获得了“解放”,以上这些“污蔑不实之词”都全部被推倒。

宜山高中的“活人展览”一共搞了七八天,很多外单位的人也来参观了。按原计划要一直搞下去,后来因为“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大约觉得这种做法太过侮辱人格,也给他们“革命派”脸上抹黑,于是命令停止这种作法,我们这些人才能从屈辱的苦境中解脱出来。

1983 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做出了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决定》(简称“处遗”),被冤屈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昭雪,那些“文革”中作恶多端的人大都受到了处罚,我们心底里感激党、感激党中央。只祈求这段丑恶的历史今后不再在中华大地重演!■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人文历史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行政管理专著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①人文历史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社会纪实等;②社会科学类书稿: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历史与年鉴、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③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④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⑤美术类:画册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书法类:毛笔、硬笔、篆刻等;摄影类:旅游、收藏、风光等。

书稿要求: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 6-8 万字以上,多人合集由 2-10 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

出版发行办法: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约稿详情,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咨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 3 号 654 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 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6、57733087、57733088;

传真:010-8950687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高晶、伽悦(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 <http://www.bookhk.net>

详情请浏览网站: <http://www.zuojiaba.com> (中华出版热线)

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 杨德春

(一)

1961年初的北京，在中央直属机关涌动着 一股“万名干部下放”的热潮。此时，我在国家统计局财贸司综合处工作。经我三次主动申请才获 准参与下放。

过了星期天，司里党总支曹书记通知我：明 早，跟韩复光同志去参加动员大会。

次日，我们到了中南海紫光阁。进入大礼堂， 见人满满的。台上也坐齐一排，听说有几位是国 务院副总理。动员报告的内容，只记得：一是有些 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二是下 去工作两年，到时回原单位。我最关心的就是这 两项任务，去夺回失去的政权。时间，六三年回 三里河上班。至今难忘。

动员大会后，国家统计局领导（好像是孙揆 一副局长）召集我们作行前安排。我们到安徽省 （此前一批，传说是去了青海省），具体地县由省 里定。名称是工作组，组长韩复光同志是局保卫 处长、机关党委委员。我们六位成员，各自作了介 绍：徐汾、高峰、牛贵庆是国家计委的，沈菊明和 我是本局的（那时统计局是计委的直属局），董绍 康是外文出版社的。因该社这批只他一人，故编 入我们组。

两三天后，我们就随“大部队”乘火车到了蚌 埠，住入治淮委员会招待所。来迎接的是省委书记 处书记曾庆梅。他向大家介绍了安徽的情况， 留我们过了三天“大饱口福”的生活。各部委来的 工作组就分散开，去各地县。

我们和国家科委的几位，乘敞篷汽车，经过 阜阳行署，到达太和县。此时县委原书记张杰已 撤职，新任书记是陈作霖同志（后调省里、调浙江 工作，直至升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

记。县里又把我们组分到宫集区，国家科委组分 到坟台区。

这年的早春三月，显得特别的阴冷。

一辆胶轮大车，载着我们7人和简单行李， 离开县城朝北然后向东缓缓地行进。路上很少见 到行人。不见一点青色，庄户上连树都看不见一 棵。一路上，向赶车的小伙子打听，这里人们的生 产、生活情况，他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用手中的 鞭子，向大路两边甩动。随着鞭梢望去，一片一片 的，很小很小的黄土堆。我们不惑地问，那是什 么？他仍然一声不吭。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牛贵 庆，像是有了惊奇地发现：“那些是小坟头吗！？” 赶车的这时低下了头，帽子几乎藏到那件用草绳 缠腰的破棉袄里。我们惊呆了，都不言不语。韩组 长紧闭着眼，脸色异常阴沉。大家似乎都在想：在 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

傍晚，到达区委所在地三堂。再往东不远就 是涡阳县境。区委书记郭守运安顿我们休息。夜 里他和韩组长商量，我们分往两处：由徐汾领头， 高峰、牛贵庆一道，去北面八里多的宫集公社；我 们，去南面四里多的赵寺公社。第二天，由两个公 社来的干部领着，向南向北分别在区委会门口。

晌午，我们到了赵寺，住在大队部。这是公社 边上一个两间草顶房，一面矮土墙的小院。院内 土墙边有一棵枣树，枣树下是一丛低矮的石榴。

这天是1961年3月20日。

(二)

按韩组长的安排，我们分头走村访户，座谈 调查。初步了解到，这里因“自然灾害”造成的非 正常死亡人数之多、状况之惨，是无法用语言来 形容的。

最严重的困难，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



《专题报告》影印件

夏。夏收后灾情有所缓解,但眼下的情景仍然是:

“大食堂”早已解散,社员自家起伙,而每人每天只有队里发给的“八大两”山芋干。各家再掺和去秋留下的山芋藤和山芋叶食用。

到许多村庄去家访,见不到成年男子,只有衣衫褴褛的妇女和少数干瘦小孩。

妇女普遍“子宫下垂”。公社卫生所,两年没有新生婴儿的记录。

有的农户的大门,没有门板,似同穴居。

白天很少听到鸡鸣狗叫,夜里老鼠倒是非常猖狂。我们老董的脚趾就被咬过。

由此可以想见,一年前这里是怎样一幅景象!

社员们知道,北京有干部来了。我们所到村户,他们有的拄着棍、有的互相搀着、有的是从屋里爬到门口,探望我们,把我们视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开口问的都是同样一句话:“毛主席他老人家,知不知道俺们这里受大罪啊?”

经过了几天“访贫问苦”,我们无法理解面对的现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哩?!

一天深夜,韩组长摸到我们屋里,把我从用土坯围成的地铺上推醒,轻声说:“起来,到我屋里。”我应声跟去。他坐在一张四根树棍作为框架,用绳索横竖拉起的床沿,我坐在两块迭起的土坯上,窗台沿点着用的小墨水瓶加上个铁皮头的煤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他对着我,不断地叹气。看得出他内心十分痛苦。我俩相对无言,过了

一会他直起身子,问:“小杨,这该怎么办啊?”望着这位敦厚的长者(时年他52岁,我26岁),我不知说什么好。

他说:“这里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的干部,几辈子都是穷人。出身成分,贫农是多数,下中农只有几个。他们背后也查不出有地、富、反、坏、右。是吗?”

我应:“是。”

他说:“这里基层政权的刀把子、印把子,还是我们共产党员掌着的嘛!”

我说:“是。”

他一边分析,一边又说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的回答仍然只有一个字“是”。

兴许他对我言不及义的回答,不很高兴。突然提高了嗓门说:“你是大学生,党培养了你,这是考验你的时候。”

我吃惊得不知所措,几乎向他央求地说:“我年轻,尽管我上南开大学前,在农村在县里工作五六年,但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让我想想,再说还有老董和小沈,大家一起商量商量不好吗?”

他应允了:“那行,好好想想噢!”

回到这边,我在冰冷的秫秸席上翻来覆去折腾,脑子里像放幻灯片似的,想组长、想自己、想明天该怎么接受他说的“考验”。

离京之前听说,这位组长,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在公安部工作。1949年秋,曾参与侦破美蒋特务企图在“开国大典”时,炮轰天安门城楼特大案件的成员。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之类。在我心目中,大凡侠义之客,都是路见不平,两肋插刀,在所不惜的。联想到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对他亦有崇敬之情。

也是在离京之前听说的,这位组长,是河北省深县人。他曾经去老家一趟,回到北京,向组织上反映农村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我自己,在大学里的反右派斗争中,挨过批斗,挖过海河。1958年组织处理时(据说当时打“右派”,上级是分配有指标的,大学生中不能超过百分之八,打多了要“缩水”),我被划定为“中右”,给的是“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个“老右倾”、一个“小中右”,该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呢?想着想着想到我的行李中那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随即翻出来,读着读着,对比大明王朝末期,李自成起义时农民生活的惨景,与这里的现实,不禁潸然泪下。

可能是看见这边屋里的灯光,韩组长又轻轻地摸过来,细声地问:“还没睡呀?”见到我手中的这本书,他迅急地拿过去,“我看看”。

这一宿,我彻夜未眠。他也不会安稳。

第二天,韩组长,把我们叫到他的屋里。他说:“一定得把这里的情况向上反映。”口气之坚定,表情之严肃,容不得有任何异议。出于对他日常的尊敬,也屈于他眼前的威严,三个人都不敢说什么。但我心里想,这样做要冒多大的风险啊!

不服从已不可能,只能看怎么做,才能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具体怎么做,议论得比较多,经过反反复复地斟酌,还是用我们统计工作者的办法:造表登记,如实说明,不加评论。

一、统计对象:想统计全公社,但力不能及。只统计几个生产队,又嫌面窄了些。以赵寺大队为对象,还是符合“随机抽样”原则的,有代表性的。

二、造表统计:分队分户,尽量具体,确保真实。

三、组长负责,我们三人各包一片,各片再由一名公社干部配合,抓紧进行。

前后,经过近20天的调查核实,写出初稿,修改讨论后,定名为专题报告。尔后,韩组长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地审查,于1961年4月9日成稿。封面是另加的一张白纸,请他在中间竖着写上《专题报告》四个大字。

(三)

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1959年冬至1960年夏,因饥饿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极为严重。全大队共死亡1709人,占原有人口的36.3%。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41%。

1960年春,还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全大队29个自然村,有26个村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如润南生产队,7个生产组,组组都有;该队144户,604人,吃过人肉的有37户,144人。严重的韩小寨,全村18户,85人,吃过人肉的有13户,55人,占全村人口的65%。又如解寨生产队,吃过人肉的人约占40%。

记得《专题报告》,就是这样开头的。后面详细地列举了某队某户的实情。有好几页纸。

《专题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上报国家统计局党组并请转党中央。另一份交省委派到县里的整风整社工作队负责人牛永昌同志(时任省交通厅长),请转安徽省委。

上报北京的《专题报告》是韩组长亲自送出的。当时我们听说,过去区邮电所对发往北京的信件,会送交县公安部门审查处理的,故没敢邮寄。

《专题报告》送出之后,我们的心一直是悬着的,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5月13日,国家统计局人事司刘其恒司长,



《专题报告》影印件

乘一辆北京吉普，没有经过省里、县里直接到了赵寺大队。他的“从天而降”，果然是为《专题报告》而来。我们是既惊喜，又恐惧。他和韩组长谈了很长时间，商定由他带着公社干部，亲自到村到户核对。我们都回避。刘司长核对的情况之严重，比《专题报告》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他就径直回京了。刘司长的到来，使我们高兴的是《专题报告》毕竟引起了国家统计局党组的重视，这才如释重负！

此后不久，韩组长从省里开会回来，记得对我说过，在合肥，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找过他。谈了些什么，我没敢问。

7月初（日子记不准），省委整风整社工作队李秉衡同志（后调任宣城县委书记）和陈文全同志，为《专题报告》特地到赵寺大队作过核实。

此后，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社队干部推广“责任田”（社员直白为“分田单干”）。土地划到户之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有月光的夜里，仍有很多人在地里干活。可见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土地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啊！

这年夏季收成不错，社员吃上了白面馒头。

1962年2月，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结束，曾希圣同志被调离，中央派李葆华同志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不久，我们和在官集公社的三位会合，离开三堂，到了县里。在县委整风整社办公室了解到，这个人口不到40万人的县“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4万人。

5月，下放在安徽各地县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在合肥集中，住在巢湖路原省委招待所，约有四五百人。这时李葆华同志已经来到安徽任职。中央决定这批下放干部不回北京，留在安徽工作。对此，大家议论纷纷。中央组织部门派人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当时的安排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让大家发发牢骚，吃好玩好，休整休整。



调查资料影印件

“一切听从党安排”。回北京的只是少数，多数同志留在了安徽。

韩复光同志和沈菊明到省统计局。徐汾、牛贵庆和我，到省供销合作社。董绍康同志回北京。高峰同志回了东北。

对我来说，北京回不去，合肥也不错。组织上照顾将在老家的妻子调来，我得以和妻子、儿女团聚了。

这份《专题报告》转没转呈党中央，我们不得而知，梳理这段过程，问心足矣！

从相关资料来看，8个月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决定延长会期，会后中央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

我想当年的韩组长会十分欣慰的。

“七千人大会时，全国被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封信是促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被安排到安徽组参加会议的，是刘少奇。”

对于安徽的死人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他说：“死了这么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

“安徽是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安徽问题的严重不比河南、山东、甘肃、青海更好一些。特点是什么？别的地方揭盖子早，安徽省不肯揭盖子，到中央来开会还不肯揭盖子。”

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当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安徽其他同志不动，中央还准备调几个同志到安徽去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缙）

陈永贵与记者的恩怨

——兼忆“文革”时期新闻记者在大寨采访的遭遇

○ 金嘉声

陈永贵从大寨创业出名到当上国务院主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被媒体追踪报道长达近20年。他在同记者长期、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深谙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与作用，对记者的采访与报道给予过支持和鼓励。然而“文革”中，却对记者有了戒备，甚至反感和斥责记者，把记者赶出大寨，不准再来采访。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浩劫”期间，被陈永贵以种种“理由”加以指责、训斥，或给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或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不准采访的记者，就有10多人。陈永贵为什么对记者那么反感？

“文革”前，陈永贵对记者心怀感激，非常热情

据报道过大寨的老记者和曾在昔阳县工作过10多年、备受陈永贵器重并担任过大寨接待站站长的刘树岗回忆，创业伊始时的陈永贵对记者的工作很重视，同记者的关系很好，待记者热情周到，亲如家人。记者到大寨采访，他让记者住在他家里，自己还动手拉面、烙饼，以大寨最好的饭菜招待记者。记者采访时，他不仅主动介绍情况、提供材料，同时允许记者在村里到处转、随便看、找人聊。那时他比较虚心，能听进去人们对大寨的看法和建议。谁若给大寨写了稿子，他会挂在嘴边，常常念叨。上世纪50年代，《山西日报》记者李文珊采访大寨后，写了篇《先看统计表，生产步步高，粮食吃不了》的稿子，他得知后不断跟人说，李记者的稿子写得好，写得好！陈永贵还在1964年4月29日的《山西日报》上撰文说：“合作化以来，《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上发表了大寨不少材料，每当报上发表我们大寨一篇材料，就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报纸给我们加了

油，给我们很大的精神力量。”

一篇“内参”报道使陈永贵对记者有了戒心，态度骤变

1964年秋收后，新华社山西分社特派采编主任李玉秀和骨干记者田培植前往采访，在按照原定计划采访的同时，他们从大寨“四清”工作队那里了解到大寨耕地面积不实、粮食产量有虚假等情况。于是，写了一篇“内参”稿，及时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重要情况。

然而“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靠造反起家、夺权，并一举当上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区革委会主任和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后的陈永贵，得知李玉秀发的这篇“内参”稿子，揪住不放，无端指责李玉秀写的“内参”，是向刘少奇“黑司令部”送黑材料，是大寨红旗杆上的虫虫，是妄图砍倒大寨红旗。遂于是年春天，把李玉秀押到大寨批斗了7天。白天强迫他上山修梯田，晚上回村接受贫下中农批判，向毛主席“请罪”，直至李玉秀因精神受到刺激，加之身体虚弱，在劳动时手臂被砸伤吊上绷带后才放他回家。山西分社也因李玉秀写的“内参”稿子，被陈永贵戴上了“反大寨”的帽子。在这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分社依然把报道大寨当作忠于毛主席、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件大事来抓，坚持派记者前往采访，使大寨的报道从未中断。但这一时期分社记者的采访和其他新闻单位到大寨采访的记者，却遭到了陈永贵等人的非议和责难。

“反大寨”——陈永贵制伏记者的杀手锏

1967年11月21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记者到大寨如何工作的问题”讲话说：“来大寨的记者很多，究竟哪个记者反大寨，我也记不清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记者是反大寨的，文化界的很多人也是反大寨的”，“有不少来过和没有来过的记者都反大寨”。然而，后来陈永贵这篇“重要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却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记者是反大寨的”，改成了“很多记者是反大寨的”。此举看似分量轻了许多，但其用心仍十分清楚。

在陈永贵看来，反大寨的记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反大寨的花样也不少。他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旧《山西日报》的走资派反大寨”，“旧《山西日报》的记者也反大寨”，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反，反得很起劲，他们背后捣鬼，还要串联，给大寨散布坏影响，简直搞得乌烟瘴气”，“现在走资派反不起来了，流毒还在反，流毒不肃清，就谈不上和工农有感情。那一小撮走资派的流毒非常深广，全省批得不深不透。新华分社的李玉秀，我们揪来批了7天。现在看来也不深不透，我们还要批判”，“有些记者不光在山西反大寨，在其他地方也反大寨。因为他们有条件到处跑，能向上，也能向下。”

以派性画线 取舍记者

陈永贵以派性为尺子衡量记者，在他看来，去大寨采访的记者大体上有三类，即支持派、中间派和反对派。

所谓支持派，陈永贵认为凡是和他站在一边、支持他造反夺权的记者，都对大寨有感情，都拥护大寨、宣传大寨。这样，过去和他不熟悉的记者很快向他靠拢，原来和他熟悉的记者更加近乎。对这些记者，他很热情，有的还委以重任，如新华社山西分社宋莎荫，曾写过影响深远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与人合作），陈永贵看他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笔杆子硬，就把已经下放到农村的宋莎荫调到昔阳县任县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调研室负责人。从此，陈永贵、大寨和昔阳县的许多重要讲话、报告、总结、文件和报道，都由他起草或经过他修改定稿。后来，宋莎荫又在昔阳入党，被提拔为《山西日报》核心小组成员、副总编辑。

所谓中间派，即在陈永贵看来不大支持他搞派性、不卖劲吹他的记者。对这些记者，他的态度是不热不冷，不远不近。

所谓反对派，即陈永贵认为和他观点不一致、不盲从、不听话、不好用的记者。广大新闻工作者满腔热情宣传大寨和陈永贵艰苦创业的精神，但不支持他的派性，陈永贵就说这些记者对大寨没感情，难对付，进而对他们怀疑、防备。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和陈永贵是老乡，曾参与采写《大寨之路》等重要报道，两人私交甚好。“文革”开始后，陈永贵看他不支持其搞派性活动，便一反常态，怀疑范给李玉秀提供写“内参”的材料，说他“没有交情”、“太不够老乡啦”。后来范银怀去昔阳采访，走到哪里，和谁接触，都受到盯梢。《山西日报》老记者郝占敖，“文革”前，对大寨经验曾作过系统、全面的报道。“文革”中，陈永贵认为他在山西路线斗争中没有站自己这一边，就是不支持大寨，指责他过去把大寨当作“生产典型”宣传，“既然宣传大寨，为什么站在那一边？”遂把他过去报道大寨的功劳一笔勾销。后来，由于工作需要，郝占敖去大寨采访，陈永贵闻讯后说：“他来干啥，叫他回去。”在揭批查运动中，陈永贵又说郝“对大寨红旗没感情，态度不端正，人不人，鬼不鬼，对大寨的稿子横挑鼻子、竖挑眼”。《山西日报》遂把他对郝的这些看法当作主要问题，对郝占敖清查了两年，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才得以彻底解脱。常驻大寨的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云生，一次从太原回昔阳时，顺便搭乘了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王银娥的小车。此事被发现后，昔阳县委便对他起了疑心，说他既然是来宣传大寨的，为什么来昔阳要坐王银娥的车？（“文革”中王银娥和陈永贵观点不同）于是通知电台另派一位常驻大寨的记者，县里对王云生不欢迎，叫他走吧！无奈，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另派了一位记者接替王云生。1977年国庆节前，叶剑英元帅一行赴大寨视察工作，山西分社特派有经验的摄影记者周树铭前往采访，陈永贵一见周树铭，顿生疑心，对大寨的另一位负责人说：“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指周树铭）？他就是在省里核心小组造反，闹着要参加省核心小组会议（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常委会）的人。”此时正在大寨采访的分社记者冯东书见势

不妙,即打电话告诉分社让周回去,另派一位摄影记者来,这才避免了一场风波。该事追溯到10年前,当时,按照中央规定,由于工作需要,分社曾决定周树铭以记者身份列席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却因此被陈永贵说成是“闹着要参加省核心小组会议的人”。

节外生枝 指责记者

1968年秋,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新华社山西分社派笔者和记者刘玉以及总社国内部杨玉良、余富棠四人前往报道。其间,有人得知,刘玉系《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的爱人,便放话称:走资派的老婆来开会、报道,还能宣传好大寨?吴象“文革”初期被当作走资派一度“靠边站”)给满腔热情宣传大寨的记者猛地泼了一盆冷水。

山西分社董荣贵是给大寨和陈永贵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新华社记者,由于摄影对光线条件的特殊要求,一遇阴雨连绵的天气,就会影响照片的效果,甚至延误拍照。而敬业精神强、完成任务心切的董荣贵,不免流露出焦急的心情:“今天天气不好,拍不成了。”陈永贵听说后大为不悦,说:天旱我们盼下雨,照相的想要好晴天;天涝了,我们怕下雨。照相的为拍雨后初晴的照片,又盼下雨,净和我们作对,这哪有大寨贫下中农的感情。

小题大做 责难记者

当时记者到农村采访,为了获取第一手材料,要求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这在广大农村是平常事,然而记者的这一正当要求在大寨却行不通。陈永贵说:“俺大寨不缺劳动力,记者参加劳动,不但帮不了忙,反而会把我们的海绵田给踩硬了。过去,有的记者来劳动,笨手笨脚地干不了多少活,还踩坏了两棵萝卜苗,一个长成了就七八斤重,两个就是十多斤啊!”新华社总社有位摄影记者拍照时一不小心碰坏了一棵树苗,大寨的一位干部不满地说,这是破坏树木,是对大寨的态度问题。

有的记者为急于了解情况,冒险悄悄进到村

里,趁社员吃饭时到饭场看看,陈知道后批评记者说,这些人溜到饭场,探头探脑,鬼鬼祟祟,看谁家饭稠,谁家饭稀,当面不说,背后议论,说大寨人劳动强度大,吃得不好。

翻脸不认 打压记者

《人民日报》常驻大寨的记者段存章,还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时,就常驻大寨、报道大寨。为此,他把家从左权搬到大寨,数年如一日为宣传大寨、宣传陈永贵出了大力,可到后来,却落下个“反大寨”的罪名。原因是,大寨认为段既然是宣传大寨,为什么后来又要去晋东南、去西沟大队采访(那里的劳模李顺达和陈永贵观点不同)。1977年,段和记者颜世贵一起把写好的稿子给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组长宋莎荫看,宋不看。县里同意段参加联合报道组,可开会又不让他参加,还说他写的稿子不是联合报道组规定的题目,大庆代表团访问大寨时也不让段参加采访报道。

欲批记者 张冠李戴

1967年1月,李玉秀在大寨接受批斗时,陈永贵问他,跟你一起写“内参”反大寨的还有谁?稿子是谁让写、谁让发的?慑于压力的李玉秀说,稿子是新华社总社同意写的,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签发的。陈永贵听后如获至宝,认为新华社反大寨的不光是李玉秀,还有方实一伙人,于是又下决心揪斗方实。这年3月,山西分社为加强对大寨的报道,请求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资深记者方堤同志来太原和分社记者一起去大寨采访。行前,分社特地向正在太原开会的陈永贵报告:总社要派方堤同志去大寨。陈一听机会来了,便对分社同志说,我们大寨对方实恨透了,他和李玉秀合伙搞“内参”反大寨,我们非要把他拉到大寨批斗不可。分社同志看他误把方堤当方实,急忙解释说,这次来的是方堤,不是方实,方堤是搞农村报道的,让发内参的是方实。陈执意坚持说:不,不,就是他,就是这个方实。为了澄清事实,分社又让李玉秀和方堤同志到宾馆当着陈永贵三面对证,真相大白后,陈永贵一时语塞,顿

觉难堪，冷场片刻，他把手一甩，说：不是方实，不是就算了，去，去吧！以后我们非要找到这个方实不可！

多个心眼 提防记者

陈永贵十分注意提防记者。1977年12月，他对昔阳县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说：“要学会识别人，（要）多长个心眼，”“对记者要十分注意……记者（是）毛鬼神。你们要有点心眼。他们掂我们的分量，我们掂他们的分量，昔阳一上钩，问题就大了。”同年，大寨公社为向公社一级核算单位过渡做准备，拟召开一个由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一位记者闻讯后向陈永贵提出要求，希望与会听听情况。陈永贵非但不同意，而且还对别人说：“不怕记者来座谈，就怕记者写内参。”这位记者的采访要求因此化为泡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永贵对记者的行踪更加注意，他说，现在昔阳有人告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一伙记者。据大寨的一位社员反映，1979年，陈永贵多次在大寨社员会上流露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不满，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给人打招呼：“给我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听。”于是就有人到外边查看一番。

无中生有 赶走记者

1968年，山西分社记者王文学和总社记者安克仁，按照新华社总社的要求，前往大寨搞摄影报道。王文学因过去给大寨和陈永贵拍照，两人比较熟悉，王这次到大寨后，陈永贵很快就对其采访作了安排。可这天上午，王文学上虎头山给陈永贵拍照时，陈突然问他：“你这次来，是另有任务吧？你是谢振华派来的。”这突如其来的怀疑令王文学莫名其妙，他立即解释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谢振华是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我是新华社记者，是总社让来搞报道的，我怎么会是他派来的？”陈听后仍一口咬定自己说得对，王文学又说：“老陈，你是省革委副主任，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说话要实事求是，我可以拿党籍作保证，确实没有那么回事，我相信事实最后一定会搞清楚的。”那时，谢振华主持

山西省的工作，陈认为他和自己的观点相左，他说王文学是谢振华派来的，意即王文学到大寨不是采访，是给谢振华当特务，为其搜集情报的。于是一怒之下，把王文学赶走，不准他来大寨采访。事后，陈永贵对此仍耿耿于怀，在一次省革委的会议上重提此事。为澄清事实，谢振华后来派专人到分社调查，并让分社出具证明，说明王文学确系遵照新华社总社要求，履行记者职责到大寨采访，才使真相大白。这时，不肯认输的陈永贵一看自己错了，又改变口气说，王文学我俩关系很好，他怎么不给我说实话，他们那里的李玉秀写“内参”整我们，不给我说，太无交情了。

看不顺眼 吓走记者

《山西日报》记者王宪斌，多次采访、报道大寨。一次，他听陈永贵对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同志说三道四，表示不满，便说道：“老陈，东书不在这里，你对他有什么意见，以后当面提好。”哪知此句好言相劝，却使陈永贵勃然大怒，从此，王宪斌再也不好去大寨采访了。《山西青年报》记者刘太乙，一次在大寨井台边见到铁姑娘李圆眼，想和她聊聊铁姑娘队战天斗地的故事，没想到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李圆眼马上向党支部作了汇报，说有个记者要和她交朋友。陈永贵听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让刘太乙离开大寨，不准再来采访。后来，陈永贵还把此事当作“典型”，教育年青人要坚决抵制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心怀不满 再赶记者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山西分社报道大寨不力，很有意见。新华社军管小组的领导一听慌了手脚，立马把陈永贵请到总社征求意见，并让他在大礼堂给总社职工作报告。陈在讲话中大批记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对大寨没有感情，等等，并要求总社直接派记者去大寨。那时陈居高位，总社军管小组惹不起，赶紧根据其“指示”，组成了由总社国内部主力记者张广友牵头，国内部记者杨玉良、摄影部记者安克仁和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金嘉声等参加的大寨报道组。报道组持新华通讯社采访介绍信，于1969年

1月赶赴昔阳,报到后住在县招待所等候陈永贵接见。整整一周过去了,何时能去大寨、见到老陈,领队张广友几乎天天去问,却毫无结果。等到第八天,接见的消息传来,大家心中暗喜,可万没想到陈永贵领着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单独约见张广友,其他几位记者连陈的面也未见到。陈向张广友询问了记者组的人员情况,当他听说记者组有冯东书、金嘉声两名山西分社的记者时,即恼羞成怒,说:“总社的,我们欢迎,分社的,不欢迎,他们不能去大寨,也不能在昔阳采访,请他们立即回去。”陈永贵的逐客令一下,谁也难挡。为了改进工作,冯东书和金嘉声离开昔阳前,专门拜访了昔阳县有关部门,听取他们对记者的意见,并明确表示:大寨,我们还是要宣传的,今后需要时,我们还是要来的。当记者步行5公里到大寨接待站找站长刘树岗征求意见时,他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一阵,才语无伦次地说,对冯东书没有意见,对金嘉声倒是有一点意见。有一次,让他给大寨整个材料,他说没有时间,可给新华社写稿却有时间。

随着情况的变化,几年后,对大寨颇有了解和研究的冯东书再赴大寨。然而,1973年因实事求是报道大寨首次在虎头山上试种水稻成功并获高产的消息,又一次激怒了陈永贵。他认为冯东书好提问题、发议论,不听话,于是冯被告知,以后不要再来大寨,不欢迎他。为活跃报道思想,山西分社经常召开业务会研究报道,有一次,冯东书在会上说:不能提“永远学大寨”这个口号。哪知这句寓意深长的话,竟使冯东书在1977年的山西“清查”运动中再次惨遭厄运。时任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甚至当面问冯东书:“你说过不能永远学大寨,你考虑过吗?为什么说这个话?是不是与不学大寨联系起来。”他还派工作组坐镇山西分社,非要冯东书把问题说清楚后,才能去大寨。陈永贵也发话:“给他(指冯东书)谈谈,以后不叫他来大寨。”在这些政治压力下,冯东书在分社检查了三次才过了关。

设立防线 控制记者

陈永贵把大寨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去那里采访的记者,须先到大寨接待站报到并提交报道计

划,然后住在招待所,等待接待站站长将记者的采访打算禀报给陈永贵或大寨党支部的其他同志来安排采访时间。此前,任何记者不得走村串户,不得找社员谈话,不得参加社员大会。记者要拍大寨党支部开会的照片,须经批准,进入会场拍完后立即走人。给记者哪怕是老记者或有名气的记者介绍情况,都是党支部认定的可靠的人;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情,几乎口径一致。大寨接待站和大寨房子连着房子,可谓咫尺之遥,然而记者却不能逾越一步,只能耐着性子等待,等十天半个月是常事,等一个月也不鲜见。有的记者冒着完不成任务的风险,一气之下打道回府。不少常驻记者感叹:在大寨采访这么多年,在这个几百人的小村子,都认识不了几个人,能叫上名字的都是干部,见面后也只是寒暄几句完事。即使这样,陈永贵还批评记者在大寨“一不过问生产,二不参加劳动,三不关心群众生活”,“记者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没有贫下中农的感情”。

报道农业生产离不开数字,然而,在大寨要弄清这个问题却很困难。一次,一位记者为报道大寨秋季农业丰收,问大寨负责人粮食产量是多少?答:“不知老陈(陈永贵)是怎么定的。”每年打多少粮食,会计最清楚,可当记者问大寨会计时,却回答说:产量还不知党支部怎么定的。就这样,记者写大寨农业丰收的稿子,通篇没有一个数字。有时到第二年,记者还弄不清上一年的产量是多少。连昔阳县的年降雨量是多少,也不能由县气象局做主,最后还得由陈永贵说了算。

组织起来 管住记者

“文革”以来,记者对大寨和昔阳报道那么多,可陈永贵仍不满意。196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有些报道零零碎碎,讲几句话,加上大寨两个字,以后再搞这个让他们走。”后来,他还讲:“你们研究大寨、昔阳的问题,不要从表面上看当时就是那么一回事,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好多经验不是我们没有讲,而是你们没有认识”,“大寨的经验还没有真正总结出来,宣传出去”,“大寨没有大庆报道得好,工业上人家有余秋里、康世恩等几个副总理,农业上就我一个人。没人力量大,现在要好好报,要为第三次全国农

红卫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记

○ 彭 古

我年逾古稀，肩背上的斑斑鞭痕，时常勾起我痛苦的回忆。40年前，那恐怖的1968年，即“文革”第3年，那场噩梦，使我心惊肉跳！我差一点被学生活活打死！

一天，本校红卫兵谢仲光率其兄等三人，突然闯进我的家，不由分说，抓捕我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事后，据知内情者透露，他们已作好部署，半路上要把我掐死弃尸河里。那时，湖南省道县的大屠杀风已刮至我们娄底地区，河里经常浮现尸首，杀人像杀鸡一样简单，一片红色恐怖！为防不测，我的家人一路上护送，使他们不敢下手。

我被关押在村监狱里，和“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关在一起。村里戒严，村头路口，有民兵把守。谢仲光是高二年级学生，我教他语文，和我同村，他家是贫农，我家是地主。在当时“红五类”、“黑五类”阶级对立的社会气氛中，他视我为仇敌，加之因他学习懒散，我曾对他有过劝告和批评，他对我更加怀恨在心。“文革”中挨过老师批评的学

生，借机报复，打老师是常事。谢仲光贴了我不少大字报，批斗过我好几回了，现今又率人抓捕我，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天晚上，谢仲光 and 同班同学彭金连，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在晒谷场上痛打了一顿。用鞭子抽，落手很重。他俩边打边骂，折腾得村里人都知道，可是，没有人来围观，乡亲们都同情我，不支持学生打老师。但那时红卫兵横行一时，谁也不敢来保护我。有人暗地告我，今晚只是杀威棒，大的武斗还在后面，极其恐怖。

灾难果然降临了，会场设在大队部，主席台上贴着“斗争大会”四个粗体黑字。谢仲光和彭金连等人，剥光我的上衣，把我按倒在地。军用皮带的铁头，雨点似的抽在我的头上肩上手臂上，他俩边打边号叫，控诉我的罪恶。贫协主任刘申甫大伯，看不过意了，走上台来，用手臂替我左遮右挡，挨了不少皮鞭。他还不停地对我说：他是老师，不要打了。我用双手死死护住脑袋，鲜血从手臂往下滴。

台下的乡亲们喊起口号来，而且不停地喊，

业学大寨会议做准备，要写好‘大寨红旗’、‘大寨英雄谱’、‘昔阳经验’等，向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于是，他要求县委，要把“在昔阳的新闻单位的记者，不论是中央的还是省地的，都要统一组织起来。统一写稿、统一审稿、统一发稿”。

1977年4月，昔阳县委根据陈永贵的指示和要求，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晋中报》等新闻单位来大寨和昔阳采访的记者召集在一起，宣布正式成立驻大寨联合报道组（此前，大寨的有关报道署名时曾用过这个称谓），以承担大寨和昔阳的全部报道。报道组由宋莎荫任组长，所有成员有事离开大寨和昔阳须向组长请假。报道组须根据大寨和昔阳统一的新闻来源、内容、口径，向国内外报道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所有的

稿子都得经过组长或陈永贵授权的人审定。谁若向报道组提供了有悖于要求的材料，就会被认为“别有用心”、“阶级斗争新动向”。

1978年3月，安徽等地农村率先改变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做法，触动了陈永贵的神经，他提出要联合报道组写文章，对此进行不点名的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安徽农民要求农村改革的潮流，并非一两篇报道所能阻挡得住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寿命仅一年零八个月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由昔阳县委于1978年12月13日宣布解散。■

（原载2008年第7期《新闻业务》研究专辑，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为中国新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 杨继缙）

都是有关“文革”的口号,诸如“打倒刘少奇”“文革万岁”之类。一喊口号,打人者要跟着喊,武斗就暂停。一开打,口号声又起,实际上起着保护的作用。他们俩打累了,厉声高叫“彭小莲上台来打!”台下没有回应,一片沉默。村里在二中上学的有三人,彭小莲,高三女生,不赞成打老师,几次呼喊,她都不予理睬。我感谢这位学生的理智,不加害老师,在那样的场合,是多么的可贵!

这时,台下乡亲中有人小声议论起来:“徒弟打师傅,过河打渡子”,可就是没人敢出头来制止武斗。谢仲光和其兄,全然不顾舆论,百倍地疯狂,扬起早已备好的荆棘把抽打,在我身上划出一道道血口。我疼痛难忍,往桌椅下躲,被他们揪出来摔在地上,继续受刑。乡亲们见状,振臂呼喊口号,不停地呼,接着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来。“文革”开会,唱这支歌就意味着散会。于是武斗终止,我被送进监房,肩背被打得稀烂,俯卧于地,动弹不得。

不久,47军进驻湖南省“支左”,制止武斗和屠杀,取缔群众组织私设的牢房,事态才逐渐平息。我在村牢房的半月“再教育”也告结束。国庆节那天,谢仲光“陪送”我回校。一路上,喇叭里播放着语录歌,我心里在流血!

“老师,我不喜欢语录歌”,谢仲光对我说,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又叫起“老师”来了。我望着他苦笑一声,身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心想你下手太重了!但他还是孩子,看来对我并无刻骨的仇恨,是“文革”狂热在煽动他,毒害他,使他失去了良心。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歌呢?”我问道。

“抒情的”,随即他断断续续哼了几句。他唱的是《马儿呀你慢些走》,当时是属禁唱的黄色歌曲,唱这支歌与当时的氛围很不协调。既然他喜欢,我强忍着鞭痛,轻声地领他哼,纠正了他唱错的几处。两人沉浸在歌曲优美的旋律中,忘却了彼此不应有的仇恨。

“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人在画中闹丰收,万绿丛中有新村,槟榔树下有竹楼……马儿呀你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哼着,哼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优美的画图,祖国美丽的前景,野蛮血腥的一幕似乎没有发生。谢仲光虽说干下了凶恶残暴之事,但

他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可见其良心并没有泯灭,也是个“文革”的受害者。

数年后,我调省城长沙工作,想不到在长沙街头,我与谢仲光邂逅,两人微笑着点点头,擦肩而过,没有交谈。他当兵了,穿着军服。往事如过眼烟云,在他心头肯定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淡忘了。我刻骨铭心,身上的鞭痕似乎还在隐隐作痛!

10年后,我从长沙奔丧回家,在娄底火车站,我与谢仲光再次邂逅。一个中年人走上前来,亲切地叫我老师,和我握手。我已老眼晕花,良久,认不出来。“老师,您忘记了,我叫谢仲光,是您的学生。”啊,我想起起来了。他人到中年发福了,完全不像以前的样子。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他也仔细地端详我,把妻子女儿介绍给我,要女儿叫我爷爷。他转业在广州工作。他成熟了,问我的工作,问我的身体。我避而不谈往事,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了仇恨,此时唯有师生情谊充盈胸怀。

又10年后,我年逾古稀,回乡下老家省亲,路过谢仲光家的老屋,只见一片废墟,房屋被人拆除,宅基地上长满野草,一派破败的景象。乡亲们告诉我,谢仲光去世了,这几年他的父亲哥哥妹妹都相继去世。听后,一丝悲凉袭上心头!谢仲光,只50出头,英年早逝,可惜!真是人生在世,盛衰难料,善恶好自为之呀!

我身上的斑斑鞭痕,是红卫兵运动刻下的印记。红卫兵摧残的何止一个小小的我,有多少达官贵人被冲击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能留下一条小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怎能去责怪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呢,但愿当年的红卫兵都能醒悟,永远记住我们国家民族的那页灾难史!■

(作者为长沙外国语学校教师)

(责任编辑 杨继缙)

更正

《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资中筠先生《失落自我 回归自我》一文中说:“去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有误,应为“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第12期82页最后一行中的《评忠王李自成自述》,“李自成”有误,应为“李秀成”。

政体与大国的兴衰

○ 黄 钟

对于所谓政体,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采用的解释,是指一个国家中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自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经验显示,不行民主,不搞共和,也有可能富国强兵,不过试图用国家富强来替代和阻碍政体向民主共和转变,是一条充满危险的不归路。

政体与大国的衰亡

一、300年来,虽然专制大国寿有长短,但是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都不超过80年。

罗曼诺夫王朝自1613年起统治俄罗斯,至1917年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其间存续了300年之久。法兰西第二帝国自1852年12月宣告成立,到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不到18个年头。奥匈帝国自1867年至1918年,存在了半个世纪。德意志第二帝国自1871年在普法战争的凯歌声中应运而生,到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寿命不足50岁。大日本帝国从1867年大政奉还、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不到80年。而从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45年5月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年。可谓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创下了300年来强国由兴至亡的最快纪录。

苏联与上述国家的政体不同,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强国。当赫鲁晓夫叫喊“我们将埋葬你们”时,可谓踌躇满志。然而,这个强大的国家顶多能让人民和别无选择,却经不起让人民自愿认同和自由选择。1991年12月崩溃降临时,这个1922年12月成立的红色帝国,也只延续了69年时间。即使从十月革命算起,也不到75年。

与这些专制极权国家相反,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迄今为止,王冠已经和平地传承了300余年而不坠。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先驱,虽然不再像维多利亚时代那样辉煌,日不落帝国变成了日不落联邦,但它今天依旧是世界的主要大国之一。曾被苏联视为死敌的美国,自1776年独立以来,已经立国235年,它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

然而,英美的例子,并不表明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就都比专制、极权的国家生命力更旺盛。民主共和政体下,也有短寿之国。法兰西共和国自1871年成立至1940年崩溃,只存在了69年,并且还是被极权的纳粹德国打垮。而共和政体的德意志国,即魏玛共和国的寿命和纳粹德国差不多,起于1919年,殁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过,应该一提的是,吸取了魏玛宪政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创造了让人刮目相看的经济奇迹,而今依然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经济强国之一。这仍然体现了民主共和政体之可取。

二、由于不同政体下的国家都有可能崛起,甚至出现长时段的繁荣,这就使得专制极权政体的缺陷及其可能的致命后果,更难以在“盛世”时为人所注意和重视。

在过去的300年里,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等国,跟他们政体不同的英国、美国一样,都曾是盛极一时的世界强国。像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普法战争结束直到“一战”爆发,甚至还处于长时段的繁荣富强状态。德国人对自己的“特殊道路”很是引以为豪。这是一条什么样子的道路呢?欣赏普鲁士经验的伊藤博文就说:“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决不是自由民权的种子所结之果”。

这些20世纪显赫一时的专制极权大国,在

数十年间无不烟消云散。可是,当威廉二世在 1892 年声称“我们肩负伟任,我要带领你们走向美好的时代”,当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昭和八年(1933 年)说“看啊!看啊!昭和日本的前途上真是光焰万丈”,当赫鲁晓夫扬言要赶超美国并在 1980 年实现共产主义时,信心十足,他们哪会觉得自己国家的政体存在着系统性的、根基性的致命缺陷?

哪怕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 1959 年发出警告说,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产党的尼克松,到了 1980 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可是,尼克松有生之年就看到了苏联解体。

政体与大国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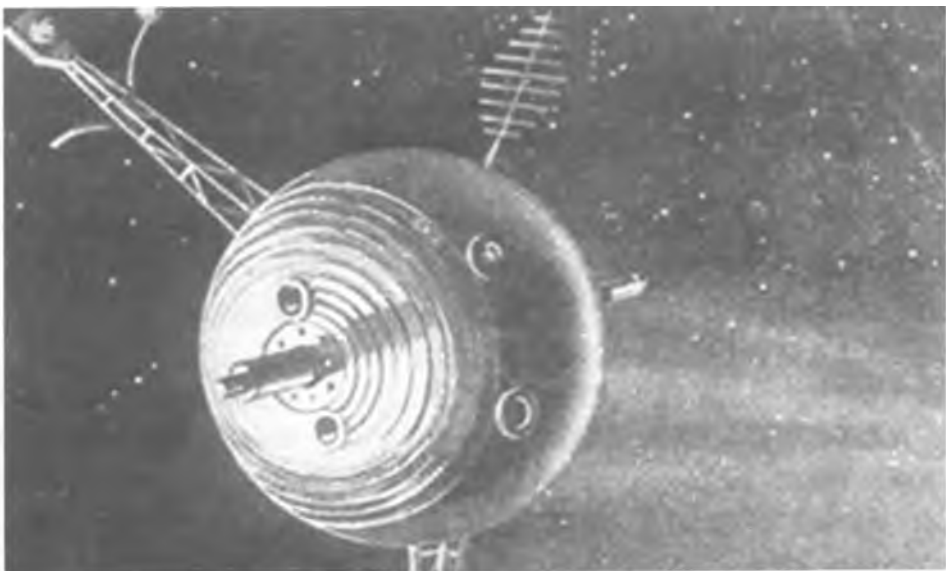
一、自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世界上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才能强国,和坚称民主、共和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 300 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世界上的三大强国。“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虽然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全球的超级大国。

二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政体下都是引人注目的世界强国。



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

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和共产主义时代的苏联,君主专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极权主义的纳粹德国,都曾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强国。尤其是俄国,苏联解体之后,共和制的俄罗斯联邦,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强国之一。

“二战”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经过了民主化改造,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世界就在谈论“德国奇迹”这个话题了。日本从 1952 年到 1973 年,国民生产总值以 10% 的速度迅速增长。迄今为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依然位居世界前列。

格外值得一提的是,在 20 世纪,相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而言,日本在两种不同的政体下,都是一个有着世界影响的大国。德国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联邦德国,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大国。

三是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可能找到未能崛起的案例。

在 1840 年以后的清帝国,许多中国人富强梦的破灭,是与君主专制政体联系在一起的。而对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无论是否巧合,经济萧条,财政崩溃,则是跟一个民主的德国臭肉连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笼罩在东方强邻的阴影之中,它再怎么不忘国耻,其国力也没法盖过全盛之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或纳粹德国,最后崩溃在了纳粹军队的枪炮之下。

二、对世界文明的某些方面,不同政体的大

国,都有可能做出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创造性贡献。说只有民主共和才能造就文化强国,才能滋养出创新型科技强国,跟称只有专制极权才能成就文化强国,才能建成创新型科技强国一样,都是罔顾历史经验的臆说。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要能成为“大国”,总得有些出类拔萃之处。即使像 1868 年之后的日本帝国,虽然在科技和文化方面没有德国那样表现出色,也有诸如池田菊苗从海带里提取出味精、汤川秀树提出介子理论之类泽及世界的贡献。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则堪称创新型的文化强国、科技强国的典范。

在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初,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史家汤浅光朝据 1965 年版《科学和技术编年表》作过统计:从 1851 到 1900 年,意大利、美国、法国、英国的科学成果数分别为 8 项、33 项、75 项、106 项,而德国高达 202 项。在 21 世纪,从 1901 年到 1914 年,总共 42 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里头就有 14 个是德国人。

在文化教育领域,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表现非凡。“一战”前共有 14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德国就有 4 位,位居列国之首。德国教育之发达,则如一位经济史家所说,到 1914 年时,“不仅建立了世界前所未见的一流综合大学体系,而且也建成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技术与商业教育体系”。仅美国去德国留学的人,在 1914 年之前的 100 年里,就有大约一万人。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就说:“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倘若按照赫鲁晓夫的逻辑,德皇威廉二世同样可以摆出前面提到的那些成就断言,美国的共和政体有何优越性可言!?

不仅在建国之初,美国多少有点像法国神父雷纳尔(1713—1796)所说的那样,“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一个在单独一门艺术或单独一门科学中的天才”,而且就是建国百年之后,也还是德意志帝国而非美国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可是在“二战”之后,美国无疑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中心。1943~1977 年,超过 90 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1978~2007

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超过 60% 是美国籍。而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从成立至崩溃,总共只有 8 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仅相当于德国科学家在“二战”后至苏联解体期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

由此可见,用是否文化强国、是否科技强国作标准,推断出某种政体是优或劣的一般性结论,并不合适。

三、崛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体优良。在过去的 300 年里,一些不同政体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具备特定的自然基础和人力基础,崛起不见得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日本帝国自明治天皇 1868 年在诏书里放言“欲开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至甲午战争大胜清帝国,不到 30 年,而从 1868 年到 1905 年在日俄战争中又败俄罗斯,不到 40 年。一位西方史家说:“在仅仅半个世纪内,日本从一个被西方国家斥之为偏僻且有点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国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许多中国人视为强国标志的航空母舰来说,在 1941 年 12 月袭击珍珠港之际,日本现役的航空母舰就已经有 10 艘,比美国还多 3 艘。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也是其兴也速。德国的工业革命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才真正开始,比英国晚了大约 80 年,而“统一大业”也是 1871 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国后来居上,1874 年,工业生产超过法国,1895 年超过英国。纳粹德国的崛起,更可谓是神速。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恐怕不会有人认为德国是欧洲的经济或军事大国,可是在 1941 年,德国却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又在民主制度下崛起,成为经济强国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 年的联邦德国,面积只及中国 1/40,在 1948 年时,人们还在这样预计它的前景:“每个德国人每 5 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 12 年得到一双鞋,每 50 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日本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 1/25,1952 年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只略高于英国或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3。可是到了 1970 年,也就是它们战败 25 周年之际,日本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苏联的崛起也不慢。在1946年,莫洛托夫就对莫斯科人说:“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苏俄从1918年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到1945年攻克柏林,成为二战后与美国比肩而立的军事强国,不到30年的时间。

这些国家虽然政体不同,但都是其兴也速,好像崛起不是什么难事。换言之,崛起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此种政体就一定比彼种政体要优越。因为,这种政体的国家能够快速崛起,别种政体的国家不也能快速崛起吗?

四、政体影响着大国崛起的路径。在专制、极权国家,因为政权压倒民权,政府在国强民弱的格局里,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无视民意甚至不惜代价、不顾人民死活去实施强国战略;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之下,民权重于政权,政府在民强国弱的格局里,没有能力无视民意、不惜代价而一意孤行地谋求强国地位。

在历史上,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的崛起,虽说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说是在民弱国强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苏联最为极端,它能在和平时期采取疯狂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饿民强国政策。法国《费加罗报》就曾这样评价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少吃穿的结果。”

斯大林统治时期,则是极端中的极端。

在1946年,斯大林曾得意地说过,苏联“从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实际上只花了13年多的时间。可苏联是一种什么样的崛起啊?一国崛起万骨枯。在国为刀俎、民为鱼肉的格局下,苏联当局不惜代价地追求国家强大。据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日后的谨慎估计,“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

虽然说任何国家都会面临维护国防安全的问题,但要像苏联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崛起,在民主政体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司法独立、

文官统治军队等等一套机制,使得在苏联被视为暴力机器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在民主政体中难以成为任何个人或党派一逞私欲的便利工具。

就拿常备军来说,英国有着不信任常备军的传统,这种传统又为美国人所继承和发扬。1776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规定,“在和平时期,常备军会危及自由,应避免设置”。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就说:“一支常备军,加上一位膨胀的行政官,绝非公民权利的长期安全伴侣。……整个欧洲,总是以防御为借口,保持常备军,奴役人民。”建国之初,一般美国人最为忌讳的,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除1812年美英战争、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期间外,美国陆军一直处于“国大军小”状态。比如,1789年至1845年间,只有10年,现役陆军兵力上了万人;从1849年到1860年,现役陆军兵力最多的年份,也不到1.8万人;1871年至1897年,美国现役陆军兵力没有哪一年超过3万人。从1899年到1914年,美国只有1900年的陆军现役军人略微超过了10万人。不要说跟俄国比,就是跟德国比,这也只能算是支微型军队。1911年秋,德国陆军有59.5万人;1913年冬,德国陆军的实际兵员为75万人。

在美国这个公民拥有持枪权的国家,1890年人口已达6297万余人,1910年增长到9222万余人。况且,美国国土辽阔,常备军难以成为人民的异己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的政体下,分权制衡原则也体现在军权问题上。美国对军队实行文官统治原则,总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军官任命权由国会和总统共享——“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所有的军事官员”,国会拥有招募军队,提供给养,等等这些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个人或政党都难以把军队培养成自己的家丁、打手,以实现个人或党派的意图。即使需要对内动用常备军,那也是像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个理由可以使用部队,那就是支持法律”。这一切,足以决定美国的强国之路不同于苏联。

五、在过去300年里,没有不曾卷入到战争漩涡的大国,也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

不与他国发生过战争。经验显示,不存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和平崛起。无论何种政体的大国,和平的诺言并非总能履行,和平的愿望不是都能实现。

战争是历史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它从未因政体的变化而长期消弭过。300年来,英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美国、沙俄、纳粹德国、苏联等大国,无不多次参与战争。尤其两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参与其中。这些大国的崛起无一完全是和平崛起。

比如,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普鲁士在7年的时间里进行了3场战争——1864年丹麦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从而确立了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帝国也是在先胜清帝国,再胜俄罗斯之后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苏联继承了沙俄的武力扩张传统。在苏德爆发战事之前,苏联就打过中国,侵略过芬兰,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苏联跟纳粹德国一样,都不是和平崛起的。就是美国,也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确立了世界强国地位。

尽管近代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和平崛起,可是大国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愿,却从来都不是罕见的事情。希特勒就喜欢叫嚷“绝不”如何“永远”怎样。1936年3月7日,希特勒面对600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甚至连柏林的奥运村,都叫“和平村”。而这一切,一点也不妨碍希特勒点燃战火!

即便对于民主政体的国家来说,长期和平也是难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脑的和平诺言或愿望未必就能够实现。在1897年的总统就职演说里,麦金莱还在讲“几乎在每一种意外情况下,和平都比战争可取”,第二年美国就向西班牙宣了战;1916年,威尔逊亲口对选民说他“不希望美国参战”,第二年美国就对德宣了战;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的父母们许诺“你们的孩子们决不会被派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第二年美国就对日宣了战。

换言之,无论政体是什么,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和平问题上使用“绝不”或“永远”一类的词时,是不会怎么被其他国家当真的。没有任何一种政

体能够确保一个国家一定能够做到和平崛起,也没有一个大国能够长期远离或大或小的战争。

很多情形下,由于更加倾向讨好民意,民主政体下的大国,有时会更加倾向于诉诸武力。比如,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军舰去地中海营救被摩洛哥匪徒绑架的帕底凯里斯。与之相反,专制政体下的大国蔑视民意,反而可能更倾向于避免战争。因此,1904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一个专制国家,哪怕被匪徒绑架10个公民,政府可能也不会出兵救援。

不管怎么说,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难免会碰到诸如海外贸易、领土纠纷、侨民权益之类的问题,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免于在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诱惑或压力。有时候,对于一个崛起中的专制大国来说,可能真的不想动武,因为使用武力可能加剧或引发国内危机,但是不惜代价避免武力冲突,却又可能使国际纷争转化为国内矛盾,引起或加重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再说了,对于一个为内忧所困的专制大国来说,一般而言,其统治者在国际事务上哪怕是叫嚷得声嘶力竭,其实更多的是虚张声势,期望借此稳住国内的阵脚。但是这并不表明这种国家就一定不会对外动武。道理还在于,谁能担保他们就一定不会打错算盘,试图通过对外开战来转移国内矛盾呢?

政体与安全国家

一、任何国家都得面对防止外敌侵害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可是在有的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很容易产生不顾一切追求和维持国家强大的念头,即只要能够强国,即使采用专制、极权政体也无所谓。

在这一点上,德国和日本历史上都有着深刻的教训。国家弱小,一旦遭遇强敌确实难以自保。德国作家路德维希曾说,30年战争中的德国,“像个皮球那样被外国势力玩来踢去”。而从1675年到1813年,仅法国入侵日耳曼就不下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

德国历史上这种任人宰割的遭遇,日本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日本国门也是在列强炮舰的压力下打开的,而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威势下一再

丧权辱国又殷鉴不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德日两国易于助长不顾一切追求国家强大的历史和现实土壤。

日本帝国憋足了劲要挤进强国俱乐部。明治初期的10年之中,军费占了全部财政支出的80%。除去修筑炮台、购置军舰等的费用,陆海军的直接军费占国库岁出总额的比率,1878年为16.5%,此后逐年增加,1885年占到了25.5%,1892年则高达41%。即使是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不仅梦想有朝一日日本能够“统治全亚洲”,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道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只要国家强大,德国人同样可以忽视宪政民主之原则问题。俾斯麦上台后,在没有议会批准预算的情况下,居然波澜不惊地统治了4年。议会对这种违宪行为,在1866年奥地利战争胜利后,竟然以230票对7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豁免责任的法案。这个法案通过后,国王还对议会发言人说:“我过去不得不这样做,将来如果历史重演,我仍然不得不这样做。”普鲁士议会,既没有抓住钱袋子,又没有握住刀把子。早在1850年,俾斯麦就说“普鲁士的军队,必须永久是国王的军队”,他不想眼看着“把普鲁士的军队变成议会的军队”。俾斯麦的这个愿望,在一战爆发前就没有落空过。普鲁士德国和日本帝国有个共同点,两国都实行君主立宪,但是在崩溃之前,它们都竭力反对政体朝着虚君共和的方向演变。

德国人对待强国问题的态度,巴枯宁的描述虽然有点尖刻,但也不失其深刻。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巴枯宁认为“德意志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强大的国家”,他这样写道:我们的一位瑞士朋友是这样说的:“现在,任何一个居住在日本、中国和莫斯科的德国裁缝,都感受到德国的舰队和德国的全部力量,这种自豪感使他欢乐得发疯。每个德国人都想活到这一天,他可以象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以自己的国家为靠山,高傲地说:‘我是德国人。’诚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说‘我是英国人’、‘我是美国人’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是自由的人。’而德

国人是说:‘我是奴隶,但是因此我的皇帝比任何国君都更有力量,我是德国兵,这个兵折磨我,也会折磨你们一切人。’”

二、斯大林有个著名的论断:“落后者是要挨打的。”历史的经验却表明,原本足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发达强国,因为政体的缺陷,统治者将国家推向战争后可能难以自拔,从而使国家沦落为一个人民饱经战争灾难的不安全国家。

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挨打”,并非因为他们“落后”。相反,这些国家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军事强国之一。

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在入侵波兰之前,没有哪个大国厉兵秣马要先发制人跟它血战一场,换言之,在侵略波兰之前,德国的国家安全并不缺乏保障。可是希特勒却把德国拖进了一场世界大战。“二战”不仅让650万德国人送了性命,200多万军中男人严重残废,而且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德国满目疮痍之时。

其实,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愿意看到国家落得这般下场。早在1940年,德国人中间就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

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个人全死了。谁得救了?答案是:德国人民。

只要希特勒活着,德国人就没辙。因为希特勒的统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国民无论乐不乐意,都得无条件地接受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领导,除了暗杀、造反和政变之外,德国人民根本就没有和平更换政府首脑的合法程序可资利用。这跟民主国家不同。在民主国家,别说是把国家推进了火坑,哪怕就是像刚领导国家打败了希特勒的丘吉尔,能否继续执政,也得看选民的选票答不答应。

三、一个专制、极权的大国可能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对外而言,不乏国家安全,但是对其国民而言,却是不安全国家,或者说是危险国家,人民生活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没有保障的恐惧状态之中。换言之,它不仅威胁世界,而且更威胁本国人民。

在过去的300年里,大国之中,不乏国家强大之至,人民却渺小之极的事例。纳粹德国、苏联只是其中两例。其沉痛的教训表明,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最残忍的黑社会分子、最嗜血的

匪徒,对一国人民造成的危害,都不可能有专制、极权政府的危害那么大。

纳粹德国的劣迹,国人耳熟能详,姑且略去不谈,只说说苏联的情形。上至苏共中央书记,下至平民百姓,对他们而言,强大的苏联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国家。因为害怕被窃听,戈尔巴乔夫自1978年当上苏共中央书记那天起,和妻子从不在家里谈重要的事情。这还已是后斯大林时代了。

在斯大林时代,当官比生手踩钢丝要危险得多。布尔加宁就说:“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到斯大林的席间,然而你从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里去还是要被车子接走——送到监狱里去!”1935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个人中,在三年里被弄死3个。斯大林称1936年苏联宪法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可是参加制宪的人随后大多没好下场。30名苏联宪法委员会委员中,有16个人在1937~1940年陆续被枪毙,还有2人自杀身亡。在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首届布尔什维克政府的16名成员、国内战争的16位前线司令员、1934年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大部分人都是被斯大林杀死的。

对平民百姓来说,国家之强大,更是意味着政权为恶犯罪的能力之强大。因为强行集体化,仅1933年苏联就饿死了近1200万人。在那个人吃人的时代,苏联人并非没有人起而反抗,仅1930年就发生暴乱3000起,但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可是1934年出笼的第一首以集体农庄为主题的现代歌曲,竟然讴歌“我们没有见过这样好时光”!

粗粗做个对比就会发现,极权国家对人民带来的伤害,比世界大战还要严重。政权之恶的程度,超过了最凶狠的敌国。在“一战”中,俄国死了300万人。在“二战”中,苏军损失了750万人,还有600~800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加起来不到1600万。而一心要灭绝犹太人的希特勒,大略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苏联,从1929年到1953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沃尔科戈诺夫估计就有1950万到2200万。

苏德战争的胜利,苏联维护住了国家安全,

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敢打它,可是苏联国民却继续生活在挨国家打的恐惧之中。1946年,苏联决定发展火箭武器。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个女村民在信中说“我们吃猪饲料,吃橡实”。“已开始浮肿”的穆尔尼洛则在信里说“我不怕蹲监狱,那里好歹能领块面包”。这些诉说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里。在这种状态下,还要求穆尔尼洛们为祖国强大感到自豪,那就像要求小鸡因为主人宰它的刀在全世界最锋利而洋洋得意一样荒唐、霸道。

四、在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驯服权力,防止政府在国内“窝里横”,重于谋求强盛,以求确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至于演变为压制、驯服和盘剥人民的暴力机器。就对内关系而言,只有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国家。

国家强大常常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国家安全的一个理由是保护人民免遭异国的伤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强大的国家实力不仅令异国有所忌惮,而且也让本国人民在权力面前卑微无助、噤若寒蝉,那就等于是说在根本就没有受到外敌入侵的情形下,仅仅因为担心外国入侵这种想象的恐惧,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给奴役了。这样一来,对于人民来说,无论是否国家安全,可能横竖都是处于自由、财产、人身和尊严没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状态。

相对于专制极权政体而言,民主、共和政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驯服政府,驯服权力,保障民权,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于沦丧为祸国殃民的暴力机器。无论国家是弱小还是强大,人民在政权面前都不会变得渺小、无助。也正因为这样,民主共和政体对人民的那种亲和力,是专制极权政体所不可能有的。20世纪30年代末,在就任格兰森市“扶轮社”主席的宴会上,杂货店老板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就曾这样告诉来宾:“我宁愿在英国擦皮鞋,也不愿意成为其他重要国家的大人物,因为我知道,在英国我才能得到宽容和公正的待遇。”

(本文注解79处,详见本刊网站)

(责任编辑 杨继纲)

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

○ 何 伟

一、学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我是 1944 年初参加工作，从农村游击区来的一位不满 18 岁的青年，当时目的是为了抗日，不当亡国奴。对什么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认为参加八路就是共产党。以后行军打仗，没有学习过理论。1951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过本科、马研班的三年研究生学习，亲耳聆听苏联专家讲课，可谓参与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毕业后又留校当教员，给本科、研究生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经典著作选读。1992 年离休，至今——一生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恍然大悟，过去我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竟是斯大林版本，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实践，使我认识到，只有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只有将二者区分开，才能表明失败的是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经过回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使我豁然开朗，只有认清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找出斯大林失败的真正原因，才能悟出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根源。

从历史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受 1917 年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非常憧憬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实现，非常渺茫。再加上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少，1919 年才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8 年才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即便是很少的马克思著作，在白色恐怖下，也

是禁书，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到。后来在敌后游击区，也看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刚解放时，在书店、火车上卖的是苏联出版的中文版《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也没有马克思的著作。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聘请了 99 名苏联专家讲课，教育部让全国各大学派教师到人大进修，复旦大学在派的教师中有蒋学模、苏绍智等人，到北京后出了笑话，他们去新华书店买《马克思主义》一书，书店说没有，可见，即便解放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也非常陌生。

解放后，大学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专家传授的斯大林版本，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变成斯大林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把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凡与此不一致的一律称为修正主义。至于这些理论有没有问题，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样，斯大林的理论就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创建的社会制度就成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斯大林理论笼罩下，凡与其观点不一致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不让看、也不让讲。中国在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不选恩格斯于 1895 年 8 月，为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作的《导言》。此文是恩格斯在逝世前写的一篇长文，也可算是政治遗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与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悖悖，就

被封锁——不入《选集》，不让国人知道。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斯大林的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当斯大林的理论把中国引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时，人们还认为问题不在斯大林的理论，而在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因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理论表明，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错，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还要回到斯大林的模式。（中国《宪法》第6条，就是这样的逻辑）；另一方面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行改革，就不会被人指责为修正主义。

在传统意识形态统治下，对斯大林的评价只能“三七”开，不能越过雷池一步。斯大林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虽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但他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自由人联合体。他有许多理论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有的自相矛盾，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全民所有制就是一个非科学概念，它排斥了马克思所讲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其内涵和外延谁也说不清，我国《宪法》第7条，不得不把它定位为“国有经济”。他的公有制理论导致我国：两种公有体制化、二元结构制度化、二等公民政策化，城乡不平等、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夺农业，把农民害苦了，使“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了。他一方面否认价值规律有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又承认价值规律有调节作用。他说如果棉花定价太低，“那我们就会使棉农破产，就会没有棉花”，是自相矛盾。（《斯大林文集》1980年版，第554页）他把主观上的计划说成是客观规律，集中力量搞军工、航天，“有计划地”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平衡，使民用生活品匮乏。他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特征，是一个伪命题。首先，这三者只是从表面上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并非本质不同；其次，三大特征是斯大林选择达到社会主义目的一种手段，不是社会主义本质。最后，手段可选择，本质是不能变，如果将手段当作本质，就本末倒置。在政治思想上高度控制，实行独裁统治。斯大林创建的这一社会制度，由于实行政治、经济、思想高度垄断，人民不能制约共产党，党的组织不能制约党的领袖，使这一社会制度经过70多年走向灭亡。

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内容都是后人把斯大林的理论进行归纳，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的是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并没有对科学社会主义下定义。对未来社会基本制度经典作家也没有设想。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页，第628～629页）他又说：“我们对于未来社会制度，‘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说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同上，第4卷，第676页）类似这种观点，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在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里，完全没有这些论述。

斯大林的理论在我国影响可谓根深蒂固，目前大学政治理论课，甚至中学的政治课本，还在灌输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理论上的是非，有些人还是以斯大林的理论来进行判断，在一些工作上还用斯大林的理论做指导，可见积弊之深。

中国共产党与斯大林的关系可谓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成立的，是远东的一个支部。其关系：第三国际对中共是“家长制”领导，联共（布）对中共是“父子党”关系（毛泽东语）。派来顾问大权在握，重大的问题要由斯大林决定。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有了军队和政权，按照苏联的建制，把军队叫做红军，把政权叫做苏维埃，王明曾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布尔塞维克化”。到了抗战后期，有人写信还用“此致‘布礼’”。当时不解其意，后来才悟到，是致“布尔塞维克”之礼。解放后“一边倒”，以苏为师，国内“全盘苏化”连男人穿的服装都叫“列宁服”、女人穿的连衣裙叫“布拉吉”。丢弃新民主主义，将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引进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听从斯大林的指挥棒。为了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毛泽东号召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边读边议,笔记就有三大本。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也想突破斯大林的模式,建立人民公社,搞文化大革命。但因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公社是以斯大林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理论依据,文化大革命是借助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仍然没有跳出斯大林这一如来佛的手心。

二、重新认识早期、晚期马克思主义

在斯大林理论主导下,所传授的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论述的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之路,但不知对这条道路,马克思曾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警世名言:“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见《全集》19卷,430页)在《宣言》时隔8年的两个《序言》中,他们一再谆谆告诫人们,西欧以外的国家不要走西欧之路。可是斯大林把这条路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之路,其他之路则一律称为修正主义。

当看到马、恩选集中不准入选的恩格斯《导言》后,才知道我们学习的斯大林版本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早已放弃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更不知道还有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实方面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95页)为什么会出这些错,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同上,第597页)在蒸汽机基础上的生产力社会化水平不高,对工人剥削残酷,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阶级斗争尖锐,“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队伍”还没有形成,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299页)在当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

源泉更是不可思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2页)这是恩格斯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过了近半个多世纪,产生晚期马克思主义。电气化引起了资本主义一次经济革命,恩格斯指出:“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页)电气化的出现,使生产力社会化空前发展,阶级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恩格斯说:“这时工人阶级已经‘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同上,第598页)“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遍布全欧洲”,使欧洲的普选如火如荼展开。恩格斯于1895年1月16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说:“今天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可能面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选举。而在意大利是最严重的危机,奥地利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举改革。”过了3天,即1月19日他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们的五十个法国社会主义者议员是走运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推翻了三届内阁和一位总统。”(同上,第608页)德国社会党所得选票在当时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它的选票增长,“是自然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不可抑制的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的发生,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页)“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同上,第603页)他又说:“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更夫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可恶的工人方面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计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同上,第601页)他还明确指出:德国工人“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

选权。”(同上,601页)德国党“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同上,第602页)他感慨地说:“我们采取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同上,第610页)

另一方面恩格斯又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军队的变化、阶级力量对比等,他得出结论:“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由此放弃暴力革命,并劝诫人们不要上诱惑武装起义人的当,应利用宪政,采取议会斗争,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在电气化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是晚期马克思主义,使党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放弃暴力革命,利用宪政,合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继马克思提出用股份制的“私人资本自行扬弃”,代替“消灭私有制”之后,恩格斯又提出无产阶级通过普选掌握国家政权。一个属于经济基础,一个属于上层建筑,二者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图。可见恩格斯对后期马克思主义论证的多么充分对,而在斯大林版本里不仅没有,还作为批判对象。

三、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

我们受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影响,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衰朽力量的强烈的反抗。”因而不会出现“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斯大林选集》下,第543、542页)斯大林这个观点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错误的:一是漠视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二是为暴力革命提供理论依据;三是政权是万能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股份制的出现,使“私人资本自行扬弃”。所有这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开辟的道路。

以斯大林阶级斗争学说看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前途非常渺茫,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世界,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涌现,前途非常光明。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一些新社会的经济萌芽正在茁壮成长,如王震指出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已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北欧一些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全面覆盖,都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照样发挥作用,是任何社会力量是阻止不了的。

信息时代的到来,促进全球一体化,已显示走向世界大同的曙光。

第一,信息化的发展,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使人类适应自然界的能力大大加强。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大增加,人们进入全面自由发展的时代。

第二,信息化促进全球一体化。它打破了国界、洲界、民族的分割,使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信息一体化、技术一体化、语言一体化,逐步走向世界大同。

第三,信息化促进股份制大发展,使企业社会化。股份制的基本特征,使私人企业社会化,促进了“社会所有制”的发展。

第四,知识经济时代所提供的巨量社会财富,可初步实行按需分配。目前北欧一些国家所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福利覆盖,就是一种按人们生理、生活需要的分配。因为依据科学的要求,人们所需生活物资是有限的,容易实现按需分配。当社会所有的人,一生都有了社会保障,无后顾之忧时,就可排除人们对财产占有的贪婪欲望。

第五,信息化的发展,引起人类质的变化。信息化不仅对客体发挥作用,还对主体发挥作用,使人脑发生质变,人们要适应信息化的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还促使国有“资本自行扬弃”实行股份制。撒切尔夫人对国企改革不是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不是私有化,而是股份化,因股份制优于国有制。撒切尔夫人这一改革,使英国股民从300万增长到1000万。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是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人们生活水平虽有差距但普遍提高;二是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大大缩减,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覆盖,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四是这些富人看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不分贫富,拥有亿万财富也在劫难逃。在这种形势下,亿万富翁留给自己子女的不是财产,而是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财富,出现了公益事业的价值观。

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孕育新社会因素,他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马克思选集》第3卷1995年第2版,第60页)可是斯大林完全违背了马克思这一预见:一是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任何社会主义经济萌芽;二是不去解放这些新社会因素,使其发扬光大,而强制推行自己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斯大林的唯意志论代替唯物论,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过,马克思因受历史的局限性,他没有看到在信息化时代,新社会因素的出现不同于他的预见:一是它们不是在资产阶级“正在崩溃”时,而是在正常生存情况之下出现的;二是目前社会主义因素已不

是“孕育”,而是已经“生产”;三是目前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是靠工人阶级去“解放”,而是“自然生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丰富和发展。当然,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成长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过长期量变才会出现质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要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作用,协调阶级斗争学说,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早日实现恩格斯引用摩尔根的话:“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72年版,第175页)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些新社会因素,表明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主义社会。在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里,看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

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灵活、务实、与时俱进、丰富多彩、博大深邃的宝库,不像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单调、机械、死板、停滞、色厉内荏、一言堂的说教。这也算是我这一代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回忆和反思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缙)

(上接第57页)一种说法即是赵尚志所说的发现“三团要投日本人”,同样感到不可理解。赵尚志怎么会一见面就会有如此重大发现?赵尚志为什么不把此事告诉给李延禄?四军军部离此也不远啊!今天看来,李范五当时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我们今人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三)

这一事件的后果,李延禄回忆录中讲了,如《世纪桥》中的文章所说:由于赵部只对同驻一村的三团团部与一、二营300名抗日战士缴械,只打死团长苏衍仁,三团团部的其他人员还活着,有机会报复。三团副官、苏衍仁的亲信朱善打死了赵部三团政委张一武等人,携枪逃走。未被缴械的三营200人呢?不会为苏衍仁报仇、忍受一、二营战友被缴械之痛之辱吗?显然是李延禄做了劝说工作,他们才没有动武,没有造成两军火并内讧大祸。但三营还是在王营长带领下退出四

军、退出抗日武装,在亚布力(今尚志市东部)插枪为农了。李范五回忆录对此作了记载:“四军三团被三军缴了三百人武装,剩余的二百人带着武器拉走了”。事件发生,四军的根据地及当地的民众抗日组织,一些“外白内红”的抗日骨干暴露了,日伪军乘机进剿。李延禄四军半年的苦战成果——下江地区红地盘遭到破坏,一些抗日骨干遭到逮捕、杀害。李范五在回忆录中十分沉痛地说:“一支能征善战、战斗力很强的抗日武装自行消灭了。”对四军、对抗日事业来说,这是一大损失。但这一事件造成的后果远不止于此。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讲到:“更为严重的是对其他抗日山林队造成很坏的影响。一个时期,不用说各山林队提起赵部‘谈虎色变’,敬而远之,就是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也认为赵部手黑。”一些想加入三军、四军的民众武装退缩了,有的不敢与三军、四军接近了。抗日统一战线受到影响、破坏。■

(责任编辑 杨继缙)

长征路上的松潘战役

○ 夏宇立

四川松潘,扼控川甘边的战略要地。松潘古称松州,唐贞观年间,大唐和吐蕃在此激战,最终促成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民族联姻。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也在这里与堵截的国民党军发生了一场大血战。这场作战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是长征期间不多见的大规模、长时间的血战,又是最恶劣环境中的一场超极限恶战,双方伤亡巨大,国民党军损失上万,红军也有数千人阵亡,但最终战役失利;另一方面,它遭长期尘封,官方史书要么回避其事实,要么扭曲其面目,又使这段悲壮的战斗历史迷雾重重。

松潘战役的背景和过程

1935年3月下旬,为了策应和迎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原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进入嘉陵江以西的嘉陵江、涪江流域,解放县城九座。4月底发起土门战役,通过北川河谷西进岷江流域。5月下旬,进入茂县、汶川、理番(今理县)等地的红四方面军,一面迅速派出部队南下前往雅安大渡河方向迎接中央红军,一面在北川、茂县、汶川等地防御川军攻势,同时继续北向松潘胡宗南部进击。

6月8日,红30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的南下迎接部队占领懋功(今小金)。12日,其先头部队于达维以南夹金山下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得到两军胜利会师喜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报告当面敌情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位置,提出当前任务请中央决定,表示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1页)

16日,即将翻越夹金山的中共中央和中革

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首次提出川陕甘方针,“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8页)

这时,红四方面军一部正在与松潘及附近的胡宗南部激战,徐向前、陈昌浩不断从岷江两岸开辟战场,投入更多兵力,同时,也急切盼望战役总方针尽快下达。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川陕甘方针。中革军委于28日作出了松潘战役部署,规定一、四方面军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左路军共16个团,由林彪率领,“经卓克基、壤口(或大藏寺)、噶曲河、色既坝,向两河口前进”;中路由10个团组成,由徐向前率领,“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坪,向黄胜关前进”;右路由12个团组成,由陈昌浩率领,“主力经黑水、芦花,支队(4个团)经小姓沟,均向松潘城前进”。另由8个团,组成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其中4个团于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南向。由4个团组成懋功支队,由何畏率领,掩护北进作战和巩固后方。(《红军长征·文献》第539~540页)

29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松潘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随即分路北上。当日,率红一军团进至马塘的林彪致电军委,报告前方路况“大概系草地,且路太远”,而“黑水、芦花、毛儿盖居民甚多,距松潘二百里,由该处可直攻松潘”。林彪表示:明日“向黑水、芦花前进”。(《红军长征·文献》第544页)林彪的意见,获得了军委的批准。

四方面军向黑水、芦花(芦花为黑水县城所在地)进军途中,遭遇到了严重障碍。黑水河两

岸,高山峡谷,崎岖难行,前方又被胡宗南部和藏族反动上层武装所控占的石碛楼、瓦布梁子据点所阻,打开通道的激战在持续进行。

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分别率红四方面军部队,从理番、茂县和平夷堡地区出发,向松潘前进。8日,经过历时半个月激战,敌据点石碛楼、瓦布梁子终于攻克。当日12时,张国焘致电朱德、周恩来:“石碛楼、瓦布梁子都已打开”,“已令沿江部队速取此捷路北上,靠近八十八师、一军团行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3页)

10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毛儿盖,围攻敌胡宗南部李日基营。14日,李先念率领红30军第267、268团,与左权率领的红一军团第4团在哈龙、小羊角塘地区与来援之敌胡宗南部5个团激战,红军哈龙阵地失守。16日夜,李先念指挥红30军第265团等部夜袭哈龙之敌,敌狼狈逃窜,红军再占哈龙。当日,毛儿盖守敌大部被歼。

18日,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红军长征·文献》第585页)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重新调整了进攻松潘的兵力部署。

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决定取消红一方面军军团番号,统一改称军。同时,重新决定了松潘战役兵力区分及部署:一、以4军之4个团组成右支队,许世友为司令,王建安为政委。二、以1军之第1、2师,30军之第88、89师,共12个团组成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三、以31军之4个团,4军第11师、9军第25师各2个团,共8个团组成第二纵队,王树声为司令员兼政委。四、以3军之4个团,30军之第90师2个团,4军之3个团,共9个团组成第三纵队(后续策应兵团),彭德怀为司令员,杨尚昆为政委。五、以9军之5个团,5军、32军及30军262团,共9个团组成第四纵队(向阿坝前进左支队),司令员倪志亮,副司令员董振堂,政委周纯全。六、以31军第91师之3个团及第33军,共6个团组成第五纵队(侧

后箝制掩护部队),詹才芳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长征·文献》第590~591页)

24日,前敌指挥部到达毛儿盖,立即指挥“以多路突击的办法攻打松潘”。第一纵队的四方面军部队第88、89师在李先念率领下猛攻松潘外围。许世友右支队打得最好,不仅打通了小姓沟、红土坡与哈龙的联系,同时,从西南方向猛攻,夺取了松潘西面重要据点牦牛沟,进逼胡宗南松潘城外西南山头防守阵地。“但是,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胡敌兵力众多,凭碉固守,我军火力不行,不论正面突击或是迂回攻击,均难奏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36页)

这时,红军许多部队已断粮,特别是王树声第二纵队,该部本是进攻松潘的主力之一,它集中了四方面军3个军的精锐,但是,由于原在岷江以东长期激战,其中第11师两个团和31军一部,刚从北川、安县交界的千佛山等阵地撤出,那边后方已无粮供给,每人只带两三天的干粮,过江后又少有粮食补充,在前进至毛儿盖路上,粮食已吃尽,不少人饿死在进军路途。

2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粮太困难,主要二纵队无粮,不能跟一纵并进”。(《红军长征·文献》第594页)31日,“朱、张”致电前线首长:“因缺粮及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灭敌,现正计划改变部署”。(《红军长征·文献》第595页)接着,中央和军委决定改为实施《夏洮战役计划》,标志着松潘战役告一段落。

这就是松潘战役的背景和大致过程。

松潘战役的错误说法应该纠正

关于松潘战役失利原因,这样一个说法几乎已成“定论”7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至芦花地区”时,“胡宗南部还未完成集结”,但张国焘“却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7月18日,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而此时,“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也正向胡宗南部靠拢。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

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页

这一说法与历史严重不符。不过，只要摆出相关的两个时间，它就会不攻自破。

第一，胡宗南部何时到达松潘？真是7月18日后“完成集结”的吗？胡宗南部到达松潘并开始布防的时间是5月下旬，胡宗南本人到达松潘，并在松潘及其附近完善防御体系增加后备兵力是6月下旬，这既是历史事实，又有敌我双方大量的历史文电作证。6月21日，蒋介石给胡宗南手令有言：“宗南吾弟勋鉴：近日想已到达松潘”。（《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585页）6月12日，张国焘致中央电：“松潘胡宗南部约十二团，正与我在镇江关激战”。（《红军长征·文献》第485页）同日，徐向前代笔的“张、徐、陈”向中央的报告，更为具体详尽地介绍了胡部在松潘的部署。（《红军长征·文献》第486页）6月19日，张国焘、徐向前致中央电中，又一次详细地介绍了胡敌在松潘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2页）更为重要的是，6月29日中革军委《松潘战役计划》中也清楚地指明了松潘敌情。（《红军长征·文献》第546页）尤其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从5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在松潘城及其周围与胡敌长期激战，怎么能说“胡宗南部还未完成集结”呢？不错，进入7月下旬后，胡宗南根据战况变化，将松潘部署作了一些调整，兵力向松潘城厢收缩，但是，这与“完成集结”是一个概念吗？

第二，红四方面军主力何时开始北上行动的？真是7月18日前“按兵不动”，18日张国焘当上了红军总政委后，“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吗？事实是绝妙的回答。6月29日松潘战役命令发布时，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全部，第9军大部，第4、31、33军各一部已经进入岷江以西，并立即遵军委命令向北推进，其中第30军主力即是最早进至毛儿盖的先锋部队之一；另有第4、31、33军大部，第9军一部还在岷江以东，阻击近20万川军，并沿岷江向北松潘方向攻击。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东岸部队要过岷江以西北上，只有三条路：一是从松平沟向小姓沟，但中间先有叠溪海子阻隔，找船只困难，前面还有岩窝寨地震塌方区，极为难行，一天过不了

一个团，并且前方战场地域狭窄，摆不下主力。二是绕道经理番、马塘，这条路要远出六七百里。三是溯黑水河西进，这条路近，但前面被石碉楼和瓦布梁子等地敌据点所阻扼。早在6月下旬，四方面军为打通此路即已投入重兵，7月8日，敌据点终于被攻克。攻克据点两天前的7月6日，在岷江以西理番的徐向前和在岷江以东茂县的陈昌浩、平夷堡的王树声，分头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出发。（《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459页）为什么7月6日才出动？除了因上述前进黑水、芦花的道路尚未打开原因外，也有岷江东不可早收的原因。两河口会议后，松潘战役各路部队分拨已定，可是，不出两天，军委采纳林彪意见，放弃左路和中路行进路线，命令三路人马全挤向右路黑水、芦花，西面马塘至壤口以西没有控制，前头部队还未进入毛儿盖，岷江以西地域狭小，徐、陈认为“现我左翼马塘方面部队未运动好，东方似不便大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0页）徐、陈的考虑和处置是正确的。试想，如果正在岷江东岸艰苦阻击近20万川军猛攻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立即撤收，川军大军从背后压来，会是一种什么状况？至7月12日，岷江东岸部队十七八个团除留2个团于东岸攻击松潘阵地外，其余都渡过了岷江北进。为什么12日才渡过？因为东岸部队离渡口一般二三百里，有的还更远。从出动到渡江点需要几天时间。这里也有陈昌浩7月14日向军委的详细报告电：“岷东大部十二号晚渡河推进，小部尽力支持靖夷”。此电中，陈昌浩还十分详尽地报告了各团进至岷江以西地点、指挥关系、联络方式、下一步行动等等。（《红军长征·文献》第580~581页）这些都表明，所谓“按兵不动”的说法绝非事实。并且，就在《红军长征·文献》中，还可以找出很多令这一说法站不住脚的材料。《红军长征·文献》的编者和这一说法的作者本属一个单位，应该说这些材料都看过，可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偏偏要这样说呢？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松潘战役“不能实现”，是因为“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页。）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事实

是,红四方面军(包括张国焘)并不害怕胡宗南,恰恰相反,比较起来,还更喜欢与胡宗南交战。这是因为,第一,胡部战斗力强,与强敌作战,更能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当时红军高度提倡它;第二,胡部武器装备好,弹药多,跟它打,自己的装备立刻就能改善,这是精神物质双丰收。所以四方面军各部队都抢着上,这就是当时的客观情况。而胡宗南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对手,从1932年起,一直不离左右,敌我长期交锋,结果是红四方面军胜多败少。



矗立在古城松潘附近高山上的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将永远伴随着松潘战役中倒下的数千英灵。

红四方面军不惧怕同胡宗南部作战,并且,就在松潘及其周围与它进行了长时间的大规模血战。从5月中旬起,红4军第10、12师,红9军第25师主力,红30军第90师,红31军第93师,红33军第98师等,都紧咬着胡部激战,并一直没有离开血战的战场,其中第10、12师与胡部血战了两个多月,从茂县城外一直打到松潘城下,在松潘城下两进两出。后来松潘战役发起后,红四方面军投入的部队更多。时任胡宗南师部军需员的石德安目睹了松潘之战,他回忆说:“胡部各线不支,向松潘溃退,曾在松潘南的白塔山发生两日夜的激烈争夺战。胡宗南在危急中,组织了人数约为一个营的敢死队,以第四团副团长徐保为队长,才稳住了白塔山战斗。松潘四面皆山,白塔山最为险峻,此山一失,松潘即不能守,因此胡军以死争之。”“当时的情况极为紧张,尤其较场坝、毛牛沟丁德隆旅失利后,松潘最为危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册,第406页)。正是红四方面军的无比英勇顽强,以至连对手国民党军都不得不赞叹红军处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还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623页)红军的英勇顽强和它的强大的战斗力,又是以它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换来的。红12师副师长项志平、红30团团长丁先华、红36团团长李香恒和红294团团长余立贵等,都牺牲在松潘战役中。松潘战役极为激烈残酷,红军有多大伤亡,至今没有发现统计数字,一些参战的老红军告诉我,估计牺牲的有四五千,笔者从多方搜索,认为这一数字可信。这么多的红军战士在松潘前线,为争

取中共党和红军的光明前途挺身而出,与胡部血战捐躯,然而,在官方的红军军史上却并没有这场大血战的记载。不仅如此,在中共严肃的党史上,竟然出现如此“害怕说”,实恐怕地下英烈灵魂难安。笔者有幸访问了许多松潘战役的亲历者,他们在追述历史怀念战友时,也对党史、军史上这一错误说法强烈不满。

松潘战役失利原因何在

松潘战役失利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其实,当年战役的指挥者心里都明白,并已经形成了共识,而混淆颠倒则是鼓吹“路线斗争”、“斗争哲学”以后。松潘战役终止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新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里即清楚明白地写道:“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页)这里,除了由于仍在战场,敌方胡宗南兵力优势之原因不便道出外,其他主要原因已经回答得再清楚不过了。下面笔者试图系统而简略地做一梳理。

第一,兵力及作战条件上红军处于明显劣势。驻守松潘及其附近地域的胡宗南第一师,以及受其指挥的3个师2个旅,共28个团约6万兵力,对比会合后的一、四方面军总兵力来说,不占优势。但是,红军除了对付胡宗南,还得分兵抵御近20万川军,以及藏族反动上层武装,因而必然处于劣势。胡宗南部素称国民党军的“最精锐”,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它员额充足,装备

最好,火力最强,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一个营另有一个重机枪连,各种火炮齐备,还有空军支援,各级军官几乎全是黄埔生,部队训练有素。胡宗南又早于红军占领松潘,得先机之利。松潘为一座古城,城池坚固,坐落于岷江岸边,四面高山耸峙,周围深山峡谷,河流纵列。胡宗南充分利用险要地形,遍筑坚固工事。红军虽以野战、运动战见长,但夺松潘打攻坚战,既无火炮又无炸药,要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显然很困难。另外,红军的粮食问题严重,比胡宗南困难得多。为了保证防守松潘部队的粮草供给,国民党方面专门组织了一支人数达五万余众的所谓“铁肩队”,专门从江油、平武等地向松潘运送。此外,胡宗南还从原驻地甘肃天水开辟了一条“松(潘)甘(肃)古道”运输线,又在漳腊修建了飞机场实行空运。因而,胡宗南的军粮即便不宽裕,也基本能保障。而红军则相反,只能就地筹集,强忍饥饿,并很快断粮,以致不得不终止松潘战役。

第二,战役预想和计划存有重大缺陷。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了北上战略方针,然而,关于松潘战役,思路并不清晰。比如,周恩来报告说松潘战役,“只有采用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87页)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60~461页)

不难看出,不论是周恩来“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还是毛泽东“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虽然有激情,但没有过硬的“棋子”,也太过理想化和简单化,实际上存有盲目轻敌情绪。这种情绪下诞生的战役预想和计划,怎么能不出现缺陷?缺陷表现在哪里呢?第一,没有预计到进军途中,川军的攻势和藏族反动武装的威胁。第二,没有预计到地形路况对进军的影响和战场环境对作战的制约。第

三,没有预计到严重的粮食困难。其实,发生这些问题,只要预想和计划周密,不是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中央领导人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也没有以更为宽容的心态接受合理性意见。论说,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先到此地,并且,红四方面军在进入之前,先期派出了多路人员前往侦察地形道路,调查社情民情,搜集各类情报,已有重大收获。所以,从情况的熟悉程度来说,先来的肯定要强过后来的。张国焘后来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成了中共的叛徒,犯下了罪恶,但是,这时还没有,他虽对军事不很内行,可他也有点特长,有一定经济头脑,也特别注重粮草和军事行动的关系。这方面,他的确考虑不少,也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建议,其中有的不尽合理,有的合理,比如,他先后提出四方面军在前面打,一方面军在后占领大金川和阿坝休息,作预备队,就有合理的成分,但并没有引起重视。计划有缺陷,必然会出现问题。就粮食来说,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军委那里始终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王树声第二纵队还未进入毛儿盖即断粮了,饿死了那么多人;而已经进至哈龙前线的林彪第一纵队也发生了缺粮问题,林彪被迫率领其中红1军离开战场转回小黑水流域筹粮,就是证明。

第三,战役部署和指挥发生严重紊乱。由于战役计划和决策存有缺陷,其部署也必然谈不上周密。松潘战役部署下达的当天,左路林彪来电,“判断”前方“大概系草地”,表示左路明日“向黑水、芦花前进”,走右路路线。(《红军长征·文献》第544页)其实林彪的判断并不准确,一个月后王树声纵队走过那条路,证明能通行。这时(7月2日晚9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向军委建议,因“打胡主力准备由芦花、黑水进,但许多兵运动不便,亦展不开进,此方最好由四方面军任之”。“一方面军可以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红军长征·文献》第555页)后来事实表明这个意见是合理的。可是,军委不予理会,相反采纳了林彪的意见,将刚刚发布的部署作了根本改动,三路改成了一路。林彪过分顾及局部,侦察马虎了事,迁就了林彪,也体现了军委的轻率。正是这一部署改变,直接导致了后来因缺粮而战役终止。黑水山高谷深,雪峰皑皑,出产有

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

○ 程映虹

创造人类进化史上的“新智人”

俄国和古巴革命是 20 世纪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从社会革命和人性改造的角度来看，这两次革命的终结目标并不只是建立新社会，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个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通过思想改造所升华的、以“无私”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并通过塑造“新人”去创造历史。20 世纪革命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一度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和这种宗教情绪的感召不无关系。1990 年，当冷战结束，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瓦解时，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革命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贝尔指出，要

回答激进主义革命为什么一度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有一个最简单的答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世俗宗教”。

所谓“新人”就是这个创世纪神话的一部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新人”不仅仅指人的精神和心理，而且在革命领袖那里确实具有生物演化的意义。上世纪 80 年代初苏联一本介绍“苏维埃人”的对外宣传手册正式提出“苏维埃人”是类演化史上智人（即现代人，Homo sapiens）的一个最高级的分支，从这个角度称“苏维埃人”是 Homo sovieticus，即人类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种。它说从细胞演化到智人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但“苏维埃人”的产生仅仅用了 60 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最新最高级的人类新种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革命政权的创造。

限，全境不足 3 万人。原松潘战役计划规定陈昌浩右路大部（8 个团）走黑水，现在突然改为几乎全军 50 多个团走黑水。这么多红军部队涌进，严重缺粮问题立刻显现。正如当年的亲历者所言：先到的吃豌豆尖，接着到的吃豌豆秆，后来到的吃豌豆根，最后到的什么也没得吃。缺粮情景可见一斑，造成前方部队还未运动到位，后方非战斗减员触目惊心。像这样不当部署和随意改变部署的远不止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军委领导人对敌情、我情、地形、民情、气候等行动要素把握不够，特别是对作战主力红四方面军部队了解并不多，又因作战对象、环境条件决定，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基本是以师、团为战斗单位，总共 40 多个团分布在各个方面，指挥起来难度更大，但军委权力过分集中，也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因而出现了弊端，部署不断变动，“摸着石头过河”，指挥紊乱，调动无章法。后来虽

然理顺了指挥关系，但木已成舟，部队断粮，松潘战役无法继续下去。

松潘战役没有达到消灭胡宗南夺取松潘的目的，主要原因是战役本身超出了红军能力的极限，战争是敌对双方实力的比拼，只要双方的任何一方谋略和决策不出现意外，那就只有凭实力来定胜负了，红军的实力远不如敌人，何况战役决策和部署存在一些缺陷。松潘战役能达到这种程度，造成胡宗南部大量伤亡，迫使它不敢主动出击，骚扰和截击红军主力部队通过草地北上，已经很不简单了。同时，红军在战役中表现的顽强作战意志，既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阻截红军北上信心，又为即将到来的包座大捷全歼胡宗南第 49 师，打开红军北上甘南通道，创造了条件。■

（作者为著名军史专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掌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权推行的、持续了数十年的“新人”工程,其结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苏维埃人”。然而,到了1950年代,当苏联社会经历了后斯大林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变时,“苏维埃人”的一些本质特征被弱化和淡化。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更加激进和彻底的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成了古巴政权的基本任务。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这种信念,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苏维埃人”蜕化的教训也使得“新人”问题在古巴变得更加突出。和“苏维埃人”相比,古巴式的“新人”(即“让他们都成为像切·格瓦拉那样的人”)强调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战斗精神、永不腐蚀和用精神力量创造物质奇迹。在古巴,塑造“新人”的顶峰是“革命攻势”(1968—1970)。

俄国和古巴塑造人性的社会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同情性的反响。西方社会那些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社会腐蚀人性、使人生失去意义的知识分子,对塑造“新人”的工程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类型的“人”满怀希望。

人的可塑性:从启蒙运动到俄国“新人”

在近代历史上,重塑人性的想法直接来自于启蒙运动。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人性由环境塑造并直接对环境做出反映,此即“环境决定论”,例如洛克曾经用“白板”来形容人性的可塑性。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爱尔维修提出了环境决定行为的理论,把人的心智和道德能力归咎于外在的影响,尤其是教育。爱尔维修主张,为了公共利益,大众教育必须制度化并由国家主导。从政治角度出发直接提出改造人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卢梭,他把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精英的责任。卢梭说:“勇于承担重塑大众的人应该觉得他有能力去改变人性……用社会的和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们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个人的和物质性的存在。”

历史上第一个试图用国家权力改变人性的政权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

尔是一个“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的教师”。罗伯斯比尔塑造“好公民”的努力典型地表现在他对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教育的无微不至的热忱上。根据他的方案,从5岁起,所有男女儿童都必须离开父母,和家庭相隔绝,住进国家举办的住宿学校,接受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在雅各宾专政下,为了培养“好公民”,历史积淀下来的和宗教的道德观念被国家所倡导的基于意识形态的伦理规范所取代。

督教会也有过改造人性的实践。加尔文16世纪时在日内瓦建立的新教共和国人们耳熟能详。同一时期天主教会在中南美洲的宗教乌托邦则是另一个范例。当时罗马教皇属下的多米尼各、法兰西斯和耶稣会把美洲土著居民看成是塑造理想的基督徒的材料,认为他们远离欧洲文明,单纯朴素,同时又有足够的领悟和真诚去接受上帝。很多教士在美洲建立了用基督教义改造土著居民的公社,他们拒绝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土著居民的迫害和剥削,甚至用火器武装土著居民,在这样的公社里人们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以道德纯化和精神超越作为公社生活的目的。

马克思的影响对“新人”的理论和实践是最直接的。这种影响主要在于对人性的认识。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马克思的人性论也是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马克思认为,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反映了他们的社会阶级关系,而社会阶级关系是随着历史的演化而变化的,因此人性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他所说:“所有的历史不过是人性不断转变的历史。”例如,资本的贪婪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将来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除了这些基本原则,马克思也对未来的社会如何改造人性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特别是在教育方面。马克思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不但应该由国家主导,儿童应该生活在集体之中,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甚至应该用他们的劳动所得支付一部分教育和生活费用。他主张劳动和学习要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就融为一体。马

克思的这个主张后来一直是这些国家教育革命的一个基本点。

“苏维埃人”历史上第一次国家政权对人性的大规模改造

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的一段话说明,这种改造将不限于列宁所说的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而是将深入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他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一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其他苏维埃领导人则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斯大林的表达方式直观形象,影响了苏联革命后的语言。例如:“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又如他把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教师、文艺创作者都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很著名的一个比喻是在1945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宴会上的祝酒词:“我为那些简单、朴实而谦逊的人干杯!他们是运转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布哈林也说,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实际的心理”,“科学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造就‘新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做系统的准备。”

俄国当时有一个著名生理学家叫巴甫洛夫,他通过长期对狗进行喂食实验发现,如果你重复给予动物特定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又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环境同时发生,经过一定量的重复,动物的神经系统会自动地把这个信号的出现和相应的物质条件或环境相联系,从而自动地做出对那种环境的反应。这就叫条件反射。巴甫洛夫为此在1904年得到了诺贝尔奖。巴甫洛夫的理论无意中给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以重大的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这真是太美妙了!因此列宁说巴氏的发现“对全世界工人阶级

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向十分鄙视,当高尔基写信给他为大量被捕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求情,说人民的大脑正在被摧毁时,列宁回信说这些人不是人民的大脑,而是粪便。当大多数科学家和学者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忍饥挨饿时,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却根据列宁下的一道命令每个月从布尔什维克政府那里得到不薄的补助。到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成立了“巴甫洛夫阵线”和“科学家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问题委员会”。苏联时期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作了极大的投资,然而却宣布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使得遗传学在苏联的研究大大落后于西方,甚至影响到其他通过革命建立起政权的国家。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5到10岁的儿童)、少先队(11到16岁)和共青团(16岁以上),每一个年龄段都由相应的政治组织所控制,各个组织之间又相互衔接;同时开始了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的实践。

苏联的少年儿童必须像成年人一样参加政治运动和所谓阶级斗争。苏联官方还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其典型形象之一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受伤致残,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本自传性的小说,用自己献身革命并在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经历教育青年,作为对党的最后奉献。书的题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象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苏联官方版本的“苏维埃新人”体现了“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其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虽然每一个人成为“新人”的途径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体性而没有个性,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上世纪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像钢铁一样坚强,像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在近代历史上,“苏维埃新人”标志着社

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的产生。这个“大众”既是 19 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 20 世纪形形色色的强调整体性反对个性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到了 30 年代,为了实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迅速工业化成为苏共的首要目标。为此开始采用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工业中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超额完成任务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不但得到高工资和奖金,而且有住房、假期和保健方面的优惠,可以有特殊配给并在特殊商店购买。学历、经验和年资也受到更多的重视,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了,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如军队的军阶制。30 年代以后,各个方面的模范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奉献,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意味着各种形式的奖励。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苏维埃新人”的特征超出了单纯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在技术和管理上对人的要求,而且在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和整个苏联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在 30 年代开始的这种社会分化到了 50 年代下半期和 60 年代上半期更为显著,并开始反映在以经济改革理论为代表的新意识形态上。60 年代初经济学家利别尔曼发起的关于独立核算、个人利益和市场机制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利别尔曼 1962 年 9 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和奖金》的文章发起了讨论。持改革意见的人包括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思想开明的党政干部。这场讨论波及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多数国家反应比较积极,而在中国和古巴为代表的少数共产党国家则遭到了抵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修”的标志。

但是不管社会现实如何,苏联官方从来没有放弃“新人”的目标,至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上是如此。

“把他们都变成‘切’那样的人” ——古巴塑造“新人”的实践

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都

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信徒,在他们看来,人性中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都是由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被消除的。切·格瓦拉对人性的理解更是机械的和甚至是非人性的。他说:“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他还说,革命者是“幸福的齿轮”。

古巴在革命初期以苏联为模式,移植了苏联的各种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政治化(党、少先队、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培养革命所需要的人。但随着古巴领导人日益意识到和苏联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文明程度上巨大的差别,他们越来越感到古巴必须走和苏联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共产主义。苏联 60 年代的经济改革同样使得古巴面临和中国一样的问题:是仿照苏联的模式,使用物质刺激,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这个难题反映在 1961 年到 1965 年发生的有关道德动力还是物质动力的大争论上。争论的背景是古巴自 1960 年开始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造成的生产下降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古巴自 1961 年起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等实行票证制)。争论的一方是古巴农业和外贸的负责人,他们主张一定程度上采用物质刺激、放松国家控制,让基层经济管理部门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是工业和国家银行负责人切·格瓦拉,他坚持原来的(在古巴刚刚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策,并把苏联的经济改革看成是对“新人”社会工程的腐蚀和瓦解。他曾经说,苏联是个“猪圈”,苏联工人和美国工人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他对毛泽东的中国模式非常赞赏,认为中国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所主管的部门里,他坚持使用精神鼓励,即使在迫不得已给予物质奖励的时候也尽量不使用货币形式,并避免在公共场合颁发物质奖品。在他的号召下,古巴掀起了义务劳动和劳动竞赛,企图用这种方法解决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他说,劳动竞赛应该成为工人工余时间考虑的问题。他还希望把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和牺牲精神在和平年代保持下去,以避免安定有序的生活放松“新人”成长的节奏。切·格瓦拉的主张在 60 年代后半期成了主流,他所倡导的义务劳动被制度化。

古巴的“新人”工程建立了很多典范,“青年

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这个岛原名松树岛,革命前是监狱,1965年在一次风灾后的善后工作中被整体移交给古巴共青团,从全国抽调了5万名团员,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这个岛上的生活设施全部免费,收入按家庭成员的人头而不是贡献,基本不用货币,生产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在经济上这个岛的目标是建立柑橘和奶牛业,数年内赶超当时世界上柑橘和奶牛业最先进的以色列和荷兰,为古巴换取外汇并解决肉奶制品的供应(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直到今天古巴人的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仍然是票证制)。根据古巴官方的宣传,这个岛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奇高,“上班时从不看表”。古巴全国都派取经团来这个岛受教育,少年儿童和大学生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岛还是向世界展示新古巴的橱窗,卡斯特罗常常把他的外国客人带到岛上,告诉他们哈瓦那是“旧古巴”,而这个岛才是“新古巴”。

卡斯特罗把官僚机构和旧社会留下的影响看成是培养新人的主要障碍。自从60年代早期开始,他一直把古巴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归因于“官僚机构”的作祟,而把古巴工人和一般干部劳动积极性的低落归因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残存的影响。为此在1968年到1970年,卡斯特罗发起了“革命攻势”,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培养“新人”的最激进措施。

“革命攻势”的经济目标是到1970年实现1000万吨糖产量(通常年产量是600万吨左右),但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个目标对古巴社会进行革命以来最彻底的清理和重建,为“新人”的产生创造最理想的条件。1968年3月,他宣布党内揪出一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小集团,以一个亲苏的中央委员为首。以粉碎这个“走资派”集团为开端,“革命攻势”轰轰烈烈地掀了起来。接下来,为了清扫妨碍“新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卡斯特罗亲自发起了扫除街头小贩的斗争,一昼夜之间古巴全国的摊贩被废除和没收,小业主们被集中送进劳动营。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甘蔗收获季节,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全国各地各单位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军队派遣自己的干部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组成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田或建筑工地上)和后勤部(设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劳动纪

律全部按军法从事;一切和甘蔗生产无关的业务全部停止,学校关门,学生组织起来给“前线”送粮食和饮水,妇女在“后方”接管男劳动力留下的工作,或在街头巡逻,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在收获季节里,各地每天用战斗警报作为上工号令,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常常故意短时期切断电源,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

然而,“革命攻势”仍然以失败告终。1970年初夏,卡斯特罗坦陈,甘蔗的产量没有达到目标,“革命攻势”失败了。从那以后,古巴当局在政治和社会政策上逐步放弃了激进过渡的措施,苏联的一套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采用。虽然“新人”的口号从未被放弃,但像6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大规模运动没再出现。

结语:是对道德的提升还是毁灭?

时至今日,毫无疑问20世纪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是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得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的复兴和人性的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英国哲学家伯林曾经对20世纪改造人的社会工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灵感的艺术家,他企图把人熔注进根据他的独一无二的眼光所设计出的模式,就像画家掺和颜料或者作曲家组合音响:人成为一种我可以把自己的创造性意志加诸其上的原材料。即使人在此过程中受难甚至死去,他们也被升华到了一个如果没有我对他们生活的强制——创造性的强制——他们将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新人”工程,人们首先要问的并不是它在现实中的可行性,而是这种以提升人的道德水平自命的社会工程本身的道义合理性。■

(作者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纲)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感谢你们给我发来读者对《胡耀邦最后的日子》一文的某些质疑。读者指出东德承认《新论坛》合法和开放东西柏林边界，是在胡耀邦去世之后，文章把它写在胡耀邦在世时，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作者的失误，应向读者致歉。但这一具体情节的差错，并不影响这段文字的意思。1988年冬和1989年春，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发生剧烈变动，对我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毋庸置疑，胡耀邦更是对此无比关注。他每天阅读中央编发的《内部参考》资料，了解事变发展的情况，思考它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我的文章所写的那段文字，正是他当时思想和谈话的真实记录。由于他的谈话是我事后的追记，在谈到东欧事变的具体事件中，关于东德的情况，我当时只记下了“东德”两个字，而未记下具体内容。这次写文章时，就把印象中的承认《新论坛》反对派和开放柏林边界写了进去，而未加查对，这是我的不慎重。至于胡耀邦当时在“内参”中是否已经看到东德政局变化的一些反映，我现在也不敢妄加揣测，不过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总是有一个过程的。

刘崇文

2011年12月17日

看了贵刊2011年第1期上由毛德传撰写的《胡乔木词与杭州毁墓拆碑》一文后，感触颇深。

但在该文中有些地方和事实有一定的出入，例如第23页“四”部分中的（一）“是反帝反侵略。……摧毁了九里松石莲亭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神文、牧师的二十个墓群，包括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父母之墓……”这里谈到的司徒雷登父母墓（还应该包括司徒雷登弟弟的墓）并不是在那次“文化革命”中被摧毁的，而是早在1952年左右在建造九里松解放军117医院时被迁移走的。2008年至2010年因工作需要，我们特意采访了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南京神学院、杭州从事神职工作、现年86年的舒昌荣老人，舒老说，司徒雷登父母及兄弟墓早在1952年左右已被迁移，因此知道的人很少，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也搞错了。舒老带我们到当时的墓地处，亲自向我

们指出了原司徒雷登父母和兄弟墓地的正确位置，在灵隐路洪春桥下小溪西侧，即现在解放军117医院围墙东南端，临近灵隐路。舒老告诉我们，杭州灵隐路九里松石莲亭一带确有一基督教墓地，但属基督教内地会墓地，因此很多人并不熟悉这些情况，往往将内地会墓地与长老会墓地混淆在一起，故出现了将司徒雷登父母和兄弟墓误为在九里松石莲亭一带墓地是不正确的。

杭州读者 张鹏搏 张鹏程

《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一文中说：“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骚乱，把政府砸了，也把当地超市砸了，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结果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野战部队开进去才恢复秩序”。

这则报道与实际情况不符，我作为当地人，知道事件的全过程，愿说明如下：

1.“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应为“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把政府砸了”没有的事。只是那几天晚上有大群人（几百人）在政府门前闹事，进不了政府；3.“也把当地超市砸了”，事实是有少数人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到超市抢走了一些贵重的商品，当时有些经营贵重商品的商店怕抢关门是事实；4.“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就完全不是事实了；5.“野战军开进去才恢复秩序”，野战军是随便能动的吗！不是野战军，是来了省里的特警，恢复了秩序才走的。

《炎黄春秋》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引证事实有误，应该更正。

83岁老干部 刘重孚

2011年第10期，第43页李仲谋同志撰写的《批判陶行知始末》一文中引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悼诗“吾敬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园中规矩，教育愈陶多钧。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伸。此生安仰止，天复可归仁。”有误，应为“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伸。此生安仰止，天复可归仁。”

青岛读者 余淼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家史家谱

(三年出版一千余种, 欢迎来书店参观洽谈或来电咨询)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 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 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家史家谱: 先烈纪念集、先辈遗文集, 家族百年史、家谱族谱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一般32开本, “家族史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 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 内文黑白胶印, 胶装或线装; 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 设计、排版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 只用于交流与赠送, 需要书号发行的另行协商。北京客户上门服务, 外地客户来电说明赠送样书。

老人出书, 历史见证; 家族出书, 文化传承!

服务电话: 010-6892 0114 6892 0399 6252 5116

接待地址: 北京市海淀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 编: 100080

单 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绘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登陆网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z.net)

人人出版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 署名 挂名 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4千元，300页印刷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书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印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回忆录咨询热线 / 400-653-6199

您的回忆录是这样诞生的

- ◎ 历史顾问与您共同制定采访提纲
- ◎ 访谈人员和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 ◎ 专业撰稿人将您的经历凝练成文
- ◎ 资深编辑三审三校
- ◎ 设计师为您量身制作精美图书版面

从工人、农民，到院士、大使，我们已为一千三百位主人公撰写了回忆录



张妈妈 46岁
会计

女儿考上大学了，
我写了本回忆录，
记下陪她一起
成长的点点滴滴，
算是给她的成人礼。



王师傅 60岁
模具厂车间主任

退休了，
把这半辈子的
酸甜苦辣都记下来，
给自己个交代，
也给孩子们看看。



陈院士 82岁
中国科学院

这些年搞科研
一直忽略了身边的她。
这部回忆录
就作为我们的金婚纪念。
老伴儿，你辛苦了。

www.huiyi99.com

政体与大国的兴衰

曾彦修：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怀念父亲徐雪寒

陈永贵与记者的恩怨

长征路上的松潘战役

东北抗联的一桩公案

ISSN 1003-1170



0.1 >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